

炎黄春秋

5

1998

总第74期



胡耀邦正确处理信访大潮
中国需要顾准这样的思想家
王元化:对“五四”运动的再认识
胡适——
新文化运动的另一面旗帜
明末党社与清朝文字狱
《红岩》作者罗广斌死因之争

顾问(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朝闻 杨静仁 赵朴初
胡絮青 费孝通 谢冰心

特邀编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俊义 冯 征 冯其庸
刘颖南 李 庄 李 普
李学勤 吴 象 苏双碧
张 锲 张国琦 凌 云
常 征 温济泽 韩劲草
廖盖隆 穆 青 戴 逸
魏 巍 魏久明

社长(法人代表): 杜导正

副社长: 方 实 宋文茂(常务)
徐 孔

执行主编: 刘家驹 舒元璋
陈崇保

理 事 长: 杜导正

副理事长: 简祖扬 李华鹏

理事单位: 深圳市兴亚大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

秘 书 长: 徐 孔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址: 北京东城区雍和宫大街
戏楼胡同1号

邮编: 100007

电话: 64072452

64031144 转 2191 或 2004

印刷: 世界知识印刷厂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订 购 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
公司(北京 399 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 127M

出版日期: 每月4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 0079 号

定 价: 4.80 元

专 稿

- ②当代中国需要顾准这样的思想家 吴敬琏

春秋笔

- ⑦胡耀邦正确处理信访大潮 许人俊
⑬蔡元培在北大的辞职风波 萧 实
⑮回顾总政创作室的反右派运动 黎 白
⑳我在打“AB团”中的经历 欧阳毅
㉑中国红军中的美国人马海德 武际良

求实篇

- ㉒我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再认识 王元化
㉓胡适——新文化运动的另一面旗帜 杨 雯

陨星篇

- ㉔悼念敢于为民请命的胡开明 于光远 曲维镇
㉕项英像前说项英 欧远方
㉖我的公公
——南开创始人张伯苓 瞿安贵口述 唐靖整理

- ㉗来自教会的红军医院院长傅连璋 宋力 姚江

遗闻录

- ㉘张学良在夏威夷谈往事 张天华
㉙“两航”产权引发的国际争端 王 德
㉚张子善被处决前的悔恨 范玉昆

人海浪

- ㉛《红岩》作者罗广斌“文革”中死因之争 郑光路
㉜从对垒到团聚——忆逝于台湾的二舅罗文浩 何 标

古镜台

- ㉝明末党社与清朝文字狱 李一鑫
㉞明初才子解缙无辜被杀 李立泉
㉟曾国藩教子之道 伍泽华

文荟园

- ㊲黄青送我三幅画 刘大为
㊳《水浒》的流传与评说 靳树鹏
㊴张竞生教授与民国初年的《性史》风波 王心喜
㊵在武安看雄戏——雄文化的活化石 郝玺修

编读窗

- ㊶读吴晗问题定性一文有感 李坛荪

当代中国需要 顾准这样的思想家

● 吴敬琏

顾准是我的老师和挚友。重读他的遗文，真是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不但在河南息县明港劳改队中和他同窗共读的情景历历如在目前，而且觉得他好像仍然活着，正在和我们一起探讨中国当前面临的种种问题，或慷慨激昂或娓娓道来地发表议论。

我曾经有两次和顾准密切相处的机会。第一次是1956年，那时我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财政组从事企业财务的研究，当时顾准是我的领导。第二次是从1963年他重回经济所到1974年12月他因病辞世。特别是1968年到1972年期间，我们两人在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五七干校”同为已被定罪的“反革命分子”，在“隔离室”里朝夕相处。我们利用不准参加“革命群众活动”的机会和顾准通过巧妙斗争取得了阅读中外书籍的权利，怀着“为什么我们追求革命理想，千百万人人为之奋斗牺牲，得到的却是林彪、‘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这样一个当时使我们深感困惑的问题，认真研究各国经济、文化政治发展的历史，探索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在这段朝夕相处的日子里，顾准对我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导致了人生道路的重

大转折。因此，我是从他受益极多的。现在我主要不是表达个人对他的怀念和感激，而是讨论作为现代中国的一位重要思想家，他的思想和事业对我们的改革和改革的参加者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顾准是一个才华横溢、具有鲜明个性的奇人。和他有过接触或读过他文章的人，对于他作为学者的渊博学识和犀利言辞都会有极为深刻的印象。然而这些都还只能说是顾准的外部特征。如果说作为一个思想家的顾准的内在特征，我想是在于他对中国和世界历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言人所未言。这些问题，例如中国为什么没有如同希腊罗马那样，发展起作为欧洲文明滥觞的城邦和共和制度，而是形成了几乎牢不可破的东方专制主义传统；中国的“史官文化”传统是怎样形成的，什么是“史官文化”的本质以及应当怎样对待“史官文化”；在革命胜利以前生气蓬勃的革命理想主义为什么会演化为庸俗的教条主义；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娜拉出走以后”要采取什么样的政治经济体制才能避免失误和取得真正的进步；社会主义是不是注定了只能实行计划

经济，而不能让市场价格自发波动来调节生产等等，都是长期聚讼纷纭，人们莫知所从的。顾准都一一作出了自己的解答。他的见解往往惊世骇俗，却又有理有据，使人不能不信服。正如王元化为顾准的《理想主义与经验主义》一书所作的《序言》所说：“许多问题一经作者提出，你就再无法摆脱掉。它们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惰性一直扎根在你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这种充盈于他的著作中的真知灼见，无疑来自他不畏艰险、放言无惮的科学批判精神和艰苦卓绝、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问题在于，是什么力量支持顾准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勇往直前，坚持对历史轨迹和人类未来进行无畏的探索。在林彪、“四人帮”法西斯专政的淫威下，一般老百姓议论尚且有身陷囹圄甚至惨遭杀身之祸的危险，顾准是一个戴过两次右派帽子的“反革命分子”，由他来探讨“娜拉出走以后怎么样”，即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的政治经济发展问题，是冒着多么大的风险，需要什么样的勇气啊！而且当时顾准的生活环境是十分艰难的，缺乏研究和写作的起码条件。早在1969年在河南息县的时候，他已经痰中带血，除了参加劳动外，还得应付没完没了的“交待”和“批斗”，有了一点时间，他就抓紧读书，认真思考问题。1972年回到北京后，病况加剧，可是他却索性以北京图书馆为家，争分夺秒地查找资料，做卡片，写笔记，成就了《希腊城邦制度》等数十万言的论著。显然，只有对人民怀着炽烈的爱心的人，才能像顾准那样，如同一支行将燃尽的蜡烛，以自身的毁灭为代价，力求给世界以更多的一点光和热。

只从表面上观察顾准，会觉得顾准是一个极端冷静的人，因而能够完全客观地对待一切人和事，或者如他自己所说的，冷峻得像一把“冷冰冰的解剖刀”。也有人说，顾准的特点是“恃才傲物，目空一切”。的确，顾准只服从真理，不管在感情上多么难舍难分，只要不符合“真”、“善”的标准，他都义无反顾地加以舍弃；不管是有多大权势的显贵，



顾准，中国当代思想家、经济学家，1915年7月1日生于上海，1974年12月3日卒于北京

只要是有悖于真理，他都理真气壮地加以反对。例如，由于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参加了革命工作，曾经为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出生入死，因而对于革命怀着深厚的情感，始终认为革命“可以完成历史的奇迹”；当他发现自己曾经拳拳服膺的某些信念包含着谬误的时候，往往陷入极度的痛苦。但是当他发现革命理论的失误和革命队伍中的种种丑恶现象，总是毫不留情加以揭露和批判。他是一位伟大的民族主义者，念念不忘中华民族的振兴，热烈期待着“我们自己的‘神武景气’的到来”。然而他对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阴暗方面，如唯政治权威之命是从的“史官文化”，鼓吹愚民政策和无为政治的“黄老风格”，他都义愤填膺地加以声讨批判。他是一位彻底的民主主义者，但是，对于被看作民主制度的极致的直接民主制，他却斩钉截铁断言它只适用于小国寡民的城邦，对于大国是不可

行的，而且不可避免地在亚历山大征服后的希腊化世界中与东方专制主义相结合，或者在雅各宾专政后继之以拿破仑独裁。

然而只要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这个冷峻孤傲外观下面，有着一颗充满爱心和柔情的内心世界。

人们也许认为，顾准之所以能够这样无所顾忌地探求真理，是因为他在经历了种种人世沧桑之后，已经变得超然物外，对于人世间的喜怒哀乐都无动于心。我想，这个判断也是不符合实际的。顾准从来认为，“力求在一个没有希望的世界里寻求自己灵魂的安宁”，“不是禄蠹，就去出家”，“愤世嫉俗，只好自称老衲”，都不足为训。顾准精神是入世的。正像他自己所说，他的宗旨在于“为人类服务”。为了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的未来，他立志做一个“用鲜血做墨水的笔杆子”。顾准确实实现了这一诺言，用自己的鲜血写下了掷地有声的篇章，至死方休。

我从同顾准交往中亲身感受到，他的严肃冷静的科学精神、刚正不阿的处世态度、艰苦勤奋的工作作风，无一不是由对人民的热爱所孕育和支撑的。于是构成了他的貌似截然相反，实际上同出一源的性格特征：

一方面，顾准是一位顶天立地、威武不能屈的硬汉子。例如，在河南明港时，不断有外调人员武斗逼供，要顾准作伪证诬陷一位与他有过个人嫌隙的老同志，虽然饱受皮肉之苦，他仍然严辞拒绝这种无理要求。事后顾准对我讲述他的遭遇时，谈笑自若，丝毫不以为意。我也还清楚地记得在一次无端指摘他“偷奸耍猾”的“地头批判会”上，他冒着雨点般袭来的拳头高昂头颅喊着“我就是不服”时的神态。但在另一方面，他对于在“文化大革命”的狂热气氛裹挟下揭发过他的“罪行”的老同事和被迫同他“划清界线”的亲友子女，却总是怀着体谅的态度，或者以社会原因为他们辩解。例如在1972年回到北京以后，由于他的妹妹和妹婿（当时任公安部代部长）的阻止，顾准不能和近九十高龄的妈妈相见。当时大家对他的妹婿

和妹婿这种不近情理的做法十分不满。顾准却说，他完全可以理解妹妹一家，因为他们只是一部巨大镇压机器的一个零件，身不由己，何况他们（妹妹和妹婿）全家“也是坐在火山上的呀”！有一位他的老朋友在“清理阶级队伍”时曾经用荒诞牵强的推理“揭发”顾准在30年代就是执行“右倾投降路线”的“内奸”。很久以后随着周扬的解脱，他的“内奸”问题才告解决。1972年回到北京以后，顾准对于他这位老朋友却多方照顾。考虑到这位老朋友的凄苦处境，逢年过节总是备下酒菜，约他共餐对酌。我当时很不以为然，顾准却说：你真是不懂得世事。他的这种古怪的个性和奇特的思想方法，完全是由党内不正常的政治生活和逼供信的“审干”做法造成的。这套制度毁掉了他的一生。这种悲惨的人生遭遇，造成了他的古怪脾性，我们应当同情才对，怎么可以苛责呢。

顾准对于荀况、韩非为专制统治者钳制舆论献策的言论，虽然事隔几千年，仍然严词指斥，愤恨之情溢于言表。面对某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左”派理论家，他义正严辞宣言：“我自己也是这样相信过来的。然而，当今天人们以革命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另一方面，他对于人民的苦难，满怀同情，感同身受，甚至在看雨果的《悲惨世界》、狄更斯的《双城记》的时候，也伤心落泪，边读边哭。在看到别人被强加上莫须有的政治罪名，他会不顾自己的“反革命”身份站出来打抱不平。在议论给老干部落实政策时，他想到的是“中国农村冬天没有鞋穿的孩子们”。他在受到政治上的迫害时，首先想到的不是怎样维护自己，而是使他的子女少受一点牵连。“文化大革命”开始，他的子女受到“左”的思想的毒害和为形势所迫，同他断绝往来，“划清界线”。顾准对此深感痛心。然而他还是处处为他们着想，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最珍惜、准备以生命来捍卫的东西。在他的病



吴敬琏 1996
年摄于美国麻省
理工学院住所

已经宣告不治的时候，经济研究所“连队”的领导考虑给他“摘去右派帽子”，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要顾准在一份文字报告中作出“承认错误”的表示。这是顾准所万万不能接受的。但他最后还是签了字。签字时顾准哭了。他对我说，在认错书上签字，对他来说是一个奇耻大辱，但他这样做，因为这也许能够多少改善一点子女们的处境。事事首先为别人着想，已经成为顾准的天性。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打开行军床休息”。那是顾准临终的一天。由于癌肿对气管的压迫，他早已说不出话，当时他的病情更是已经进入了危急状态，一呼一吸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到了晚上约十一点钟的时候，他看到我还在床边，便挣扎着用手势，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要我休息。只过了大约一个钟头，他就停止了呼吸！

我想，一个人只有有这样伟大的人格，只有有这样的对民族、对人民高度的责任感和为人类争取更美好的未来的使命感，才有可能在那十分险恶的政治环境和极其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孜孜不倦，勇敢地进行只有后代学人才能认识其价值，甚至完全有可能永远湮没无闻的历史探索。他的学术成就，也

正是这种精神的产物。例如，他写作《希腊城邦制度》，就完全不是“发思古之幽情”的结果，而是为了回答“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早在干校的时候，为探索为什么播下了革命的理想主义的种子却得到了林彪、“四人帮”法西斯专政结果问题，追溯文化史和法权史的根源，遇到了东西方民族的历史殊途是怎样开端、怎样形成的问题。为了解答这个问题，顾准真是做到了王国维所说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那时，顾准曾反复和我讨论希腊城邦制度的起源问题。他提出了一个又一个假说，又一个一个地推翻，最后才形成了一套可以自圆其说的解释。为此，顾准付出了巨大的精力，在有限的书籍中摘取有用的材料，细心地把它们连缀在一起，形成一个体系。回到北京后，他拖着低烧咯血的病躯，废寝忘食，每天只带几个冷馒头上北京图书馆，查阅了大量书籍，闭馆以后回到学部大院的集体宿舍再夜以继日地写作，终于写出了这部连西欧史专家也对它的科学价值赞叹不已的巨著。

时代发展到今天，顾准所深恶痛绝的东方专制主义和它的经济基础正在走向土崩瓦解，涤荡历史上积淀起来的污泥浊水、实现

民族腾飞的条件已经具备，十五年来改革确实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然而“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旧体制和旧文化像一条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它们的代表者仍然步步为营，负隅顽抗。其中有些人借用“弘扬民族文化”的招牌为专制主义招魂。在转轨过程中，也有人打着“改革”的旗号干着掠夺大众的勾当。在这种时刻，我想我们知识界尤其需要发扬顾准那样立志为世界人民服务而不屈从于任何政治权威的精神，为大众的利益、为推进改革而奔走呼号。

现在似乎有一种误解，以为既然旧体制下当权者往往用所谓的“整体利益”压制平民百姓的发展个性和增进物质福利的要求，我们今天就应当反其道而行之，一切以一己私利为依归，把利己主义的世界观作为改革的精神武器，把承认人的价值化为对金钱价值的顶礼膜拜。在某些错误观念的误导下，鄙薄崇高、崇尚卑鄙成为时尚。以损人利己为荣，以不择手段地敛财致富为务，对社会主义和公共道德弃若敝屣，把靠掠夺公共财富发家的暴发户看作改革者典范，把厚颜无耻地倡言市侩哲学与思想解放等量齐观，把正当的经商牟利同弄权“寻租”混为一谈。“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成了人生第一要义，利己主义被说成是时代的思想旗帜。的确，顾准也说过，有一种个人主义曾经是历史上积极进步的因素。不过，顾准所认同的，并不是任何一种个人主义，而是“像布鲁诺那样，宁肯烧死在火刑柱上不愿放弃太阳中心说；像宗教战争或异教迫害中的殉道；像生命可以不要，航海却不可不去的冒险精神；像近代资本主义先锋的清教徒那样，把赚钱、节约、积累看做在行上帝的道；最后，像马克思认为是共产党的基本标帜每个人都能够‘自我实现’的那种个人主义”。顾准曾经自陈，他“是一个‘倾心’西方文明的人”，尤其倾心这种文明的先驱——希腊城邦文明。然而他却为希腊世界由于个人利己思想恶性膨胀而造成的种种败德行为而黯然神伤。他

说，我写《希腊城邦制度》“本来是有感于希腊在那种小邦林立，相互竞争中，个人创造性发挥到顶点，创造出灿烂的希腊文明，……所以要写，是想歌颂它。可是写着写着，对于林立的小邦相互之间的自相残杀，甚至不惜勾引希腊文明历来的大敌波斯……对这种不顾大体实在受不了，不知道该歌颂不，有点迷惘了”，并使《希腊城邦制度》的写作一度“卡壳”。可见顾准对个人主义决不是全称肯定，而是有批判、有选择的。人民大众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处境的要求显然无可指责。但是，争取更多的物质消费并不是人性的全部。特别是作为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应当有更高的追求。鲁迅曾经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应当说，顾准就是这样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

顾准是一座巍然屹立、高耸入云的山峰。不管是在天赋的聪明才智方面，还是在道德文章方面，我们都不一定能接近于他所达到的境界。然而，“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们应当积极努力在“为世界人民服务”的宏伟事业中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这也就是对顾准的最好纪念。

（吴敬琏，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此文是他1995年3月在社科院经济所纪念顾准诞辰8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责任编辑 杜 晋）

更正

本刊1998年第4期《萧克张爱萍在蟠桃相会》一文中说，离休前萧老长期担任全军最高学府“军事科学院”的领导职务，有误，应为“军事学院”，特此更正。

胡耀邦正确处理信访大潮

●
许人俊



1981年6月12日，胡耀邦在中南海
接见上海戏剧学院藏族班师生

小平举荐贤才 耀邦走马上任

文革时期，“左”倾思潮走向极端，在全国制造了300多万件冤假错案，上至国家主席、三军元帅，下至平民百姓，无不深受其害，祸及近亿人口。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举国欢腾，但“左”倾流毒尚在盘旋，“两个凡是”依然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大量冤假错案得不到平反昭雪。当时，仅北京中央机关就有6000多干部闲在家中无事可做。

国家农林部有300多专业干部，被部长沙风“挂”在所谓工作队里听候处理。

文化界一大批社会名人被当作社会糟粕弃之不用。

当时主管干部工作的中央组织部更是“左”得出奇，在部长郭玉峰把持下，陈野苹、张志杰、曾志等久经考验的领导干部、历史功臣，仍然靠边站，不准进入部机关大楼。

中组部内怨声载道，一向严守纪律的老干部们打破了沉默，纷纷执笔写大字报、小字报，愤怒批判郭玉峰，联名写信向党中央揭发其“左”倾错误。《人民日报》仗义执言，立即派人前往了解情况，编印《看郭玉峰在中组部的所作所为》，报送中央领导。

叶剑英元帅马上把情况转告陈云和刚复出的邓小平。几位党中央核心的革命老人，意识到问题严重，深感治国必先治吏。1978年12月初，经党中央研究，决定改组中组部领导班子，把郭玉峰同志调离中组部。

面对党的干部政策迟迟不落实，上访告状人员日益增多的严峻局面，叶剑英元帅在中央的一次会上激动地提出：“喊冤上访的人这么多，到哪里找一个断案如神的包公呢？”

邓小平说：“我举荐一个人，胡耀邦，最合适。”

粉碎“四人帮”后，胡耀邦旗帜鲜明、正气凛然地带头组织开展“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带头向“两个凡是”发起总冲击，带头组织撰写和发表两篇《拨乱反正，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的大文章，轰动全国，大得人心。

会上，陈云、李先念、邓颖超等人一致赞成小平的推荐，让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长。

尽管当时胡耀邦已62岁，但锐气不减当年。当中央找他谈话时，他十分痛快地说：“我愿当这个包公！”

1978年12月15日上午8时，胡耀邦正式走马上任。一向清静森严的中组部，顿时喜气洋洋，热闹非凡。老干部们童心大发，抱了一大串鞭炮燃放。聂荣臻元帅的夫人张瑞华也赶来了，她的鞭炮最多，花10多元买了两长串。欢迎的鞭炮声震耳欲聋，整整响了20分钟。胡耀邦和秘书在欢快的鞭炮声和热烈的掌声中跨进中组部大楼。

他在楼里即席讲话，很动感情地指出：“现在积案如山，步履维艰。”要求组织部“把这些问题的彻底解决，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希望大家恢复党的优良传统，迅速行动起来。

他当场宣布：请长期靠边站的陈野苹、章

蕴、曾志、贾素萍、杨士杰等出来工作，组成老干部接待组，认真做好来信来访工作。他还周到细致地指出：“年老体弱走不动的，可以用车接来谈；患病在床来不了的，应登门拜访，到他家里，到他的病床前倾听意见。”他反复强调要关心群众疾苦，体察民间冤情，甚至敲着桌子大声疾呼：“只有这样，我们的党，我们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才有希望。”

他的心和上访人员紧紧相连，息息相通，为千万含冤群众带来了希望。对外文委205位干部联名上书中组部，诉说他们长期靠边站的悲愤；农林部工作队二三百干部，也纷纷到中组部状告沙风部长剥夺他们的工作权利。当时，每天都有数百人涌到中组部上访。胡耀邦上任仅一个月，中组部就收到6麻袋告状信。他带领广大干部热情接待来访人员，认真阅处来信。

陈野苹、贾素萍、曾志等领导干部，也率领工作组深入中央机关各单位调查研究，听取意见，同申诉人面谈。这雷厉风行、善解人意的作风，犹如春风细雨，沁人肺腑。不久，对外文委和农林部的问题相继解决，中央国家机关6000多长期靠边站的干部也先后恢复了工作。

然而，信访工作依然步履维艰，主要是中央领导层认识有分歧，思想不统一。

1978年9月18日，中央办公厅在中南海召开全国信访工作会议，研究如何处理日益增多的申诉和上访问题，如何加快落实政策。

当时，“两个凡是”仍有市场，有人劝胡耀邦暂不出席，说：“人家正要找你的茬儿呢，你还要送上门去？”胡毫不在乎地说：“这正是广泛动员平反冤假错案的好时机，是踏破铁鞋也难找的最好讲坛，我们决不能放过。要永远记住八个字：坚持真理，旗帜鲜明。你好我也好的庸俗腐朽气，同我们党的性质水火不相容。”

在会上，胡耀邦针对“两个凡是”的观点，着重阐述“两个不管”，强调“不管什么时候，什么人批的定的案子，是冤假错案的，都要平反纠正”。会上有人认为此话不妥，整

理会议简报时删去了这些观点。他毫不让步，立即拿着简报去找汪东兴副主席据理力争，汪反问：“如果是毛主席批的定的案子，你怎么办？”胡耀邦理直气壮地回答：“如果老人家还健在，我相信他会恢复他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所以对他老人家过去批的定的，经实践证明了的冤假错案，我们都应该平反改正。”

经过激烈较量，局势有所变化，但“两个凡是”在某些领导人中仍有相当大的影响。

上访人流如潮 发动千人办案

1978—1979年是我党平反冤假错案的关键年头。这一期间，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就复查冤假错案，为地富分子摘帽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落实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等问题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并召开大会，大张旗鼓地为彭德怀、陶铸、陆定一、彭真等平反，向全国表明党中央实事求是、拨乱反正的决心。

然而不少地方平反冤假错案的行动迟缓。部分地区和单位衙门作风、官僚主义严重，无视群众疾苦，互相推诿。有些机关“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有的受冤人三星期跑了8个单位上访，也无一受理。有些冤假错案平反后仍留有尾巴，政策不能彻底落实。更有甚者，有些地方“文革”流毒未清除，制造冤假错案的人照样横行霸道，为非作歹，甚至利用权力打击报复上访人员。这种冰封雪盖、寒气逼人的局面，使许多长期受冤挨整的干部和群众忿忿不平，于是纷纷从全国各地涌往北京，向党中央、国务院告状，强烈要求落实政策。

1979年夏秋之际，北京上空骄阳似火，街上告状喊冤的人流如潮，中央机关各部委门口挤满上访群众，有的拄着拐棍，有的抱儿带女，有的把写好的告状布挂在身上，有的高举告状纸牌。中南海、天安门、长安街，到处有上访人员来回奔跑，而且人数越来越多。原本

紧张的首都公共汽车更为紧张，造成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新矛盾。尽管党中央、国务院临时抽调了大批干部，在永定门等处设了联合接待站，然而人满为患，中央信访局深感力不从心，应接不暇。

据调查，当时成千上万滞留首都的上访人员中，有70—80%是多次重复来京上访的，有的已滞留了数月之久。当然，也有极少数不法分子混杂其中，兴风作浪，制造混乱。但绝大多数是有冤难申。大批人员进京上访，已成为一大社会问题，严重影响首都的对外形象和社会治安。这一情况引起了党中央和耀邦同志的高度重视，经研究决定成立中央机关处理上访问题领导小组，统一协调处理全国上访问题。

8月底，领导小组紧急布置，从中央机关抽调1000多干部参与处理上访问题，而且实行分工负责制，要求每一个部或两个部全面负责处理某一个省或直辖市、自治区的上访问题。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变被动为主动。

这是我党信访工作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惊人举措。分工负责制不仅确定中央各部要抽调得力干部参与上访接待工作，而且要深入上访群众中调查研究，开展细致的思想说服工作，动员并陪同他们返回原地，查明情况，善始善终落实政策，时限半年。任务重，时间急，中央有关各部要火速行动，进行紧急动员。广大干部明知这是一件苦差事，但为了替群众伸冤，为党中央分忧，仍然争相报名。有些刚获得“解放”、恢复工作的干部，明确表示：“我们的冤案平反了，现在应该设身处地帮助别人落实政策。”一些抗日和解放战争期间参加工作的老干部，年龄虽大，也不甘落后，执意为拨乱反正、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贡献力量。

9月8日，党中央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召开动员大会。中央机关抽调的1000多干部云集会场，由中办负责人冯文彬传达已任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的指示，并作了动员报告。要求到会干部在处理上访问题过程中，应旗帜鲜明，严肃认真，切实关心群众疾苦，体察民间

冤情，大力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以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他指出：陪同上访人员下去的干部，主要任务是督促、协助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切实解决确有冤情的上访人员的问题。还要通过这项工作，考察和调整一些地方的领导班子。

到会干部深感责任重大，个个情绪高昂，决心按中央指示推动落实党的政策，使上访人员的问题尽快得到妥善处理，为巩固刚出现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而努力。

当时工作条件十分艰苦，许多部委机关刚恢复，交通车辆严重缺乏。散会后，1000名干部均由各部委司局级干部带队，按预定计划分头挤公共汽车，或骑自行车分赴北京各联合接待站，深入上访群众中开展工作，主动登门调查研究。

起初，上访人员对工作组持怀疑观望态度。加之有人挑唆，散布流言蜚语，许多上访群众不愿轻易离京。有人受冤太久、太深，坚持在京解决问题。有的甚至情绪对立，举止失控。但各工作组仍不急不燥，大家自带干粮，天天乘公共汽车、骑自行车，按时到上访人员中苦口婆心做思想工作，反复宣传中央拨乱反正、落实政策的决心，诚心诚意表明要陪他们去各地推动落实政策，切实解决问题，甚至把准备好的火车票掏给他们看。

功夫不负有心人，各工作组的热忱心肠终被千万名上访群众理解和接受，对立情绪消失了，矛盾化解了，上访群众变怀疑为信任。9月14日，北京各火车站一片繁忙景象，数万名长期滞留首都的上访人流，在中央工作组1000多干部的陪同下，终于有序地登上南去北往的火车，带着落实政策的希望，高高兴兴返回各地。轰动一时的上访大潮退了，首都街头重新恢复了平静。但党的政策能不能彻底落实，上访大潮能不能重返北京，人们拭目以待。更加艰苦细致的工作，也在各地等待着中央工作组的到来。

由胡绩伟任总编辑的《人民日报》紧密配合，曾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题为《正确对待上访问题》的文章，为中央工作组的出动大造舆

论，鸣锣开道。

党中央对上访工作抓得很紧，一个半月后，中央书记处又在北京再次召开上访工作座谈会，听取各地工作组的汇报，了解工作进展，研究应解决的问题。总书记胡耀邦在会上阐述了做好上访工作的几条原则：1. 凡属群众中合理而能解决的要求，就要主动地办；2. 凡属群众中间的正确意见，各级组织要向上反映；3. 凡属广大人民的呼声，一定要听，但对社会上那种违法乱纪、捣乱破坏的行为，必须坚决斗争。

“屁案”荒唐离奇 奸人一一受惩

在全国信访工作大发动的高潮中，各地党政机关先后查处了一批久拖不办的冤假错案。有些冤案离奇，令人触目惊心。贵州省松桃县牛郎区的“屁案”，就是其中的典型。

1976年元月中旬，牛郎区一群苗、汉青年正在改河截流。夜晚，菜园大队的青年们疲惫不堪，在工地上围着篝火谈笑聊天。突然，一个叫龙政云的青年放了一个响屁，引得人们一阵笑闹。众人围着他奚落取笑。小龙很爱面子，被闹哭了，气恼中说：“惹我火了，要杀你们两个！”

这句随意说的气话，却闯下大祸。受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有人立即向大队汇报敌情：“地主子弟龙政云要杀革命群众。”民兵副连长和公社武装部长，随之将龙捆绑到工地指挥部连夜吊打，大搞逼供。年仅20岁的小龙忍受不了皮肉之苦，假供其父龙德灿、叔叔龙年灿、堂兄龙茂云等要杀人。

于是这3人又被抓去严刑拷打，刑讯逼供，承认龙茂云的姑父吴献保“有两千人要暴动，要杀人。”

问题越追越大，敌情越追越严重。公社武装部长火速向区公安特派员和区武装部长彭忠胜、区委书记龙文飞汇报。此时，正赶上北京出现“四人帮”制造的“天安门事件”。一向

1985年9月，
胡耀邦在甘肃陇
南山区视察时在
地头与群众交谈



靠抓阶级斗争升官的区委书记龙文飞，感到向上爬的机会难得，大搞上挂下联。他甚至荒唐地提出：“邓小平的一只脚已插到牛郎区”，鼓吹“要追查黑爪牙”、“反击右倾翻案风”、“剿灭小平村”。指派民兵小分队在农村到处抓人，连夜突击审讯，掀起一个“追反”高潮。区委和5个公社、28个大队，均设“追反”领导小组，下辖武装小分队和专案组两个班子。审讯员、记录员、看守员、巡逻员共达415人，各司其职。武装小分队，昼夜轮班活动；专案组白天睡觉，夜间审讯用刑。

在审讯过程中，龙政云的父亲因交待不出更多的反革命，被连续吊打，逼得走投无路，含着悲愤用石块猛砸头部，鲜血直流，气息奄奄时被拖出去活埋了。

“追反”运动由菜园大队向牛郎大队扩展。他们将无辜的贫农杨再德深夜抓去拷打审讯，杨同他们据理力争，被打得头破血流后关进私设的牢房。满腹冤愤的杨再德勇敢抗争，通宵高唱《东方红》。武装小分队向区委汇报说：“杨再德整夜唱歌，是向反革命发信号，看来是个大人物。”于是，他们将其定为“反革命暴动集团副总指挥”，连续吊打12小时，使杨双臂致残。

不久，龙文飞又突发奇想：“农村到处都抓出反革命分子，为什么区机关一个也没有？运动发展不平衡，必须深挖。”据此，他提出用“农村包围城市的办法，深挖区机关的反革命”。区机关共130多人，先后挖出“反革命”53人。顿时，区机关职工干部人人自危。而被人称为彭霸天的武装部长，却因“追反”有功，升为区委副书记。

在“追反”运动中，许多群众忍受不了严刑拷打，只好乱编假口供。反革命数字像滚雪球似地越滚越大。

如此重大敌情，令人难以置信。地、县公安部门曾多次建议停止。但有县委中的极左领导人的支持，牛郎区的追反运动继续发展。据5个公社统计，共挖出反革命暴乱集团36个，反革命成员1359人，涉及十多个区、五个县、两个省。

粉碎“四人帮”后，反手为云覆手为雨的龙文飞等人，又利用手中大权，把被他们定为反革命分子的群众，又诬蔑为“四人帮”的“社会基础”，“不准刮翻案风”。甚至警告被“交待班”释放的群众，出去后不得上访告状。

受害群众太多，有些胆大的人，通过在外地工作的亲友，或秘密转到四川、湖南、偷偷

向党中央发出一封封申诉信。

然而上访谈何容易。“追反”中被吊打致残的杨再德，支撑着断臂苦苦写了 21 封申诉信寄出，但都石沉大海，杳无音讯。有一天，制造冤假错案的龙文飞书记，在区干部大会上竟举着一叠上访信得意洋洋：“你们告吧！看，告状信都转到了我这里，谁还逃得出我的手掌心啊！”

杨再德是名硬汉子，他相信共产党的政策必胜，极左人物必败。他起早贪黑写，又先后写了 22 封信包好，于 1978 年下半年告别家人，踏上进京上访的征途。贵州山路漫漫，道路崎岖。中途巧遇两位进京上访难友，三人结伴而行，相互帮助，苦苦徒步走了 300 多里路，终于到达玉屏火车站，登上北京的列车，向北京进发。

当他们长途跋涉来到首都时，京城上访人员已经络绎不绝。他们先后向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日报社、国务院信访局递交了告状信。中央联合接待站的同志热情接待了他们，耐心听取他们的申诉。

这是涉及一千多人身家性命的重大冤案，情况紧急，冤情简报迅即送进中南海，中央领导同志明确批示严肃查处。

贵州省委闻风而动，责成铜仁地委立即成立平反牛郎区“追反”冤案领导小组开展工作。通过调查，苗乡终于拨开乌云重见晴天：36 个反革命暴乱集团彻底平反；1359 名“反革命”彻底平反；被枪杀的 6 人、打死的 13 人、逼死的 13 人，全部平反昭雪。随后，一大批救济粮、款也发放到死者亲属和受害人家中。医务部门还给被打伤致残的 263 人免费治疗。

“追反”冤案主犯龙文飞身败名裂，畏罪自杀。区委副书记彭忠胜和公社副书记藤久先等依法逮捕法办，分别判刑 10 年和 7 年。“左”倾思想严重的县委班子改组。

因此案关系重大，涉及民族政策，省、地联合工作组和地、县委领导，还特地牛郎区召开平反昭雪大会，大张旗鼓惩恶扬善，为民伸冤。

信访任务艰巨

难以一劳永逸

认真接待和处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是我们党和政府了解民意、体察民情，加强与群众密切联系的重要方式和途径。早在革命根据地时期，党的领导人就有亲自接待群众来信来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建国后，各级党政机关都设有信访机构，毛主席、周总理多次阅处人民来信，接待上访群众，甚至同上访群众一起用餐，边吃边了解情况。

粉碎“四人帮”后，各地信访机构和工作虽逐步恢复，但阻力很大，工作得不到应有重视。1979 年 1 月，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后，曾指示：每个领导干部平均每天要看一两封有典型意义的群众来信，秘书不能借口爱护首长而任意扣压。他身体力行，平均每年阅处三、四百封。阅处群众来信，已成为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从一封封来自基层和普通百姓的信件中，了解社会问题，倾听群众呼声，改进党和政府的工作。

1979 年 9 月，党中央组织的一千多人信访工作组，更是有口皆碑，大得人心。它为清除“左”倾流毒，督促各地党政领导关心群众疾苦，体察民间冤情，切实落实党的政策，推动信访工作顺利开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同年 12 月 31 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10 年动乱期间，全国法院系统共判处反革命案件 287000 余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尤其是中央派出工作组督办以来，已复查 241000 余件，约占总数的 83%；从中纠正冤假错案 131300 余件，约占复查的 54%。正视现实，而不回避矛盾；想方设法化解矛盾，而不激化矛盾，即使问题积案如山，也并非不能逐一解决。1979 年出现的那场震惊中外的上访大潮，由高潮到退潮，由大乱到大治，最后达到大安——全国安定团结，同心协力抓经济、搞建设，就是历史的例证。

（责任编辑 致 中）



蔡元培 在北大的 辞职风波

● 萧 实

1916年冬主掌北大的蔡元培，虽为一校之长，但待人接物总是彬彬有礼，他也因此博得了“好人”的称号。但是，他绝不是世俗的“滥好人”，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他是绝不让步的。关于这一点，有很多故事流传后世。其中，老北大人津津乐道是这样一个故事：

1930年，国民党某省政府改组，一个北大同学请蔡元培向蒋介石推荐人选，并托老同学联名致电蔡先生促成。蔡元培很快回了电，电文只一句话：“我不长朕即国家之焰”。由此可以看出他在大问题上的不妥协。

其实，最能表现蔡先生学人风范的，还是他在五四运动期间为国家、为学生不屈服的大义举动。

五四运动爆发的基本原因，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加紧侵略，和北洋军阀政府对内残酷压迫、对外妥协投降所造成的民族危机；而直接的导火线，则是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1919年在巴黎近郊凡尔赛宫召开的所谓“和平会议”，列强们不仅无理拒绝中国提出的废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的正义要求，还进而决定由日本接管德国原在我山东的全部权益。北洋军阀政府竟准备在这样的“和约”上签字。消息传来，举国愤慨。1919年5月4日下午，由北京大学学生发起，联同北京各大专院校三千多人，在天安门前集会，举行游行示威，要求严惩亲日的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巡警追捕学生三十余人，其余学生回校后，立即在北大法科开会，商讨对策。

蔡元培得知后，立即赶到会场，对学生们的正义举动表示赞同，但是，为了使运动有理、有节，他要求同学们按照法律办事，并找来法学专家王宠惠帮助他们。王宠惠与同学们共同研讨对付警察厅的法律手续问题。

5月5日，各大专院校学生因三十几个爱国同学被捕，以全体罢课来抗议力争。5日、6日两天，蔡元培召集各大专院校校长在北大开会，商讨保护学生的对策。与会者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学生此举，是集体公共行动，不应由被捕的少数学生负责。若谓此次运动是从学校里发生的，应当由各校校长负责，由各校校长自身戴罪。6日下午，蔡元培和各校校长同往教育部，要求释放被捕学生。教育总长傅增湘允诺向国务总理钱能训疏通。但是北洋军阀政府不但要严惩学生，解散各大专学校，而且还放出了更换蔡元培及各校校长的口风。事实上，蔡元培出长北大，容纳新潮，大倡改革，北洋军阀政府早就有去之而后快的念头。据说政府会议时，傅增湘曾为蔡先生辩解，钱能训怒斥说：“汝谓蔡鹤卿校长地位不能动摇，假如蔡死则何如？”其潜台词很明显：北洋政府不但要赶走蔡元培，甚至动了谋害的念头。从下文摘录的蔡元培与天津一

记者的谈话内容，也能证实这一点。

后来，北洋政府迫不得已，于7日上午将被捕学生全部释放。

学生虽然获得了释放，但是，蔡元培为了抗议北洋政府的暴行，于8日向教育部提出了辞呈：

为呈请辞职事：窃元培自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以来，奉职无状，久思引退。适近日本校全体学生又以爱国热诚，激而为骚扰之举动，约束无方，本当即行辞职。徒以少数学生被拘警署，其他学生不忍以全体之咎归诸少数，终日皇皇，不能上课，本校秩序极难维持，不欲轻卸责任，重滋罪戾。今被拘各生业已保释，全体学生均照常上课。兹事业已告一段落。元培若再尸位本校，不特内疚无穷，亦大有累于大总统暨教育总长知人之明。敬竭诚呈请解职，并已即日离校。一切校务暂请温宗禹（时任北大工科学长——引者注）学长代行。敬请大总统简任能者，刻期接任，实为公便。谨呈。

5月9日清晨5时，蔡元培给北大学生留下一纸启事后秘密乘车去天津。启事写道：

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

北大师生在得知蔡元培离校出京后，群情激动。在紧急发电上海各报、各团体代为挽留，并上书教育部要求急速挽留蔡元培后，又联络北京各大学共派代表二十余人赶往天津，挽留蔡校长回校。代表们在津未

得他的踪迹，公推四人追踪南下，天津学生也派人一同前往。

蔡元培在途中得知后，立即给北大学生写了一封信：

北京大学同学诸君鉴：

仆深信诸君本月四日之举，纯出于爱国之热诚。仆亦国民之一，岂有不满于诸君之理。惟在校言校，为国立大学校长者，当然引咎辞职。仆所以不予五日即提出辞呈者，以有少数学生被拘警署，不得不立于校长之地位，以为之尽力也。今幸承教育总长、警察总监之主持，及他校校长之援助，被拘诸生，均经保释，仆所能尽之责，止于此矣。如不辞职，更待何时。至一面提出辞呈，一面出京，且不以行踪告人者，所以避挽留之虚套，而促继任者之早于发表，无他意也。北京大学之教授会，已有成效，教务处亦已组成，校长一人之去职，决无妨于校务。惟恐诸君或不见谅，以为仆之去职，有不满意于诸君之意，故特于途中匆促书此，以求谅于诸君。

十日 蔡元培启

蔡元培辞职出京，引起全国学界的极大关切。上海学生联合会5月15日发表的宣言表达了全国学生对他的爱戴之意：

蔡先生文章道德，中外推崇。自长大学，全国学界始有发皇振厉之气。乃一二顽冥奸佞之徒，竟不容思想界有一线生机，竟不容世界潮流有一分输入。夫蔡先生去，则大学虽存犹死；大学死，则从此中国之学术思想尽入一二有权威者掌握之中，而学界前途遂



1912年1月3日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时，出席孙中山主持的南京临时政府第一次内阁会议。中为孙中山，左三为蔡元培

堕于万劫不复之境。岂惟蔡先生一人、北京大学一校之关系，中华将来之文明，实将于此决其命运。

基于这种认识，全国学生恳切慰留蔡校长和傅增湘教育总长（傅因在政府中抗争无力而于11日辞职）作为向北洋军阀政府提出的六大政治要求之一。

正当北京师生遍寻蔡元培时，5月17日天津《益世报》报道了他的行踪：

本埠确实消息：蔡子民已于十日乘津浦车南下。登车时，适有一素居天津之友人往车站送他客。遇蔡君，大诧异曰：“君何以亦南行？”蔡君曰：“我已辞职。”友曰：“辞职当然。但何以如此坚决？”蔡曰：“我不得不然。当北京学生示威运动之后，即有人频频来告，谓政府方面之观察，于四日之举，全在于蔡。蔡某不去，难犹未已。于是，有焚烧大学、暗杀校长之计划，我虽闻之，犹不以为意也。八日午后，有一平日甚有交谊而与政府接近之人又致一警告，谓‘君何以尚不出京？岂不闻焚烧大学，暗杀校长等消息乎？’我曰：‘诚闻之，然我以为此等不过反对党恫吓之词，可置之不理也。’其人曰：‘不然，君不去，将大不利于学生。在政府方面，以为君一去，则学生实无能为力，故此时以去君为第一义。君不闻此案已送檢察厅，明日即将传讯乎？彼等决定，如君不去，则将严办此等学生，以陷君子极痛心之境，终不能不去。如君早去，则彼等料学生当无能为力，将表示宽大之意敷衍之，或者不复追究也。’我闻此语大有理，好在辞呈早已预备，故即于是晚分头送去，而明晨速即离校，以保全此等无辜之学生。”

询以此后作何计划，蔡曰：“我将先回故乡视舍弟，并觅一幽僻之处，杜门谢客，温习德、法文，并学英语。以一半时力，译最详明之西洋美术史一部，最著名之美学若干部。此即我此后报国之道也。”

在北京及全国各界积极声援的压力下，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才假惺惺地发布批复不让蔡先生辞职的指令。北京各校教职员联合会立即电报通知蔡元培，并派代表去杭州催他回京。蔡元培深恐因他个人去留问题使北大学生失学，即于5月20日复电同意回任：

大总统、总理、教育总长钧鉴：奉大总统指令慰留，不胜愧悚。学生举动，逾越常轨，元培当任其咎，政府果曲谅学生爱国愚诚，宽其既往，以慰舆情，培亦何敢不勉任维持，共图补救。谨陈下悃，仁候明示。

元培

但是，北洋政府的挽留令只是迫于全国的压力而做样子而已，暗地里却早已打算让曾被学生驱逐过的胡钧接任北大校长。6月6日，徐世昌便迫不及待发布“任命胡仁源署北京大学校长”的命令。北大师生坚决抗拒，北洋政府不得不把胡仁源调到教育部去任职，而

由国务院及教育部于17日（洽）和18日（巧）连发两电，促请蔡元培即日返京复任。蔡元培当然明白，国务院的洽电和教育部的巧电，不过是迫于学生坚决拒胡，为敷衍北大师生而发的，根本没有挽留自己的诚意。因此，他于20日复电，再次提请解职。

此后，随着五四运动的胜利进行，在全国范围的革命群众运动的洪流冲击下，北洋政府被迫释放被捕的学生，罢免了曹汝霖、陆宗輿、章宗祥官职，并正式宣布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伴随着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胜利，北京各大专学校的秩序逐步恢复。北京大学及北京学界多次给蔡元培发去电报，催促他复职。7月9日，蔡元培发出一电，表示放弃辞职之意，并嘱望学生们安心求学：

上海全国学生联合会、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北京大学学生干事部公鉴：仆出京以后，宿疾屡发，本拟藉此息肩。乃叠接函电，并由方、杨、朱、许、蒋、李、熊、狄诸君代表，备述诸君雅意；重以各方面责望之殷，已不容坚持初志。惟深望诸君亦能推爱仆之心，有所觉悟；否则，教育前途必生障碍。非特仆难辞咎，诸君亦与有责焉。

元培挂

北大全体学生和北京市学联、全国学联立即复电，对蔡先生“惠然肯来”，咸表欣慰，并表示“此后当益自策励，求学救国”。蔡元培发表《告北大学生及全国学界书》，高度评价了学生的爱国运动，表达了对学生的殷切关怀之情。7月21日，蔡元培又由杭州电告全国学界，呼吁全国学生以学术为重，迅即复课：

全国学生联合会鉴：五四以来，学界牺牲极大。现在六条要求均有相当解决。希望通电全国学生诸君，一律上课，以慰国民之望。蔡元培

设在上海的全国学生联合会随即响应蔡元培的电示，第二天即发表宣言，宣告：自今日终止罢课。同一天，北大全体学生也发出宣言，响应蔡元培的复课要求。

蔡元培原拟立即回校，由于胃病尚未痊愈，得教育部许可，暂时留杭医治。9月12日，蔡元培由杭州到达北京，主持北大校务。20日，举行开学典礼和全体师生欢迎会。他发表演说，着重说明德国大学的学长和校长均每年一换，由教授会公举，校长且由哲学、法学、医学和神学四科的教授轮值选任，从未发生纠纷。他认为五四运动过程中，北大因校长去留问题引起了很大纠纷，影响了校务和学生的学业。为避免重蹈覆辙，他表示此后要使北大的教授会更为健全，从而使学校不因校长一人的去留而妨害校务。

（责任编辑 洛松）

回顾总政创作室反右派运动

黎白

1957年6月开始在全国掀起的反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毫无例外地在军队系统展开了。总政治部文化部创作室（全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学美术创作室）是首当其冲，展开最早的一个军内单位。从1957年初鸣放开始，接着展开反右派斗争，进而开展整风第四阶段至最后的组织处理，全部运动进行了整整一年，直至决定创作室撤销。我当时是创作室的创作员，经历了全过程。这是一段值得引以为训的、沉痛的历史。我想，将它写出，也是有益的。

一、昙花一现的总政创作室

总政创作室建立于1956年，它是以文化部原有的临时创作组人员、从各大军区调来部分文学、美术方面的创作人员及部分参加莲花池“肃反”后留下来的少数创作人员组成的。有文学、美术创作人员及两位秘书。创作室主任是虞棘（兼电影处长，创作室党支部书记）、副主任魏巍、文学创作员蒿柳杞、丁毅、胡可、杜烽、徐光耀、西虹、周洁夫、史超、寒风、郭光、韩希梁、张桂、沈默君、黄宗江、陆柱国、白桦、公刘、黎白，秘书柳琪祥、夏信荣，美术创作员艾炎（组长）、关夫生、高虹、彭彬、刘岩、何孔德、黄胄、张祖武。其中，胡可是党支部宣传委员、黎白是党支部组织委员。创作室组成后，由于创作需要，由创作室借调代管的各军区创作人员有徐孔、林子、樊斌、郭良信、孙景瑞。

在鸣放、反右时期，创作员郭光因病未能参加运动。丁毅调总政文工团，西虹调《解放军报》，实际上都没有在创作室参加反右运动。张桂是反右初期由解放军文艺社调来后参加运动的。所以，创作室在编内人员只有27人参加了运动，非在编人员6人中有5人参加运动。实际参加创作室反右的总计32人。被划为右派分子的8人，受中右、党内处分或遣回单位继续批

判的计有7人。也就是说，受处分的人数为15人，占整个创作室人员的近一半。

可以说，创作室从1956年成立至1958年结束，主要是经历了一场反右派运动，是绝无美妙可言的昙花一现。

二、“四人文章” 和“灯下漫笔”

1956年文艺界受中央“八大”精神的鼓舞，及在这之前的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的方针和5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报告会上，宣传部长陆定一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题的讲话所鼓舞，或者更早一些的1月4日至20日，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周恩来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还指出：正确地解决知识分子问题，更充分地动员和发挥他们的力量，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已成为我们努力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重要条件。在这个会上，毛泽东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这许多重要精神，很自然地鼓舞了广大知识分子，特别是党外的著名的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活跃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在许多报刊上相当大量地出现了一批“百家争鸣”的言论和文章，其中有些文章大大不同于1942年延安整风以来的一贯观点，也就引起了一部分主管文艺的及相关的人士看不下去。总政治部文化部长陈沂在《学习》杂志上发表了《灯下漫笔》，总政文化部四个处长级的领导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勤联名在1957年1月7日《人民日报》

上发表了“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即后来通称的“四人文章”。应当说，这两篇发表在党刊、党报上的文章也是各抒己见，是一家之鸣。但却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文艺界相当一部分人受到震动，认为这是反击或反击的先兆，不是“放”而是“收”的先兆。因为多少年来，人们没有百家争鸣的习惯，一些人被整怕了，产生这些疑虑和反感，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时任何人也想不到的是：1957年3月6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有党外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12日，毛泽东发表讲话，着重讲了知识分子问题，准备整风和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问题，强调要继续贯彻“双百”方针。在这前后，中央批评了《人民日报》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的，反对中央的方针的，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的。”在毛泽东参加的颐年堂会议上，总政治部文化部长陈沂挨了批评，指责他在《学习》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是阻碍鸣放，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4月10日，挨了中央严厉批评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其中写着：“党内有不少同志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实际上是不同意的。因此，他们就片面地收集了一些消极的现象加以渲染和夸大，企图由此来证明这一方针的‘危害’，由此来‘劝告’党赶快改变自己的方针”。又指出，在本报1月7日所发表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就是这种倾向的代表。并认为这种方针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又强调目前的问题不是放得太宽，而是放得不够。

这又是一个晴天霹雳。它鼓舞了许许多多的人，也使陈沂和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勤这几位部队文化文艺工作领导人震惊得无所适从。陈沂是直接受到毛泽东批评阻碍鸣放的、当时党内军内的高级领导人，他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并决心紧跟中央的步伐，亲自到军内几座院校鼓励鸣放。他在发言中曾说：我从1927年入党，一直是跟着党走的，没有党就没有我，没有党，我就会是“解甲归田无田可种，告老还乡无乡可归”……我的文章阻碍了鸣放，与中央的精神相抵触，犯了错误，我改正，希望大家鸣放，帮助党整风（这是陈沂讲话的大意）。更没想到的是陈沂这个讲话中的“解甲归田无田可种，告老还乡无乡可归”十六个字，成为他不久被划为右派的“猖狂向党进攻”的主要罪状。其他四位处长在鸣放及反右中也大都是一付等待挨批的模样，有的人也确实挨了批。

这是鸣放前及后来反右中，总政治部文化部及所属文化单位形成混乱的一个重大原因。恰当地说，总政文化部及创作室的反右派运动很难讲是由总政文化部领导的。



1951年黎白在华东军区炮兵英雄
代表大会上代表华北炮兵致词

三、没有形成热潮的鸣放

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点名批评了“四人文章”，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之后，中央召开了一系列各民主党派和科学、文化、文艺院校领导、知名人士的座谈会，鸣放掀起了高潮。

总政创作室也召开了为数不多的鸣放座谈会。据我亲身经历，创作室单独召开的座谈会并不多，我在鸣放初期到烟台去创作未曾奉调返京参加；还有一些创作员或深入生活，或进行创作，也未奉命返京参加鸣放。我是5月份返京后参加了一次创作室部分人员的座谈会及一次由总政文化部解放军文艺社组织召开的，有部分创作室人员参加的座谈会。当时，有不少同志发表了意见，也有过不同看法的发言，但并没有形成激烈的争论，都是比较心平气和，和风细雨的。我记得在座谈会上，公刘提出“莲花池”肃反搞得过火了，伤害了感情。他的发言也得到一些同志的同意。我却在会上发言表示不同意公刘的意见。公刘没有反驳我，与会的其他同志也没有反驳公刘和我。会后，我受到了支部书记虞棘的批评，说我身为支部组织委员却阻碍鸣放。他讲了陈沂及“四人文章”受批评的情况，而我在这之前不在北京，是不清楚的。但，我对这个批评也不很心服，我向虞棘说：我发言是讲明当时肃反的事实并没有错呀。虞棘只说：“鸣放嘛，让人家讲就是了。陈部长是受了毛主席的当面批评呢。

凡是对鸣放不利的话都不该说。”我当时有些胡里胡涂，我认为虞棘似乎也并不很清楚。

在解放军文艺社召开的座谈会上，与会者的发言大多与社会上的鸣放联起来了。徐光耀刚从他的生活基地回京，他发言是肯定双百方针的，形容为“海阔凭鱼跃。”我发言中提到了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我说：我认为费孝通同志的文章写得不错，可以借鉴，虽然我们部队并不如此复杂……会上，杜烽等同志还提到了全国戏剧家协会的鸣放和美术家协会的鸣放。后来，大部分发言发表在《解放军文艺》上，有的发言也就成为以后的白纸黑字铁证如山的罪状。回顾我参加的两次座谈会上的所有发言，我认为即使在当时也是以拥护整风、帮助整风为目的的。尽管报刊上已发表有激烈的言论，这两个座谈会上的发言却是“低调”的。

与此同时，创作室部分同志介入了文艺界鸣放热潮之中。美术组艾炎等同志参加了美协的鸣放；杜烽力求联系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同志一起到剧协参加鸣放。白桦单独去云南到昆明军区文艺单位和省文联支持并鼓励鸣放。创作室的作家、画家中的少数同志投入了鸣放热潮之中。鸣放的核心内容仍是在贯彻双百方针，力图纠正或改变一些单位确实存在的带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问题，以及力求改变某些过左的粗暴领导作风。应该说，所有动机都是拥护中共中央决议的，即使发言内容和态度也并不是过激的。而创作室的相当多的创作员，基本上没有投入鸣放中间去，有的忙于创作，有的也许出于谨慎。个别创作人员甚至是完全没有参加鸣放座谈，更没有参加社会上的鸣放活动。与当时鸣放高潮的许多单位相比，创作室的鸣放实际上是相当冷清的。这是历史的真实。

事实上，从中共中央于4月27日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起，到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指出了右派分子进攻，并认为党外知识分子中，右派占百分之一到百分之十，还说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这时，反右派的运动已经决定下来了。6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下达。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反右派运动就突然而迅速、猛烈地展开了。所以，从中共中央发出整风指示开始，若可以说是鸣放开始的话，到毛泽东提出“事情正在起变化”，只有十七天的鸣放时间，到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即全国范围内展开反右派运动为止，鸣放的时间也只有40天。总政创作室实际上算不了全力投入鸣

放，也是不足为奇的。

四、“战果”可观的反右派斗争

1957年6月以后，反右派运动来势汹涌的巨浪冲激得总政文化部及创作室一片混乱，形成了手足失措的局面。文化部长陈沂已是作为重点在总政范围内接受批判的主要人物，陈其通担任总政文工团团长，忐忑不安地领导着文工团的反右运动。陈亚丁一度主持创作室的反右运动，每次开会，他作为主持人总是先表示自己错误接受大家的批判，批判别人时也很少作为领导人发言。更很少参加创作室支部会议对运动开展的研究。鲁勤自己也在接受批判。创作室主任虞棘则被一些人认为是陈沂的山东帮重要谋士，尽管虞棘是创作室反右的主要主持人，看来也只是依当时的气候，查阅鸣放发言，尽可能打出个右派分子来。所以，创作室开始反右时，是乱了阵角的领导人在进行领导，支部也很少有对室内人员排队研究或事先预定打出多少右派分子。我作为党支部组织委员，类似以上内容的支委会一次也没有参加过。几乎形成了谁有鸣放言论，甚至没有鸣放言论也要相互揭发的局面。最早“揪出来”的樊斌、吴占一等并不是创作室的编制内的成员。樊斌是昆明军区的成员，他从小在部队担任卫生员，他的新作《雪山英雄》在当时有很好的反应，因此参加了全国青年文艺工作者代表会议。我是在这个会上才认识他的。以后留在创作室代管进行创作，我曾兼过创作室秘书，又是党支部组织委员，才与他有一些往来，给我的印象是非常朴实的。反右派运动开始之后，我记得樊斌参加过不多的几次会，其中也包括揭发和批判徐光耀和我的会议。他在创作室被打成右派，我没有参加过揭发和批判，但我知道只是由于他在鸣放会上讲过几句激烈的话，又被断章取义地加以发挥，颇为简单地就划为右派。吴占一被划为右派更加简单，他原是总政文化部的秘书，曾随总政副主任甘泗淇去参加苏联归还旅顺港的活动。听到过甘副主任讲了几句对驻旅顺、大连的苏联红军不满的话，回到北京向几个同志顺便讲过。就以反苏的罪名划为右派。他们两人定为右派，依我的记忆，创作室支部大会和支委会都没有研究确定上报或正式表决过。如何就被划为右派的，我至今一无所知。而且，他们也很早就离开创作室。

创作室反右时期进行揭发批判是分两个组进行的。文学组是在虞棘、魏巍主持下进行，而美术组是在另处进行的。

文学组的反右运动，我是全过程都参加了。

在揭发和批判徐光耀和我的同时，刘刘被批判了

几次，定他为右派的“罪状”并不复杂，一是他在鸣放中攻击肃反，他确在鸣放会上发言对总政文化部莲花池肃反提出过批评。这个会我参加了，但绝对不是攻击全国的“肃反”运动。二是他发表过的几首古诗体诗，被上纲为恶毒攻击社会主义的祖国。这是无法理喻的。三是对他过去历史的某些已经作过组织结论的问题旧事重提，很简单地定为右派。再一位是沈默君，对他的揭发批判会议开了三四次。沈默君在鸣放会上没有发过言，找不到他有什么攻击言论。依他平时的作风及品质，几乎众口一致地认为他应划为右派分子。只有我一个人不识趣地在会上发言表示这是反右派运动，他没有右派言论就不应该划为右派。依其作风划为坏分子也不能划为右派。当然，他最后还是被定为右派分子。另一位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是白桦。他是被令回京在创作室参加反右的。他正在积极揭发批判别人，昆明军区党委来电给总政治部揭发他在昆明军区的“罪行”，并要求划他为右派，经过总政批准了。所以，白桦划定为右派并不是创作室揭发出来的。

反右派运动初期，作协党组从6月6日陆续召开了党组扩大会议，至8月6日结束。8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重大进展，突破了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报道。与作协党组扩大会同时，被认为与丁陈反党集团有牵连的人也在被揭发和批判。在创作室的创作员中，徐光耀和我都是原晋察冀边区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文学系的学员，陈企霞是系主任。徐光耀在建国后又曾在丁玲主持的文学研究所学习。所以，我们被定为“丁陈反党集团在军内的骨干”而被揭发和批判。徐光耀的“罪状”主要是替丁玲翻案，经济上支持陈企霞。这个罪名是毫无道理的。关于替丁玲翻案，是指1956年作协党组曾写过一封公函，要求总政创作室党组织让徐光耀写一份丁玲在主持文学研究所时期被揭发的几个问题的看法和证明。我当时是组织委员，即将作协党组的信面交徐光耀，请他写一份材料。他当时表示没有必要写。我认为作协党组的要求，又是以组织对组织的来函，还是写的为宜。他查阅了他的日记后，很认真地、实事求是地写了一份材料。这怎么能认为是徐光耀恶毒攻击作协党组，蓄意为丁玲“翻案”呢？而在经济上支援陈企霞，也和右派罪行丝毫不沾边。陈企霞在“肃反”中被隔离审查很久，1956年后或1957年初被解除隔离后，有同学来找到徐光耀，说陈企霞生活很困难需要帮助，这种帮助还不能被陈企霞知道，否则，陈不会接受。徐光耀相信了这位同学的话，出于对老师的尊重和情感，他又刚刚有些稿费，就支援给陈企霞几百元。这两条罪状就将徐光耀划为右派分子了。徐光耀1938年13岁时参加革命，长期在部队工作，

为人朴实，自律很严，鸣放时，他正在农村深入生活，被调回京不久就被划为右派。以他的为人，品德和言行，划为右派，即使是创作室的几个少数处于整人位置的人也感到意外。

我与徐光耀属于“同案犯”。唯一一件事似应讲一下，即会上对我曾经“系统地恶毒攻击赫鲁晓夫”这一罪状，在被批判时，给我内心的震动超过了这个“罪状”的本身。创作室反右运动中后期，某作家批判我时说：我们对赫鲁晓夫同志的秘密报告也有意见，但是我们拥护苏联共产党，拥护赫鲁晓夫同志，你根本不同，你对苏共，对赫鲁晓夫同志，对我们党都有刻骨仇恨，你反党思想深入骨髓……尽管我和这位作家在调到创作室之前彼此并不认识，只知道他发表的一些作品，对他也有敬意。而他这个批判却使我按捺不住，当场和他抗争起来。以前，他对我毫无了解，依当时对干部的要求条件而论，我不是剥削家庭出身，14岁参加革命，16岁入党，在部队一贯立功受奖，没有受过处分……说我对党有刻骨仇恨、深入骨髓的根据何在？为什么在如此严酷的运动中如此恶毒地落井下石？若是为了“维护党的利益”，我在鸣放中并没有反党言论，若是由于个人恩怨，我从来也没有得罪过他。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他对赫鲁晓夫有意见是对苏共的拥护，我对赫鲁晓夫有意见就变成对苏共对党有刻骨仇恨？这种“理直气壮”的诡辩无非是他居于批判别人的位置，被批判的人只能低头认罪吧？当时我实在无法忍下去，他拍桌子，我也拍桌子。我至今以为写出这个细节并非插曲，并非个人恩怨。它反映出一些人在大风浪中的政治品德，骨梗在喉，不能不讲。

对我的定性有过反复。最初，创作室主持运动的几位同志并未都要把我划为右派，而是定为中右分子，给予留党查看两年的党内处分。但原总政文化部某副部长此前不久调到作协担任书记，他向总政治部谭政主任提出：黎白是丁陈反党集团在部队的重要骨干分子，必须划为右派分子。而担任总政纪委书记的联络部长张桢祥同志坚持不改变原来决定的处分，所以，我仍按原处分处理，没有被划为右派分子。老实说，我当时根本不可能知道一旦被划为右派分子，几乎永世不得翻身。历史证明，凡是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如果还能幸存下来，也是经历了20年的非人生活啊！我几经反复，最后没有被定为右派分子，实在是不幸中之大幸。所以，至今我极为感谢我并不认识的张桢祥同志。

到了1958年初，创作室反右运动告一段落时，在创作室中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有徐光耀、艾炎、公刘、何孔德、沈默君、白桦、樊斌、吴占一等八名。徐孔

被调回原单位也被划为右派。被划为中右分子及受到处分的或处理的有寒风、黎白、林子、韩希梁、刘崧、张祖武等六人。两类相加共 19 人，是创作室人员及代管人员的一半。另外 19 人中，丁毅、西虹、郭光或调出或因病未参加创作室的反右运动。胡可、蔺柳杞、史超等又受到反右不力的批评，虞棘属于被批判的对象，柳琪辉、夏信荣是秘书，只参加运动或是记录。郭良信、孙景瑞返回原单位。总政创作室的成员中，在反右派运动里没有挨整的就不多了。

五、反右派后期“整风第四阶段”的风波

1957 年底，创作室的反右派运动初步告一段落，展开“整风”，要求每人写 50 张小字报，内容不限。有的同志“久经考验”，只写了一些“请不要在厕所乱扔手纸”，“请不要随地吐痰”之类的小字报。有的同志“不知深浅”，还是写了一些有关对领导同志的意见等内容。寒风等二同志在他们写的 50 张小字报中有一篇“打油诗”，其中有“老××没主见，跟着××屁股后头转”的词句。寒风尽管在反右运动中因为不够积极受过批评，却还没有什么可称得上右派罪行的言论，这首打油诗却使他在劫难逃，终于被以算老账的方法，受到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并于 1958 年下放到昆明军区所属部队。创作室主任虞棘早已未经改选就被剥夺了党支部书记的职务，在整风中成为被连续揭发批判的重点。后因突然病变住进了医院，对他的批判也就不了了之。到了 1958 年 5 月，被划为右派分子及受了各种处分的创作员已先后离开了创作室，右派分子被正式开除军籍、党籍，分别送往劳改地点及管教单位，其他受了不同处分的同志也都或下放或去农场或遣回原单位。几位主持运动的及没有受到处分的同志有的返回原单位，有的分配到八一电影制片厂，个别人分配到军分区。至此，创作室实际上已是名存实亡了。不久，创作室被总政撤销。

六、反右后所想到的

反右派运动毫无疑问地是一场“左”的政治运动。毛泽东在他写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指出：“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到了 1957 年 9 月 20 日至 10 月 9 日，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

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结论就完全推翻了中共八大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的估计。

对中国广大知识分子，毛泽东又是如何估计、判断并作出结论的呢？他在 1957 年 7 月 9 日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后来编入毛选第五卷，题为《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文中写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过去知识分子这个‘毛’是附在五张‘皮’上，就是吃五张皮的饭。第一张皮，是帝国主义所有制。第二张皮，是封建主义所有制。第三张皮，是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民主革命不是推翻三座大山吗？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第四张皮，是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第五张皮，是小生产所有制。就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所有制。过去的知识分子是附在前三张皮上，或者附在后两张皮上，附在这些皮上吃饭。现在这五张皮还有没有？‘皮之不存’了。”

这个结论是讲在 1957 年，也就是说建国后的第八年。毛泽东所指的是全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他们全部是依附于那五张皮上，几乎把所有知识分子爱国爱党之心和对国家与民族的贡献通通否定了。所以，毛泽东所讲的通过鸣放，引蛇出洞，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就不难理解了。很多人积极响应中央帮助党整风的号召，满腔赤诚地投入鸣放，转眼之间成了对党对社会主义的恶毒攻击；有的人和风细雨，没有说过一句过激的话，有的人甚至一句话没说，也被划成右派，就不足为怪了。即使没被划为右派分子，也统统要进行思想改造，要彻底改变立场。基于如此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判断，即使没有反右派运动，他们在国家中的位置也是明明白白的。因此，“文化大革命”时期，知识分子的位置被排列在“地富反坏右……”之后，被称之为“臭老九”，比历代封建王朝时代认为的“下九流”还要低下，也就“事出有因”，不足为奇了。

这种“左”的错误，对国家的文化事业，对政治生活和经济建设事业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经过几十年，大家都有了切身的感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纠正了“两个凡是”和“左”的错误，平反了大量历史遗留下来的冤假错案，除个别人外，绝大多数右派分子得到改正。尊重知识，重视知识分子，成为党和国家的基本政策，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待遇有了很大提高。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对待知识分子的“左”的政策，有很深远的历史根源，清除它的影响，决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

（责任编辑 致 中）

我在打“AB团”中的经历

● 欧阳毅

肃反扩大化使红军的许多优秀干部、战士蒙冤丧命

1930年，我下放到红一方面军第十师第一团第一连当政委，上任不久，就碰到一件棘手的事，这就是打“AB团”。

1930年10月4日，红一方面军打下江西吉安，从敌伪档案中缴获了一份文件，讲到了“AB团”的事，这可给红军带来极大灾难。

“AB团”是当时国民党潜伏在红色区域的反革命组织。“AB”是英文“反布尔什维克”一词的缩写，“AB团”团员在革命根据地内进行破坏和暗杀活动。他们还组织了宗教式的秘密会道门，预言什么红军有毁灭的征兆。为了拉拢根据地的群众，孤立红军，他们甚至暗中组织起“爱情自由”团体，用女色引诱红军战士。

为了打击“AB团”，肃清打入红军内部的反革命分子，红军总部采取了相应措施。但是，由于在苏区的“AB团”团员的名字都用密码，红军难于及时识破这种密码，加之对“AB团”估计过于严重（后来的材料证明，“AB团”这时已经消声匿迹，红军内部根本没有“AB团”成员），“富田事变”后，红四军曾经出现肃反扩大化现象。而且，在一段时间内，这种扩大化愈演愈烈，打击的面相当大，给红军造成严重损失，使红军的许多优秀干部、战士蒙冤丧命。

红一方面军打长沙失败，部队撤到江西宜黄时，刚好发生了“富田事变”，各军各师都展开了肃清“AB团”的斗争，部队中普遍出现了乱捕乱杀现象，真是谈“AB”色变。

我这个连政委日子不好过了。其他部队的肃反委员会动不动就给人扣顶“AB团”的大帽子，三天两

头抓人杀人，弄得人心慌慌，朝不保夕。更可笑的是抓“AB团”抓到连队来了，一些参加红军不久的年轻农民，大字都不识一个，一夜之间也成了“AB团”，被抓去杀了。我不信这些，也反感红军内部这样疯狂地抓人杀人。所以，我这个连队一个人也没抓，一个人也没有杀。我实在也不忍心，多可爱的小战士啊，打起仗来像猛虎，平日吃苦耐劳，而且都是穷苦人家的孩子，我怎么能为应付上面差事，下手整他们呢？

这样，我就被搞肃反的人看作“消极怠工”、“右



欧阳毅

倾”，被调离了连队。第十师政委李赐凡觉得我当秘书用起来顺手，正后悔把我放下去了，就把我要回去了。

我亲眼看见江西省政治保卫处处长李韶九审讯“犯人”的血腥场景。他咬牙切齿，拿根带刺的荆条亲手打“犯人”，边打边逼问。被打的同志熬不住了就乱招，招谁抓谁。如此恶性循环，不知冤杀了多少好同志。

后来我在红四军第十师当了秘书长。部队转战在江西的一个小地方。一天，我路过一个圩坝回师部去。突然看见有十多个红军干部战士被五花大绑着。我看不过去，又不敢过问，只好低着头走过去。

“欧阳老弟，救救我呀！救救我呀！我不是‘AB团’呀，冤枉呀！”突然有一个人向我叫冤。

我斜眼一看，吓了一跳，是彭琦！宜章琦石彭家人，彭儒的哥哥。他也是宜章暴动后参军的，现在是第十师的参谋。我俩常在师部打乒乓球，没想到他如今也被当“AB团”捉了。

在当时的气氛下，我怎么能救他？我连声都不敢应，一应声马上就会把我当“同党”一起抓走。我忙别过脸，低下头，装作不认识，匆匆朝师部走去，想向师长、政委反映，由他们出面抢救。

跑进师部的门，刚好师政委李赐凡在屋里。这是我宜章初级中学的同学，又一起在学生会工作过，我便毫无顾忌地朝他喊：“李政委，彭琦被抓了，你快想办法救他吧！他喊我救他，我怎么救得了他。”

没想到烧香引出鬼来。我怎么说他都不吭声，木头人似的站着。我催得急了，他突然冒出一句：“救他？有人说你也是‘AB团’哩！”

我一愣，好像五雷轰顶。不过，我很快镇静下来，以攻为守地冲他吼道：“如果说我是‘AB团’，你也是‘AB团’！我俩一起念书，一起搞农民运动，一起上井冈山，如今又在一起工作。”

我这样讲把他吓住了，再不敢吭声。我当时虽然得救了，但彭琦还是被当作“AB团”杀害了。前几年，宜章县送来的烈士名单中没有他的名字。彭儒来找我，请我说明当时的情况。我为他写了证明，详细说明了他被冤杀的过程，最后我用心血写了一句看似口号并非口号的话：“彭琦烈士永垂不朽！遭冤杀的同志们永垂不朽！”

周恩来尖锐地指出： “这种搞法，不是保卫革命， 是危害革命！”

1931年，周恩来来到苏区中央局主政后，成立了国

家政治保卫局，我调到保卫局当秘书，亲耳听到了周恩来对肃反扩大化的处理指示。一天，我随保卫局长邓发去见周恩来。邓发向周恩来汇报了肃反工作情况和目前存在的问题。

周恩来不时地询问一些情况，然后明确地指示说：“保卫工作很重要，肃反工作很重要。但是，那个‘肃反中心论’要不得！能把肃反作为红军工作、苏区工作的中心吗？不行嘛！”

当邓发和我汇报到江西省政治保卫处处长李韶九违反政策，亲自大搞逼供刑讯，弄得人心惶惶，株连一大片，造成肃反扩大化的严重情况时，周恩来坐不住了。他站了起来，在屋子里来回走着，显得很不安，谈话也变得严肃起来。他尖锐地指出：“这样搞法，不是保卫革命，而是危害革命！”

他又坐了下来，跟我们讨论起保卫局的工作来。他指示我们要认真对待肃反扩大化的问题，反复强调：“我们要胜利，要把红旗插到全中国，我们的政策与策略就一定要对头，就一定要团结更多的同志，而不是把我们的同志往反革命那边推。肃反工作切切不可搞神秘化、扩大化了，而是要紧紧依靠群众，一定不能冤枉一个好人！”

在肃反扩大化气氛中，有看法的同志敢怒而不敢言。周恩来同志这样清醒而精辟的指示，这样大胆而果断地拨乱反正，给我们纠正肃反扩大化指明了方向，壮了胆子。

后来，我才了解，周恩来从上海经福建到江西的途中，一路调查，深感肃反扩大化错误的严重和对苏区造成的损失之大，积极采取措施纠正肃反扩大化便成为他进入苏区所抓的第一件大事。1931年1月7日，他到瑞金不久，就主持召开了研究制止肃反扩大化的会议，根据他的报告作出了《关于苏区肃反工作的决议案》，旗帜鲜明地反对肃反扩大化、简单化、肃反中心论，并且强调：“中央局要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承认对于过去肃反工作中路线错误的领导责任。”决议案以中央的名义下发，大面积地纠正了肃反扩大化的严重倾向。

这第一次的会见，给我这个刚到中央机关工作的年轻人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周恩来是那样的有魅力，热情而精明，可对下级是那样的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他与毛泽东、朱德虽然经历、风格不同，但给我留下的印象和产生的敬仰是一样的。

在周副主席的有力干预下，国家政治保卫局大胆纠正肃反扩大化，严肃处理了在打“AB团”中罪行累累的李韶九，中央苏区的肃反扩大化得到了遏止和纠正。

（责任编辑 吴 思）



一九四四年马海德与毛泽东在延安机场

马海德 中国红军中的美国人

● 武际良

六十多年前，当中国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悄悄地传到国民党统治区的时候，驻北平的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和在上海行医的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博士，结伴而行，冲破国民党的严密封锁，到陕北寻找红军。

他们在陕北苏区访问后，斯诺返回北平，而乔治·海德姆留下来参加了红军。临分别时，乔治再三叮嘱斯诺为他保守秘密。后来斯诺在《西行漫记》和报道文章中，只字未写乔治·海德姆。直到1960年，斯诺访问新中国，乔治·海德姆陪同他会见毛泽东主席，才公开亮相。

“穷人需要的不仅是药片，更需要的是医治社会的病症”

乔治·海德姆是一个炼钢工人的儿子。他的父亲纳霍·海德姆，是黎巴嫩人。14岁时，跟随到村里来招工的美国人，背井离乡，漂洋过海，到美国谋生。乔治于1910年9月26日出生在美国纽约州布法罗市（又名水牛城）。在他童年时当地发生了瘟疫，死了许多工人，他全家也都染病，无钱医治，奄奄待毙。幸有一位好心的老医生给他家送来药品，救了他全家的性命。小乔治念念不忘，立志长大后当医生，救人济世。他16岁入北卡罗来纳州大学医科预科，19岁在贝鲁特美国大学攻读临床诊断，21岁他以优异成绩考入日内瓦医科大学，靠奖学金和半工半读完成学业，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乔治·海德姆听说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被称为“东亚病夫”的中国，贫穷落后，许多穷人缺医少药，他决心到中国为苦难的中国人解除病痛疾苦。1933年末，他远涉重洋来到上海。

乔治·海德姆在上海广慈医院和美国同仁医院工作、讲学，以后又和两位同学开办了一处诊所，挂牌行医。但他发现来看

病的大都是富人，穷人终日为养家糊口奔波，有病也是硬挺着，根本无钱就医。他行医一年多，尽力救治穷人，不收医药费。但力量有限，收效甚微。

这时，乔治结识了美国进步女作家艾格丽丝·史沫特莱。一见面，史沫特莱就直言不讳地说：“你这样做是不够的。我们应该做更多的事情来帮助中国人民改变这个黑暗的社会，使广大劳苦大众都能得到医疗照顾。”

史沫特莱邀请乔治·海德姆参加由新西兰人路易·艾黎等外国进步人士和她组织的每周学习聚会，同他们一起学习探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

在公共租界工部局担任工厂督察的路易·艾黎的帮助下，乔治·海德姆到一些工厂去作社会调查，了解到工人遭受工厂主的残酷剥削、压榨，过着悲惨的生活。使他感到“穷人需要的不仅是药片，更需要的是医治社会的病症。”

乔治·海德姆在上海行医期间，亲眼看到过国民党军警在虹桥机场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青年，他们英勇就义，视死如归的情景，深深地印在乔治的脑海里。

乔治读了史沫特莱送给他的《中国红军在前进》的小册子，开始萌发了要到苏区寻找红军的念头。

1934年11月7日，上海的一些外国进步人士在宋庆龄的寓所里聚会，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史沫特莱邀乔治同去参加，并把他介绍给宋庆龄女士。在宋庆龄女士指引下，乔治一面行医，一面做帮助中国革命的工作。他把自己的诊所当成中共地下组织的一个接头地点，他多次开着自己的私人汽车掩护地下工作者安全转移。他还曾给美国《工人日报》、《中国呼声》等英文报刊，写文章介绍红军的情况。

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和周恩来捎信给宋庆龄女士，请她帮助邀请一位对中国人民友好、公正的西方记者和一位同情中国革命、医术高明的医生到陕北苏区访问，宋庆龄立即推荐了斯诺和乔治。

“红军决不会孤立，他们的事业也是全世界人民的事业，要和他们战斗在一起”

在保安的窑洞里，一连好些个夜晚，毛泽东同乔治和斯诺促膝长谈，坦诚地讲述中国革命道路的曲折和困难，红军长征中惊心动魄的斗争，介绍共产党的内外政策和抗日主张，以及个人的革命经历。这些异常珍贵的谈话是乔治和斯诺闻所未闻的。也促使乔治·海德姆决心舍弃自己的优裕生活条件，参加中国工

农红军，献身中国革命事业。

乔治和斯诺到宁夏、甘肃的前线，访问经过长征的红军战斗部队。他们会见了彭德怀、徐海东等许多红军将领，为他们身经百战的传奇经历所倾倒，看到他们同那些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国民党官僚、军阀有天渊之别。多年后，乔治谈起彭德怀时，无限深情地说：“我很喜欢彭老总，他足智多谋，为人豪爽，精力过人。在他身上充满了革命献身的精神。”

在西部前线，乔治看到经过长征的红军人数不多。他曾对路易·艾黎说，“要是把全部红军集合起来，有足球场那么大一片地方就够了，不过，他们很自信、很乐观，叫我不能不相信他们。”“部队里的男男女女身体瘦弱，吃过不少苦头，他们什么都缺，只有精神和意志是旺盛的。”

乔治看到红军中官兵平等，同甘共苦，与人民群众亲密无间。在甘肃会宁，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向陕北进军，乔治随周恩来前去迎接。在部队行军中，乔治亲眼看到，朱德、贺龙等红军将领，把自己的坐骑让给负伤和生病的红军战士骑坐，而他们自己背着装备步行，这在国民党军阀部队中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事。

乔治和斯诺不论走到哪里，都受到红军官兵的真诚、热烈的欢迎，口口声声称他们：“美国同志。”每当参加集会时。红军官兵总要高呼：“我们不是孤立的！”“我们有国际友人的支援！”等口号。

此前，乔治·海德姆根本没有想到，这些经过千难万险的长征来到偏僻荒凉的西北一隅，正受到国民党军的重重包围，几乎是与世隔绝的红军，竟会把他们两个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看作同志，这般珍视国际友人的支持，根本不是他在上海从国民党和西方报刊上曾读到的，把共产党和红军描述成一伙“仇外排外的暴民”。

乔治从被红军亲切地称呼“同志”，体会到自己在他们心目中的价值，认定自己应该留在他们当中，同他们一起战斗。

按照毛泽东的委托，乔治·海德姆花了一个多月时间，考察了红军中的所有医疗单位，看到经过正规训练的医务人员极其缺乏，医疗设备十分简陋，药品奇缺，为了把红军的医疗卫生工作搞好，他写出了一份考察报告。

1936年10月，当访问结束，斯诺要离开苏区时，乔治向毛泽东提交了他的考察报告，并表示要留下来参加红军，为红军的医疗卫生事业服务的决心。毛泽东看了报告大加赞赏，并对乔治参加红军表示热烈的欢迎，不久，就决定聘请他担任中央军委卫生部顾问。

美国医学博士乔治·海德姆成了红军战士、共产党员马海德

乔治·海德姆如愿以偿。他穿上了红军的灰色粗布军装，头戴八角帽，腰扎皮带，腿扎绑带，脚登布鞋，脖子上挂着听诊器，背着药包，跋涉在陕北黄土高原上，奔波在红军部队中，红军作战时，他不顾危险抢救伤员，用配给他的马驮着伤员向后方转移，一路精心照料。一次，一个战士被毒蛇咬伤，他不避有中毒的危险，用嘴对着伤口，一口一口地把毒液吸出，挽救了战士的生命。

邓颖超同志经过长征患了严重的肺结核病，苏区没有抗结核的药物，营养条件又差。乔治看到陕北雨水少，日照多的特点，想了一个土办法，在户外支一张门板当床，让邓颖超每天上午躺两个小时，作日光浴，坚持了数月，果然体温下降，控制住了病情。

乔治·海德姆祖籍黎巴嫩，属阿拉伯民族。他的姓“海德姆”在阿拉伯语中是骏马的意思。他看到陕北的回族群众大多姓马，为了便于更好地联系人民群众，他为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姓名“马海德”。不论遇到老百姓还是红军官兵，他总是首先自我介绍：“我叫马海德”。红二、四方面军到达陕北时，周恩来向朱德、刘伯承、贺龙、徐向前等人介绍这位刚参加红军的美国医生时，也郑重宣布：“这是马海德同志”。日子一长，“马海德同志”、“老马”、“马大夫”的称呼就在陕北军民中流传开来，而“乔治·海德姆”这个洋名，却被人们遗忘。

马海德感到要和红军同志、陕北群众沟通，直接了解掌握伤病员的情况，做好医疗工作，处处依靠翻译同志不行。他努力向红军官兵、陕北群众学习汉语；从“发烧不发烧”、“肚子疼不疼”开始，一句一句地攻克语言障碍。不到一年时间，就能说一口陕北腔调的中国话，甚至还能在联欢会上唱陕北民歌了。

当了红军后，他生活上毫不特殊，和红军官兵一样吃小米、睡土炕。陕北冬天很冷，供给部门从打土豪没收的财物中找出一床大红线面棉被，发给他御寒。他认为这样太特殊，太奢侈了，拒绝使用。

1937年初，马海德随中共中央机关来到延安，在这里渡过了9年半的战斗生活。他担任中央军委卫生部顾问兼中央领导同志的保健医生。1937年2月，经吴亮平和张浩两位老党员介绍，他站在镰刀斧头红旗下庄严宣誓，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身。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他随朱总司令

率领的八路军总部东渡黄河，挺进华北敌后前线，到山西五台山，组织医疗工作。1937年底又被调回延安筹建八路军医院。

在以后的生活中，马海德兼任过中央外事组的顾问，为援华医疗队当过向导和翻译。1944年，当美军观察组来到延安后，中央又决定马海德和黄华一起担任美军观察组的顾问，争取他们的了解和支持。延安的人们把他称为没有头衔的外交家。

在延安，马海德还曾兼任鲁迅艺术学院的校医。1939年，他认识了漂亮的女学生周苏菲，她来延安参加革命前曾是上海左翼作家联盟的一个剧团的演员。他们两人相恋，于1940年结婚，毛泽东和周恩来等许多中央领导人都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喝他们的喜酒，祝贺他们幸福美满，并肩前进。

毛泽东说：马海德是完全的中国人

1949年的春天来到了，马海德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满怀胜利的喜悦进入了刚解放的北平城。

一天，在北京饭店，一个饭店的老服务员认出了身着人民解放军军装，腰带上挎着手枪的马海德，竟是3年前的军调部工作的那个美国大夫，而大感意外。老服务员迷惑不解地问：

“您是解放军同志？”

“是呀！”马海德回答道。

“您不是中国人吧？”老服务员又问。

“我很快就会成为新中国的公民。”马海德笑着告诉。

1949年10月1日，马海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是在新中国诞生这一天获得批准的。周恩来总理在马海德的国籍证书上，亲笔作了签名。不几天后，毛泽东主席又特地把马海德和夫人苏菲、儿子幼马一家人，请到中南海的家中作客。席间，毛泽东高兴地说：“祝贺你呀！原来你算是我们中国的女婿，现在你入籍了，就是完全的中国人了。”

1950年，马海德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顾问。他仍然坚持每周到协和医院去看门诊参加会诊。当病人问他是哪国人时，他总是自豪地回答：“我是中国人。”卫生部成立专家局后，决定给外国专家增加工资，其中也有马海德一份。他知道后拒绝领取。他向领导上说：“我是中国人，不是外国专家，这钱我不能要。”

（责任编辑 刘家驹）

我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再认识

● 王元化

“五四”运动已经过去将近八十年了。八十年来，无论是东方或西方、中国和全世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我国和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对我国政治、思想、文化生活起过并还在起着重大影响的“五四”运动，应该有一个再认识、再估价的问题。近年来，对这个问题我有过一些研究和思考，现在我想把我的一些观点和看法简述如下，供对此问题有兴趣的学者专家参考，欢迎提出批评指正。

对“五四”运动的评价，我个人认为不应因袭过去的陈说，将“五四”时期的文化简单看作是“文白之争”或“新旧之争”，因为这两个概念不能完整地规范“五四”文化的整体，应该说，它具有更深远更广阔的内容。我认为，近年来受到学术界重视的“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精神”，就是“五四”文化思潮的一个重要特征。如果从这方面去衡量“五四”时代的学人，过去惯用的文白界限就很不适用了。因为倡导白话从事新文化运动的人，并不是个个都能体现上述这一特点，有的甚至很不符合这一要求。而那些用文言写作的，也有不少人吸收了外来的自由思想，坚持学术的独立地位。

长期以来，人们用德赛二先生来概括“五四”文化思潮。我觉得真正可以作为“五四”文化思潮主流的，是不是民主与科学还值得探讨。当时对这两个概念并没有较深入的认识，理解得十分肤浅，仅仅停留在口号上（甚至至今还需补课）。就以民主来说，关于民主学说的源流，它在近代所形成的不同流派，我国从近代开始接受外来民主学说的历程及其存在的问题等等，我们都缺乏切实的研究。一般教科书大抵沿着欧洲大陆理性主义的路子介绍民主观念，偏重法国大革命和巴黎公社的民主革命经验，特别是关于卢梭的公意学说，而对于经验主义的民主学说，如洛克等

人的学说，则茫然无知（我本人长期以来就陷入这种偏向之中）。

我以为“五四”时期的思想成就主要在个性解放方面，这是一个人的觉醒时代。长期以来，我国儒家传统轻视个性，这是一些遵从儒学传统的人（如杜亚泉、梁漱溟等）也承认的。自我意识从长期酣睡中醒来，开始萌发于清朝中叶，当时可以龚自珍的诗文、曹雪芹的小说、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惠栋的《易微言》等为代表。但这些个性解放思潮的萌芽只是五四时期波澜壮阔的个性解放运动的微弱先声。五四时期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是值得我们近代思想史大书特书的。



王元化教授

运动的另一面旗帜 胡适——新文化

● 杨 雯

“尝试”文学革命， 揭起新文化运动的旗帜

1936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在《新青年》出刊20年后，准备重印，作为当年这份刊物的主将的胡适应邀题词。他写道：“《新青年》是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划分一个时代的刊物。最近20年中的文学运动和思想改革，差不多都是从这个刊物出发的。”

胡适一生看事情，以公允为准则。这个评价，当然也不含个人色彩，因为即使今天看来，胡适的这个评价，也会得到知识界的认同的。

《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于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的，第二卷改称《新青年》。创刊号卷首发表了陈氏《敬告青年》一文，向全国青年“谨陈六义”，倡导科学与民主，反对封建旧文化，举起了新文化的旗帜。而此时，正是袁世凯请出孔子的幽灵，准备窃国称帝的时候。

这时，胡适正在美国，虽然他与陈独秀是安徽同乡，但此时两人并不认识。陈、胡两人通信及胡适后

我认为“五四”时期所流行的四种观点是值得注意的：第一，庸俗进化观点（这不是直接来自达尔文的进化论，而是源于严复将赫胥黎与斯宾塞两种学说杂交起来而撰成的《天演论》。这种观点演变为僵硬地断言凡是新的必定胜过旧的）；第二，激进主义（这是指态度偏激、思想狂热、趋于极端、喜爱暴力的倾向，它成了后来极左思潮的根源）；第三，功利主义（即学术失去其自身独立的目的，而将它作为自身以外目的服务的一种手段）；第四，意图伦理（即在认识论上先确立拥护什么和反对什么的立场，这就形成了在学术问题上往往不是实事求是地把考虑真理是非问题放在首位）。五四时期开始流行的这四种观点，在甚至相互对立学派的人物身上，都可以或多或少地发现它们的踪迹，而随着时间的进展，它们对于我国的文化建设越来越带来了不良影响。我们在回顾对二十世纪文化思潮发生巨大作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今天已经到了可以对它们作出清醒的再认识再估价的时候了。

“五四”是反传统的，但不是全盘反传统。“五四”时对庄子、墨子、韩非子以及旧传统中的民间文学是肯定的。不过，第一，庄、墨、韩学说还不是传统中的主流，传统中占重要地位的儒家学说在五四时期是被激烈反对的。第二，“五四”对庄、墨、韩等的肯定，或是用来作为一种反儒的手段（如肯定庄子），或是用来附会西方某种学说（如用韩非附会进化论与功利主义），还不能被视为是吸取传统资源以建设新的文化。第三，“五四”号召提倡平民文学，打倒贵族文学，固然使长期被湮埋的民间小说、山歌、民谣等得到重视，为中国文化建设开拓了新领域，但是同时将封建时期的士绅文化或精英文化一概目为必须打倒的贵族文化，却具有很大的片面性。

五四时期的国学研究方面的两门显学是值得重视的。这就是晋鲁胜为之作注的《墨辩》，在亡佚千余年后，经清代毕沅重拾旧续，将其残编断简重新加以整理，到五四时期则成为当时许多具有代表性人物所关注和研究的学问之一。另一种则是对佛学唯识论和久被遗忘的《因明人正理论疏》，这门由印度输入的有关逻辑的理论也是当时为不少学者所关注的学问之一。可是这种热忱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就无以为继了。倘得以深入下去，将会产生积极影响。当时在融化西学方面做得较有成就的是中国通史、哲学史、小说史等。

（王元化，华东师大教授，博士生导师，原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责任编辑 吴 思）

来为《新青年》撰稿，是他们两人的同乡、上海亚东图书馆主任汪孟邹牵线搭桥的。

这年的10月6日，汪孟邹把《青年杂志》第一号寄给远在美国的胡适，并代陈独秀向他约稿。12月13日，汪又将《青年杂志》2、3号寄给胡适，并再致信说：“陈君（即陈独秀）望吾兄的来文甚于望岁，见面时即问吾兄来文否，故不得不为再三转达。……务求拨冗为之。……否则陈君见面必问，炼（汪原名炼）将穷于应付也。”在朋友的再三催促下，大约在1916年的夏天，胡适把翻译的俄国泰来夏浦小说《决斗》寄给陈独秀，于2卷1号，也即改名《新青年》后的第一号上发表了。这是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字之始。

现今，研究新文化运动的专家们认为，新文化运动真正形成为全国的运动的发端，是文学革命的倡导；而文学革命的倡导，则首先在于提倡白话文。胡适发表的《决斗》，就是用白话文翻译的。这也是《新青年》刊登的第一篇白话文。

当然，以此来说明胡适在那时就意识到这一点，多半是不切实际的。但是，新文化运动中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主张的萌芽，以及后来所倡导的文学革命，确实是在这篇文章中产生了。

从提出用白话文写作，到提倡文学革命的一系列主张，胡适大约用了三年的时间，期间有很多可圈可点的故事。

1915年夏天，美国东部中国学生会成立了一个“文学科学研究部”（胡是文学股的委员）。之前，中国在美的“留学生监督处”里有位钟文鏊先生，他极力主张改革中国文字：“废除汉字，改用字母”，以为教育普及非有字母不可。胡适对此主张，大不以为然，曾作文表示反对。胡适在文章里说，汉字之所以不易普及，原因不在汉文而在于教授方法。他说汉文乃是半死的文字，既然如此，不当以教活文字的方法去教授，而应当跟教外国文一样，需要翻译讲解，不能从背诵中去求其字义的了解。由此可见，胡适虽然不反对废置文言，但是他这时已经指出文言文是一种“半死的语言”，而把语体文（白话）称之为活的语言了。这是一个小小的进步，不料后来竟成为他在文学革命道路上的起点。

这年秋天，就在胡适即将离开康奈尔大学时，他的一位同乡好友梅光迪（字题庄）正在绮色佳度假。梅是安徽宣城人，就读于威斯康辛大学，已取得文学学士学位，正准备入哈佛大学去跟当时有名的文学批评家白璧德继续深造。9月17日胡适为了送梅光迪入哈佛大学，作诗一首相赠。

神州文学久枯竭，百年未有健者起。



一九二一年，在北大任教时的胡适

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

吾辈势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

革命军前杖马鞭，鞭笞驱除一车鬼。

再拜迎入新世纪，以此报国未云菲……

此诗甚长，共60句，420字。其中用了11个外国人的名字，如：“天生几牛顿”、“辅以无数爱迪生”等。这不过是互相勉励为国出力的话，没想到这首打油诗竟引起了另一位好友任鸿隽的诗兴。他把这11个外国名字的译音连缀起来，于9月19日也作了一首打油诗来戏耍“博士”（胡当时的浑名），题名《送胡生往歌伦比亚》。诗云：

牛顿、爱迪生，培根、客尔文。

索虏与霍桑，‘烟士披里纯’。

鞭笞一车鬼，为君生琼英。

文学今革命，作歌送胡生。

胡适20日离开绮色佳，坐在火车上，思来想去，总不是滋味，认为自己是很严肃的作诗，却遭到朋友的奚落，“文学革命”句是在挖苦他，于是气愤不过，又回敬了一首，并请任鸿隽转致诸友人，进一步表明自己的文学态度，诗云：

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

琢镂粉饰丧元气，貌似未必诗之纯。

小人行文颇大胆，诸公一一皆人英。

愿共努力莫相笑，我辈不作腐儒生。

胡适本来对文学革命的方向是很模糊的，但这时他想清楚了，第一次提出作诗需要跟作文一样用白话来写。这个观点提出后，他的朋友任、梅两位及其他

朋友，激烈反对，于是又展开了一场笔战。胡适在争论中，不断思考，到1916年春得出一个观念：死文字不能产生活文学。他说：“一部中国文学史就是一部活文学逐渐代替死文学的历史。”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写了一些文章阐述：在中国文学史里面曾经有过许多次文学革命，自《诗经》以下，中国诗歌流变便是一连串的革命，散文也是如此。他们这群留学生，经过几次辩论后，梅光迪也被胡适说服了，赞成他的主张，说：“文学革命自当从民间文学入手，此无待言，惟非经一场大战争不可。骤言俚俗文学，必为旧派文家所讪笑攻击。但我辈正欢迎其讪笑攻击耳。”

胡适一生注重“尝试”。既有了革文学命的想法，就要身体力行，进行尝试。他用白话文给《新青年》所投的第一篇稿子——翻译文章《决斗》，就是这种尝试的体现。

同年夏天，胡适到克利佛兰城参加“第二次国际关系讨论会”。来回要经过绮色佳，故有机会与在那里渡暑假的一班老同学会面了。以文会友，当然少不得谈的又是文学革命的事情。7月8日那天，胡适与任鸿隽、陈衡哲（她是沃莎女子学院的学生，时为《留美学生季报》编辑）、梅光迪、杨铨、唐钺等人在绮色佳的风景区凯约嘉湖上划船。忽然遇暴雨袭击，他们忙将船靠岸，慌乱中几乎把船划翻，大家都被雨淋湿了。这本是一件寻常小事，不料竟引起一场不寻常的辩论，并由此产生了胡适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集——《尝试集》。

文人墨客作诗为文，讲究的是个“由头”。这次划船遇雨的事，胡适和他的朋友少不了要抒发一番。任鸿隽返回后即写了一首《泛湖即事诗》寄给胡适，请他批评。既然是朋友，胡适也就不客气。在回信中直率地认为，这首诗并不好。理由是写覆舟一节，未免小题大作；诗中用了一些“陈言套语”，因而“文字殊不调和”。

任鸿隽是以善于作诗而自恃，看到胡适这个批评，心里自然不服。既不服，便要据理力争。在给胡适的一封信里，任写道：“白话自有白话用处（如作小说、演说等），然却不能用之于诗。”

两人你来我往的争论，惹起了梅光迪的兴趣。梅虽已被胡适说服，同意胡适白话可以为文的观点，但对白话可否为诗则持怀疑态度。于是，也加入这场争论。他写信给胡适说：“文章体裁不同，小说词曲固可用白话，诗文则不可。”他的理由是：“文学的文字——尤其是诗的文字——一定要由第一流的诗人和艺术家加以美化，才能成为诗之文字。”因此他笑话读胡适写给他的白话诗，好像儿时听“莲花落”一样，

真所谓革尽古今中外诗人之命者！

胡适中国公学时代好友、在美国华盛顿任教育部学生监督处书记的朱经农，对胡适的观点也不以为然。他写信劝胡适：“白话诗无甚可取。”又说“兄之诗谓之复古则可，谓之白话则不可。”

三人成虎，胡适在这场争论中显然处于劣势。白话为诗既无先例可循，争论显然不会有什么结果。他思来想去，决定以身作则，自己来认真尝试用白话作诗，取得成绩，方可说服反对他的朋友们。他于1916年8月4日，写信给任鸿隽说：“我自信颇能用白话作散文，但尚未能用之于韵文。私心颇欲以数年之力，实地练习之。倘数年之后，竟能用文言白话作文作诗，无不随心所欲，岂非一大快事？”又说：“公等假我数年之期。倘此新（诗）国尽是沙碛不毛之地，则我或终归老于‘文言诗国’亦未可知。倘幸而有成，则辟除荆棘之后，当开门户迎公等同来莅止耳。”从此，胡就不再写旧诗词，而专门用白话来作诗了，并作了一首《尝试歌》以表达自己的心愿。诗云：

尝试成功自古无，放翁这话未必是。

我今为下一转语：自古成功在尝试！

请看药圣尝百草，尝了一味又一味。

又如名医试丹药，何嫌六百零六次。

莫想小试便成功，哪有这样容易事！

有时试到千百日，始知前功尽抛弃。

即使如此己无愧，即此失败便足记。

告人此路不通行，可使脚力莫枉费。

我生求师二十年，今得“尝试”两个字。

作诗作事要如此，虽未能到颇有志。

作“尝试歌”颂吾师，愿大家都来尝试！

1917年他任《留美学生季报》主编，于是将所写的白话诗选了数十首发表出来，供世人评论。因该刊在上海中华书局发行，所以国内外都有很大影响。与此同时，他为将来的诗集取名《尝试集》。

经过一段试验后，胡适总结出了以白话文写作的经验。在8月21日在日记里，他归纳出文学革命的八个要点：（一）不用典；（二）不用陈套语；（三）不讲对仗；（四）不避俗；（五）须讲求文法；（六）不作无病之呻吟；（七）不摹仿古人；（八）须言之有物。他说，我主张以白话文体作诗、作文、作戏曲、小说。倘有人愿意从我，无不欢迎。

同一天，他写信给《新青年》主编陈独秀，详细谈了自己的文学革命的主张，并对《青年杂志》第3号上登载谢无量的长律诗，提出批评意见。他说谢君诗，用古典套语不下百余事，而记者（编辑）却附文大为推荐，称它是“希世之言”。胡适认为这与陈主张写实主义，反对古典主义相矛盾。陈接信后很快回

信，向胡解释说：“文学改革，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此非戏言，更非空言，如何如何？《青年》文艺栏意在改革文艺，而实无办法。吾国无写实诗文以为模范，译西文又未能直接唤起国人写实主义之观念，此事务求足下赐以所作写实文字，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寄登《青年》，均所至盼。”

接到陈独秀的来信，胡适立即将自己对文学革命的八点主张，加以解释写成文章，题名为《文学改良刍议》。

这篇文章在1917年1月《新青年》2卷5号上发表后，在文化界引起强烈的反响。北京大学教授钱玄同非常赞赏，写信给陈独秀表示自己意见，并指出：“胡先生‘不用典’之论述最精，实足祛千年腐臭文学之积弊。”陈独秀起初对胡适提出的八条还有点怀疑，但他见了胡的《文学改良刍议》后便完全赞成胡的主张，只是觉得文章写得太平和了，因此他写了一篇《文学革命论》在《新青年》2卷6号上发表，正式打起“文学革命”的大旗。他说：“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一）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二）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三）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最后以坚定的口吻说：“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表示了他坚定不移的信念。

陈的文章发表后，把已经掀起的文学革命运动又推入了一个新的高潮。钱玄同、刘半农、鲁迅、周作人等都表示赞同，并以实际的行动投入到这个反对封建文化的斗争行列，共同奋斗。此后三四年里，白话文成了我国的正式“国语”，因为当时的教育部于1920年1月颁布小学秋季起一律改用语体文。白话文成为正式的国文，这在我国文化史上是一件极其重大的事，对后来的新文化运动有巨大影响。

与陈独秀并肩弄潮

胡适写给陈独秀的一系列文章和通信，使他成了《新青年》有影响的重要撰稿人之一。他与陈独秀虽未谋面，却志同道合，成为神交了。

陈独秀在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同时，致信说：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信中他特写道：

蔡子民先生已接北京总长（按，此系“北大校

长”之误）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之。子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归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均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他处有约者尚无深交，可不必应之。中国社会可与共事之人，实不易得。恃在神交颇契，故敢直率陈之。

蔡元培是在1916年底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先生虽是科举出身，点过翰林，却是革命元勋，且思想上能毅然冲决樊篱，接纳新潮。民国元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便明令停止祭孔尊孔。接长北大以后，更加锐意改革，主张学术思想自由，采取“兼容并包”的方法，并广延“积学而热心的教员”来校任教，掌管校务。这样，当时著名的新人物陈独秀便任了北大文科学长。

1917年1月，陈独秀正式就任北大文科学长后，并将《新青年》从上海迁来北京编辑。他把主编《新青年》与改革北大结合起来。

这年七月，胡适返抵国门，八月即北上，进北大当了教授。

胡适虽然常年在国外，但因为他对文学革命的倡导，曾轰动一时，所以在未回国以前名头就已经很响亮了。到了北大后，由于他的“名头”响亮，加上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吸引了当时一大批“名流”。蔡元培曾说道：自胡适之君到校后，声应气求，又引进了多数的同志，所以兴会较高一点。

与胡适、陈独秀同年进北大的，有周作人、刘半农等人；先后进北大的还有李大钊、钱玄同、高一涵、陈大齐、朱希祖、刘文典、沈尹默、沈兼士、马裕藻等许多人；稍后鲁迅也来北大兼课。真是新人荟萃，北大气象为之大变。他们都为《新青年》撰稿，使《新青年》阵容更加雄厚强大，新文化潮流更加汹涌澎湃，不可遏挡。

胡适的性情比较平和，又善于交际，因此，进北大虽是初来乍到，但人缘还是很好的。林语堂曾把他比做一块肉，而把梁漱溟比做骨头，可以想见胡适为人处事比较柔和有弹性。胡适进北大初期，生活上与高一涵、陶孟和较为接近，有时也常到章士钊家去玩。至于说到文学革命的朋友们，那就要数“卯字号”的人物了。

当年的北大，还在景山东街，即是马神庙的“四公主府”。第一院沙滩的红楼尚在建造中，第三院的译学馆是大学预科。文理本科全在这马神庙的“四公主府”。这里的正门尚未落成，平常总是从西头的便门进出，进门往北一带是讲堂；往东一带平房是教员休息室，每人一间，人们叫它做“卯字号”。卯字号里聚集着陆续进入文科的许多名人。其中有两个“老

兔子”和三个“小兔子”的故事。指的是：陈独秀和朱希祖，他们二人是己卯年（1879年）生的“老兔子”；胡适和刘半农、刘文典三人是辛卯年（1891年）生的“小兔子”。胡适当年还不满二十六岁，真是翩翩年少的教授。

1918年1月，胡适加入《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他与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李大钊、沈尹默等人轮流负责编辑。从此，《新青年》完全改用白话文写作。从第二期开始，每期都登着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的白话诗，风气大开，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1920年，胡适把他回国前后所作的白话诗结集为《尝试集》一书出版。几年的“尝试”，胡适终于开拓了一条新诗的道路，为现代文化新诗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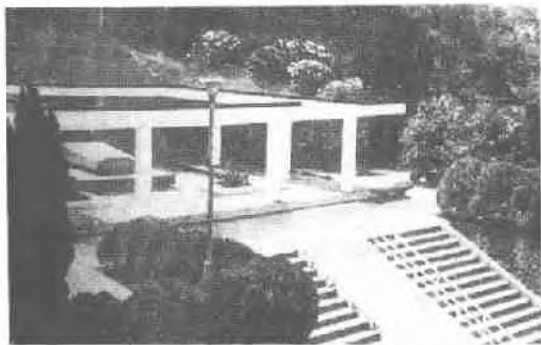
这年年底，陈独秀又邀集李大钊、胡适、周作人等商议，另创《每周评论》，仍由《新青年》同人主持，以便及时发抒议论，抨击黑暗，鼓吹新思潮。从1919年1月起，《新青年》改为同人刊物，由陈独秀、李大钊、胡适、沈尹默、钱玄同、高一涵等六人轮流编辑。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人，也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响应《新青年》，作新文化的有力宣传。

年轻的胡适教授，对青年学生有更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于是1918年12月3日，北大学生成立“新潮社”时，便邀请胡适为顾问。第二年1月，即刊出《新潮》杂志，成为《新青年》的一个得力助手。新潮社的主干，是傅斯年。他原来也是“黄门侍郎”，即是守旧的国故大师黄侃（季刚）先生的得意门生，胡适也承认他学问根底不错。后来傅氏倾向于新思潮，到1919年，便完全转变到新文化阵营一边来了。

《新潮》的组成，形成了一个围绕《新青年》的新文化团体，成为倡导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而这《新青年》团体，事实上又与北京大学密不可分，北大也就成为新思想的大本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了。

不久，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爆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亲日派，震惊全国，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第一页。新文化运动，也因政治的助力，而涛起风从，迅速发展全国各地，汇集了全国规模的伟大文化革命的洪流。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性质，毛泽东曾经有过说明。他指出：

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



台湾南港的胡适墓地

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

这个分析，符合当时运动的实际情形。陈独秀是由激进的革命小资产阶级转变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胡适则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两人齐名，时人称之为“陈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最著名的代表人物。

1919年6月11日晚，陈独秀因在北京新世界散发《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被北洋政府的密探逮捕，住宅亦被查抄。胡适当晚，写了《“威权”》一诗：

“威权”坐在山顶上，
指挥一班铁索锁着的奴隶替他开矿。
他说：“你们谁敢倔强？
我要把你们怎么样就怎么样！”
奴隶们做了一万年的工，
头颈上的铁索渐渐地磨断了，
他们说：“等到铁索断时，
我们要造反了！”
奴隶们同心合力，
一锄一锄地掘到山脚底。
山脚底挖空了，
“威权”倒挂下来，活活地跌死！

这么激烈地抨击专制统治的诗，是《尝试集》里所罕见的。陈独秀留下的《每周评论》，也由胡适接手继续编辑，一直出到这一年的8月20日，印刷第三十七号时，被军阀政府封禁才停刊。

多年后，胡适在回忆他与陈独秀共举文学革命大旗的这段经历时说，自己历史癖太深，故不配作革命的事业，文学革命的进行，最重要的急先锋是他的朋友陈独秀。他们彼此谦虚，说对方是急先锋。其实他俩的文章在当时都成为青年的“圣经”。这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他们联合起来，一致向封建势力宣战。

（责任编辑 木 易）

悼念敢于为民请命的胡开明

编者按：最早上书毛泽东主席，提出在农业生产中推行三包到组生产责任制、后来被错误打成“三反分子”的原中共河北省委常委、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的胡开明同志病逝一周年了。胡开明的老战友于光远、老部下曲维镇最近给本刊投书，对开明同志一身正气，为了农民的切身利益，甘冒极大政治风险，坚持真理的铮铮铁骨表示他们崇敬的心情和衷心的悼念。现将他们的来稿摘要发表，以飨读者。

“为了真理，不得不发表这样的意见。”

● 于光远

胡开明一生中最突出的一件事情是1962年8月上书毛泽东，提出在农业生产中推行三包到组的生产责任制。毛泽东同志当时在这封信上批了“印发给同志讨论”几个字，这个批示看不出毛泽东对胡开明的批评。但是在“文革”中，造反派抬出一段最高指示：“河北胡开明，有这么一个人，‘开明’，但就是‘胡’开明，是个副省长。听了批评‘一片黑暗’的论调的传达，感到压力，你压了我那么久，从1960年以来，讲了一年多了，我也可以压你一下么。”这几句话是毛泽东1962年8月9日，也就是胡开明写信的第二天讲

的。那个“印发给同志讨论”几个字是一周后的8月16日写的。对于那段“最高指示”，当时在北戴河没有人向胡开明传达，后来回到河北省委后也没有听到传达。胡开明第一次听到这段话是“文革”中他的家属从大字报上看到后写信告诉他的。“文革”后胡开明到中央档案馆查1962年8月9日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核心小组会议讲话记录，没有查到毛泽东的这段话。但是从胡开明在文革中受到的劫难，可以判断这段话是有的，而且最后那一句毛说“你压了我那么久，从1960年以来，讲了一年多了，我也可以压你一下么”，

这样的话明显不是针对胡开明说的。熟悉历史的可以猜出所指大概是谁。这更可以说明毛泽东的那一段话不会是编出来的。

为了这封信，从1962年9月胡开明就开始遭受批判，1963年以后的几年中，河北省委、张家口地委连开几次会议，从批判他立场问题，发展到1964年把张家口地委打成“以胡开明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集团”，并在1964年年底升级为“以胡开明和葛启（原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为首的阴谋反党集团”。1965年胡开明以及他领导下的一批优秀干部又都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复辟资本主义的爪牙”。到“文革”开始后更是狠批狠斗，要把胡开明“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造反派去青海监狱，采取引供诱供的手段，想通过国民党特务的嘴把胡开明说成是特务。1967年在斗争他的时候给他戴上手拷，睡在冰凉、坚硬的水泥地上。还对胡开明搞过假枪毙。“文革”中受迫害，许多老干部都是过来人，但是胡开明受批判的时间比别人早，一般老干部被打成“走资派”是1966年后的事，而胡开明比别人要早三年。他获得解放的时间则比别人迟。在粉碎“四人帮”后，不少干部得到了解放，胡开明因为是在“最高指示”中点了名的人物，不敢痛痛快快地给他解



一九六〇年，胡开明在张家口

决问题。直到1977年“十一大”后，才对他有所解放，但头上的帽子还没有完全摘掉，他就发表言论，对党的“十一大”政治路线提出意见，说“十一大”完全肯定“十大”以来的政治路线是不对的，并对“两个凡是”提出异议。在他发言后，河北省委很快找他谈话，批评他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开明同志严正地表示：“为了真理，不得不发表这样的意见。”

1978年，胡开明同志到安徽工作。王郁昭说，胡开明同志到安徽后，支持农村改革，出了个“借地种粮”的好办法，为以后大包干开路。

胡开明这样的思想觉悟，当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胡开明传略》中，写了他的童年、少年、青年，特别写了他在北平“一二·九”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写了他在东

北大学时的两次被捕。特别是第二次被捕，有一个生动的故事，这个故事后来被作家杨沫写进了她创作的《青春之歌》中。

胡开明同志有许多名字，胡是真姓，1913年1月31日出生，按排行起名字是胡志彪。考中学用了他堂兄的假文凭，名字就改成胡焜。1937年到延安进抗大，改名胡开明。这次改名，引来了后来毛泽东的“河北有个胡开明，开明，但就是‘胡’开明”这段话。如果不是这个名字，也许就不会有这个“最高指示”。另外，在他第二次被捕中，审判官不认识这个“焜”字，把它看成“混”，在审判时说：“你是个南方人，跑到东北人的学校‘胡混’什么？你一定是个共产党。”在胡开明受尽迫害的历史中竟有这样一些“幽默”的故事。

（责任编辑 吴 思）

“老百姓苦成这个样子， 顾不得那么多了！”

● 曲维镇

60年代初，为纠正农村工作中“左”的错误，中央先后颁发了“十二条”和“六十条”，旨在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文件中规定实行“三级（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所有，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这一决定对公社体制做了一些调整，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原因何在？胡开明同志早在整风反右时即开始探索这个问题的根源和治本之策。他先后多次下乡调查研究，向基层干部和群众求教，全面系统地研究了张家口农村的各种数据资料，并以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为标准衡量政策上的得失。在同我议论农业合作化问题时他就说过：“张家口地区在互助组和初级社时期农业是上升趋势，高级社后农业生产开始下降，其中有因灾减产的因素，但没有天灾时也减产，说明高级社不一定比初级社更合适。”他又说：“张家口出现的问题，全省也有，全国也大同小异，说明不单是执行上的问题，而是政策本身有毛病。”后来他与原河北省委组织部长张何明同志到蔚县调查农村生产破坏和群众生活困难问题。在回来的路上俩人又议论说：“现在农村的问题带有普遍性，实质上是生产关系超越了生产力的水平。”“我们的主观愿望超越了客观实际，错误地认识国情，想跑步进入社会主义，过早过急地实行公社化，搞穷过渡，搞一大二公，而且越大越公越纯越好。”“所有制和分配办法与群众的利益距离越来越远，不少做法实际上侵害了农民的利益，哪里还有积极性？”为了吃透下情，他又跟原河北省省长解峰同志等走访了怀安、万全、张北、张家口市郊区等县区的

十多个不同类型的村队。针对干部群众中“恐右病”，他带头揭矛盾、摆问题、谈认识，给大家壮了胆子，群众打消了顾虑，才吐出真情。据我回忆，当时农民讲得比较多的是：“现在摊子大人多，跟咱的关系连的不紧”；“强弱不分、好差不分，一拉平，有分没蜜，干着没劲”；“光给别人拉套，没意思”等等……。胡开明和河北省的其他几个领导同志亲眼看着农民吃不饱穿不暖的情景，听着这些颇带刺激味的大实话，思想受到很大震动。他们议论说：“看来现在的所有制和分配办法不行，要退，要退够，至少在张家口应当这样。”

为了解决问题，开始时胡开明同志主张缩小核算单位，即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这个想法得到张何明、解峰同志的支持和省委多数常委的赞同。从一些试点单位的情况看，这样做解决了生产责任与分配权相脱离的矛盾，生产队和社员有了积极性，生产也有了起色。但是这个意见在1961年“三北”会议上被认为是“化大公为小公”，“集体化的倒退”而未被通过。后来毛泽东主席在视察工作途经河北时听了胡开明的汇报，审阅了有关典型材料，亲自批示认可，这个建议才免遭夭折。

下放基本核算单位是对公社体制的调整，在生产关系上退了一步。它的推行是顶着“左”的风浪艰难地进行的。按照有些人的思维方式，开明同志应该“见好就收”了。可是他既不会看风使舵，也不懂得搞政治投机。他所关注的是事情的结果。当他察觉到下放核算单位仍难解决根本问题时，便又全身心地投入新一轮

的探索中去。为时不久,下边反映张家口市郊区孤石大队搞了包产到组,生产队把土地、产量和工分包到作业组。他听说后立即前去考察,同干部社员在田间边看边问边议,发现它的优点是:由于小组户数少,与社员利益的联系更为直接;自愿结合,便于互相监督、互相帮助,劳动自觉性提高了;便于大家出主意,农活好安排,劳力好分配;干部不好偷懒了,参加劳动的多了。正因为如此,这个队的蔬菜长势之好是条件相同但未搞包产的队无法相比的。此时,他如同找到新的宝藏一样高兴,给予了初步肯定。为把问题搞准,他又与地、市、县一些领导同志反复商讨。大家认为这种形式既坚持了集体化,又充分调动了群众积极性,比较稳妥。就在研究这个问题过程中,农工部负责同志又提供了苏联在30年代有的集体农庄自发搞起包产到组、责任到人而且发放了生产的资料。这个情况更加坚定了开明同志推行包产到组的决心。这里顺便说一下,开明同志起初是赞成实行包产到户生产责任制的,由于一些好心同志极力劝阻而作罢。但他仍认为,在那些特贫社队还应实行包产到户,在面上搞包产到组。

包产到组是公社体制上的大突破,在生产关系方面又退了一步。这个做法甚为农民群众所赞同,却不合乎当时的政治气候,被认为是“搞单干”,有人说“胡开明比葛启还‘鲁’”(鲁莽之意)”,他知道后一笑置之。他把包产到组的做法向省里主要领导同志汇报,受到严厉批

评。这时也有人个别找他谈话,表示替他担心,他均不为所动。1962年8月,中央召开北戴河会议期间,他奉命参加华北局同时举行的座谈会。为此他不辞劳苦,日以继夜地征集各方面的情况和意见。出发之前我凭个人的直觉感到此次赴会未必顺利,劝他谨慎从事,他则回答说:“国家这么困难,老百姓苦成这个样子,顾不得那么多了!”会议期间他提出了包产到组的建议并上书毛主席,结果“捅了大漏子”,受到批评。从此便悲剧屡演,半生坎坷。

1962年10月以后,他先在河北省常委会上被批,后来组织省直机关批,派人到张家口组织地、市2000人大会议批,断断续续,一次比一次调子高。这时,他既要接受批判,又要坚持刚就任的城市工作部的工作,还要违心地写检查,稿纸垒起来足有七、八寸厚。检查中扣的帽子由右倾错误到严重右倾,又到右倾机会主义,但还是交不了稿。后来硬是扣上修正主义路线帽子才得通过。这期间他沉默少语,但坚毅如故。始终没有吐出一个字的后悔话。只是几次问我“究竟错在哪里?”此时此刻我没有办法安慰他,也只好沉默以对。

粉碎“四人帮”后,胡开明仍然受着不公正的待遇,他是河北省省级干部中平反最晚、工作职务安排最差的一个。先到沧州市担任排位第8的革委会副主任,后到一个学院当领导,而他却忠贞不渝,竭尽全力地做好工作。1978年7月,在党中央的关怀和万里同志(当时主持安徽省的全面工作)的支持下,被调到安徽工作,任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兼省农委第二书记。这时,他如鱼得水,全力协助万里同志搞农村调查,旗帜鲜明地肯定了包产到户生产责任制,在全省推广后收到很好效果,对后来全国农村经济改革和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真理终于得到社会实践的验证,开明同志多年的壮志得酬了!事实证明,他不愧是一块经得起火炼的真金,不愧是一位求真务实的好楷模,铮铮铁骨的大丈夫。

(作者系原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部长)

(责任编辑 林 耀)



1990年胡开明与夫人李克林金婚合影

项英像前

说项英

● 欧远方

1993年5月,我们几个同志参加了对青阳县的发展战略咨询以后,前往泾县瞻仰新四军烈士陵园和云岭新四军军部,在叶挺军长铜像前致敬,我当时即有感觉,为什么这里没有新四军副军长(实为政委,一把手)项英的铜像。不久,又听说项英的故乡武昌竖有他的铜像,并有杨尚昆的题字。

1996年10月16日,我和左其煌、刘星同志在武汉市参加一个会议,会后我们一同到武汉市江夏区(原属武昌县)瞻仰项英铜像。

铜像竖立在一个山坡上,从山下蹬了一百多个石阶,穿过林荫,便是一个大平台,项英铜像矗立在中央。他身穿新四军军服,面部微仰,庄严地凝视着远方。在铜像的基座上,是当时国家主席杨尚昆题字:“项英同志浩气长存”。铜像背后,在白色大理石上,镌刻着《项英同志生平》。此地三面环山,山上树木葱茏,时值初秋,间有红色枫树点缀其间,以铜像为中心的陵园,氛围是肃穆的,环境是优美的。

打从参加革命起,就知道项英的名气。但皖南事变后,除听传达说他犯了错误外,就没见



到介绍他的文字。从许多回忆录、电影、诗词中,光知道陈毅在三年游击战争中的贡献,他的著名的“梅岭三章”,尤其是“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的名句,脍炙人口,催人奋进。但我不知道,作为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主要领导人、陈毅战友的项英做了些什么贡献呢?

文革前,一个偶然的的机会,看到一本陈丕显同志写的回忆录,书名大约是《坚持红色赣粤边》(原书丢失),细读之下,才知道项英在领导三年游击战争中是起了重大作用的。他和陈毅、杨尚奎(解放后任江西省委书记)、陈丕显等人始终坚持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艰苦卓绝,生死与共,这使我对项英在坚持三年游击战争中的作用有了初步了解。

十几年来,我曾分管淮北、四师党史资料征集和研究,知道在长期艰苦复杂的政治、军事、文化斗争中,党内对许多事件、人物的评价是有分歧的。根据历史档案和各种资料,有的已经澄清,有的基本澄清,有的尚待澄清。完全澄清了的,如红军西路军的失败,彭雪枫1941年春三个月反顽斗争以及撤向津浦路东的分歧,都已恢复了历史本来面貌。正在深入研究尚待彻底澄清的如对陈独秀功过的评价;基本澄清尚有若干分歧的,则有对项英的功过评价等等。

对于项英在皖南事变中的责任问题,看法

不一,甚至分歧甚大。本来在历史研究中,以“百家争鸣”为指导方针,各种意见都应允许发表,绝不能带有主观臆断或感情用事,也不应唯书、唯上,而应求实。这次我们在瞻仰项墓铜像时,江夏区委赠送我们每人一本王辅一著的《项英传》(在此之前安徽新四军研究会也曾发过一本,粗粗看过)。从武汉回来又仔细阅读,参照其它意见不同的文章,相比之下,《项英传》写得比较全面、公正。王辅一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部原副部长,《军事大辞典》副主编。他为了写《项英传》,查阅了大量档案、史料,访问了李一氓、陈丕显及历史学家黎澍和熟悉情况的老同志,历时十年,数易其稿。全书详细介绍项英一生的光辉业绩,也不回避他所犯过的错误。他所引用的档案、资料,都注明出处。全书42万字,持之有据,言之成理。

这个铜像的竖立,是1990年在项英家乡湖北省武昌县人民要求下,经县委和县人民政府上报,武汉市、湖北省党政机关转报,很快得到中共中央领导同志批准建立的,杨尚昆同志题了字。《项英同志生平》是项英同志亲密战友陈丕显、李一氓(时任中顾委常委)亲自组织修改,经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审定的。《项英同志生平》除介绍项英主要职务和功绩外,第一句就是:“项英同志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末句则是:“项英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诚地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通观项英一生,这个评价是当之无愧的。

像一切大人物一生都不可能不发生错误(有的是大错误)一样,项英有过许多错误。突出的如在皖南事变中,尽管上面有责任,项英作为一把手也是责无旁贷。所谓上边的责任,一是斯大林,相信国民党不会大反共;二是毛泽东,他受了斯大林多大的影响不知道,他对形势估计也是麻痹的,皖南事变后,他起草的《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很不实事求是,全盘否定项英在创建新四军和皖南三年游击战争的成绩,把皖南事变受损失的责任全部推到项英头上,这不公平,实际上中央和毛泽东也有责任。1941年3月26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说过:“项英、袁国平的错误,中央也要负责。

因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是有些错误的。当时对形势估计不足,没有迅速地布置工作;其次对国共关系忽视了斗争性;……对全国的影响也很大。”

按照党的组织原则,上级决定(或指示)错了,产生后果,上级应负主要责任,甚至全部责任,下级各有责任,还有个接受经验教训的问题。毛泽东发动那样多的政治运动,哪个不执行?当然执行中又有差别。在我接触过的几个大的事件中,受了挫折的,常把责任推到下边。如《毛泽东选集》的注解把西路军的失败说成是执行了张国焘路线,使徐向前、李先念背了几十年黑锅;我在青海访问,专门看了西路军纪念馆,心情沉重,斗争是惨烈而悲壮的。这里出版的一本书,第一篇就是徐向前文章,详细叙述西路军从决策到失败的经过。原来,西路军的行动全部是中央直接指挥的,与张国焘毫不相干,“文革”后“毛选”再版,把这个注解也取消了。再如,1941年春彭雪枫奉命坚守“豫皖苏”,时则东进,时则西进,在强大国民党军进攻下艰苦坚持三个月后,奉命东撤到洪泽湖边,部队受了部分损失。而此时的华中局却作出决议把责任全部加在彭雪枫身上,四师上上下下不服。80年代初通过查阅当时电报档案,证明彭雪枫并非如华中局决定所说彭雪枫长期不执行中央指示(这顶帽子很大),而是每一步都是按中央指示行动,不能说彭在指挥上没有失误之处,但主要责任不在彭。这件事后来也澄清了。现在研究项英的功过,根据大量档案写出的《项英传》,正如中央党史出版社在本书“内容提要”所说:“本书以大量的第一手材料详细介绍了项英的战斗经历,功过所在,叙述详略得当,评价客观公允,文字流畅,可读性强。书中告诉你:项英是中国革命史、党史、军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一位人物,是具有许多优良品质、在革命斗争中功大于过的人物。”

从上述两个例子说明,对任何人物的评价,(特别是近现代)有大量档案资料在,假如不带偏见和情绪,都是可以弄个水落石出的,历史是无情的,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对每个人物,都要还他历史的本来面貌。

项英一生业绩中,有几件大事因过去不宣传而鲜为人知。

项英,是工人出身的中国最早的工人运动领袖。他是1923年“二·七”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此事震撼世界,他在领导工人游行和与北洋军阀谈判中,勇敢机智,被誉为工人阶级的英雄。

项英,在大革命中,发动和组织工人配合北伐军,在克复武昌城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他还领导工人收复汉口英租界,这在中国近代史上是反帝斗争一个胜利。

项英,在大革命失败后,在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时,针对一些“左”的情绪和主张,在他领头的29人提案中,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变立即暴动的口号为宣传口号,切实制止盲动倾向”,“目前工作重心是挽救党与群众脱离的现状,在反帝运动,城市与乡村的日常斗争中,艰苦地动员群众和组织群众”。实践证明,项英等人的主张是正确的。

项英,是受王明、博古排挤的。红军长征,博未与他商量,即命他留下坚持,但他临危受命,在红军长征开始后,说服部队主动率部出击敌人,以掩护红军,表现了难得的顾全大局的精神。

项英,到苏区担任军委代主席(主席周恩来尚在上海)和副主席期间,对红军的建设尤其政治工作多有建树,他发布命令确定“八·一”做为红军建军节。

项英,在处理苏区“富田事件”中,头脑清醒,力主以内部问题、思想问题加以妥善解决,而前委书记毛泽东却力主这是敌我矛盾,是国民党AB团大批钻入内部,要加以镇压。项英正确意见未被王明为首的中央所采纳,项英要保护的红二十军高级干部未保护下来。这个军排长以上军官几乎全给杀了。这个反AB团肃反运动推广到鄂豫皖等苏区,杀害了大批红军将领和地方干部。张国焘掀起三次肃反高潮,把有的县委除炊事员外全部杀光。不久前我到霍山,我问该县领导人,霍山地处大别山腹部,与金寨毗邻,金寨成了将军县,你们这里出了几个将军?他说一个也没出,当时县委领导班子

被杀光了。最近读了几篇关于富田事件的文章,特别是江西党校经十几年调查写出的《AB团始末》,证明所谓“AB团”乃子虚乌有。从一件小案逼供信中制造出来的。

一个“AB团”的彻底否定,一个“托派”的全盘否定,将改变一大批人物的历史评价。仅大别山各县冤案即达万人以上,现在都平反了。

项英,在皖南任东南分局(后为东南局)的书记时,曾把江青的历史问题报告中央,反对江青和毛泽东结婚。

所有这些,几十年来不宣传、不介绍,公道吗?

对于项英,由于长期不能对他的功过给予公平评价,党内军内许多老同志是有意见的,尤其对项英知之甚深、共过患难的陈丕显和原新四军军部秘书长、曾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的李一氓为之不平。李一氓曾于1982年清明到南京凭吊项英墓,写了一首七律,中有“麦饭篮空惭展羹,桐弦调走信雌黄。临危受命原无奈,到死方休亦可伤”的诗句,表达了所有正直的新四军老战士的心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对历史上的许多悬案能够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胡绳同志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对项英功过作了较为公正的评价,现在中央又决定于1998年项英同志诞辰100周年为项英铜像补办揭幕仪式,项英同志在九泉之下可以安息了。

还有一点感想,在评价一个人物时,不能唯书、唯上、唯决议。对项英、彭雪枫二人的功过评价,长期不能一致,就是因为中央和华中局为他们做出了决定,尽管这两个决定并不实事求是,历史事实已经否定了这些决定的主要部分。但有些同志总是抓住那些决定不放,争得不可开交,这其实也是两个“凡是”在作怪。推翻两个“凡是”,还历史本来面貌,用唯物主义态度(即唯实)来重新评价历史人物,才能站得住脚。假如违背这个原则,对历史人物做不公平的评价,早晚要翻案。今年不翻明年翻,五年不翻十年翻,一千年一万年也要翻。

历史无情。

(责任编辑 吴 思)

我的公公—— 南开创始人张伯苓

● 瞿安贵（口述） 唐婧（整理）

一、创办南开

张伯苓先生共创办了四所学校：南开大学、天津南开中学、第二南开中学、重庆南开中学。他一生从事教育事业，倾注了全部的心血，换来的是桃李满天下。南开毕业的学生，大多成为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有不少学生，像曹禺、金焰等人，成为了文艺界的名人，还有像周恩来这样的极其优秀的毕业学生，成为了国家的栋梁之才。

我的公公张伯苓生于1876年，卒于1951年。年青时，曾服役于北洋水师，所在的战舰是“通济”舰。1895年，他随“通济”舰一起参加了威海卫的接收和转租手续。正是这件事，使伯苓公产生了人生一大转折，终生从事教育事业。

那天，“通济”舰载着满船的清朝官员来到威海卫，港口上空悬挂着的日本膏药旗降了下来，升上了清政府的黄龙旗。但因威海卫又转租给了英国，所以刚升起的黄龙旗第二天即被降下，代之而起的是大不列颠帝国的米字旗。

这件事情对伯苓公影响很深，中国是个弱国，祖国河山被人宰割，两天之内竟然换了三个不同国家的国旗，这真是奇耻大辱！而面对这一切，舰上的官兵和当地的老百姓竟然无动于衷，熟视无睹。伯苓公内心很受震动：中国的老百姓已经愚昧落后到一定程度了，要从教育入手，启发民智，提高素质，要使人们的精神振奋起来，懂得复兴中华这个大道理。从这时起，伯苓公心中树立了教育救国这个大目标。

从威海卫回来后，伯苓公就从海军退役了。之后，他来到严范孙的教馆任

教。

严范孙很喜欢这个有抱负的年轻人，两人志向一致。在教育救国这个共同的目标指导下，他们分头行动，开始了创办学校的先期工作。

为办学校，伯苓公和严范孙两人都吃了不少苦，跑校址，找经费，但他们矢志不渝。这种精神感动了周围的人，特别是当地的名人和开明士绅，有人出钱，有人献地，终于在1907年，伯苓公和严范孙两个合力办起了“南开中学堂”。

学校位于天津旧城西南的一块10多亩的荒地上，是邑绅郑菊如捐献的一块土地。

在天津方言中，洼地被叫做“开洼”，在城西叫“西开洼”，在城南叫“南开洼”，简称“南开”。因学校址建在城南的荒地中，所以校名就定为“南开中学学堂”。从这时候起，南开的名字就出现了，并且名声越来越大（南开大学于1919年成立）。

伯苓公自学校创办之日起，就开始有了他独特的



青年时期的张伯苓

一套办学思路，像学校的管理，课程的设置、教师队伍的管理这些方面都是只领先于其他学校，而不会落后于人。校风、校纪的管理、体育课的出现和南开新剧团，都是很值得一提的。

在南开中学堂里，教学楼进口处设有穿衣镜，镜子上端的横匾上刻有严范孙亲笔题的四十字箴言：

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钮必结。

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

气象：勿傲，勿暴，勿怠。

颜色：宜和，宜静，宜庄。

这四十字箴言，实际上要求学生要有一副整洁的仪容和一种朝气蓬勃的精神状态。

当时的天津有多所学校，但南开的校风、校纪使之独具特色，引人注目。同时，南开的学生还牢记着张校长这样的一句话：“人可以有霉运，不可以有霉相！越是倒霉，越要面净发理，衣整鞋洁，让人一看就有清新、明爽、舒服的感觉，霉运很快可以好转。”为了朗朗上口，伯苓公还编了一个顺口溜：“勤梳头勤洗脸，就是倒霉也不显！”南开的许多学生一直按照穿衣镜上的箴言和伯苓公的教导去做，一生都很受益。

南开学校独特的管理方式和管理思想引起了美国教育界同行的注意，哈佛大学校长伊里奥博士曾来校参观，并把它讲给美国的同行们听。并且，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还派人到南开，把镜子上方的箴言拍下来，回国后，刊登在报纸上。

为洗刷中国人身上的“东亚病夫”的形象，伯苓公提出“强我种族，体育为先”的口号。他重视体育锻炼，提出大学里应开设体育课。但那时的学校里都没有体育课，这就使南开又领先一步。后校方规定体育课为必修课，凡不合格者不给毕业证书。

伯苓公主张教师、学生人人都要上操场。他常亲自参加运动会，既当主会者，又当竞赛者，在教职工运动会上荣获百米赛跑第一名。

在南开，无论是田径赛还是各种球类，如篮球、足球、排球、棒球、网球，以及武术等，都是很发达的。有了这个基础，在每届的华北运动会或全国运动会，南开的学生们都有很出色的成绩。

体育是南开的特色，伯苓公因此享有声誉，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对此十分赞同，称之为“已臻佳境”。伯苓公可以称得上近代体育教育之父。

南开的另一特色，就是南开新剧团及其所演的剧目。学校自创办以来，一直坚持在学业之余，演普通话的戏，一方面为改进社会风气，针砭时弊，一方面也为教育自己，提高自己。老师和学生们一起编话剧，导话剧，演话剧，并且公开举行演出，受到社会上各界人士的欢迎。大家称之为“新剧”，称这个组织为

“南开新剧团”。

他们的演出不但紧贴社会，而且节目内容清新、健康，于是大家都来看，家长放心让孩子来看，学生又带朋友来看，朋友又带朋友来看，在社会上名气很大。这引起文化界名流的关注，如陈独秀、胡适、鲁迅、梅兰芳等，而且天津的报刊也时常刊登此类文章加以宣传。

南开新剧团培养了一批演艺和戏剧创作的优秀人才，著名剧作家曹禺就是从南开毕业的，名噪一时的“电影皇帝”金焰，也是南开毕业的。

南开新剧团演了许多剧目，如《一元钱》、《娜拉》、《求婚》、《国民公敌》、《刚愎的医生》、《财狂》等。演出的时候，伯苓公常去看，还提出一些建议和意见。

二、“化缘和尚”

伯苓公办学从白手起家，所有经费都是从社会募捐而来，他得了个绰号：“化缘和尚”。他周旋于军、政、官、商之间，摸准了对方有钱，就去周旋，常有收获。有一次去南京的火车上遇到济南电灯公司的经理，对方在敬佩之余，当场捐上 1000 元；伯苓公听说直隶第一提督卢木斋十分酷爱书籍，曾自办过图书馆，于是通过朋友去暗示他，卢木斋很高兴地拿出 10 万元来捐助南开修建图书馆，另外又捐图书 2 万册。伯苓公去美国时，他常带上几条亲手喂养的金鱼，每捐款 1 万元者，赠 1 条小金鱼留作纪念。所以学校每年支出 10 条金鱼，就会得到 10 万美元的赞助。

凡是捐款全都建帐登记，帐目放在图书馆供人查看，做到帐目完全公开。

伯苓公募来的钱成千上万，但他却分毫不沾，把所有的钱都投入学校，自己过着清贫如水的生活。据说一次张学良乘汽车去拜访伯苓公，汽车在一条土路上转来转去，怎么也找不到“张公馆”。张学良万万没有想到，堂堂大校长竟住在贫苦市民当中。

伯苓公外出办事，一向坐三等车厢，住最便宜的旅店。每次出门，他必带两件东西：一盒臭虫药和一包茶叶。因他下榻的旅店臭虫太多，茶叶又实在低劣，这包茶叶就是他唯一的奢侈品了。在市内开会，伯苓公常步行或乘公共汽车代替小车，会场外的服务员问他车号，伯苓公讲：“11 号。”弄得对方看着他走远了，才明白过来“11 号”指的就是双腿步行啊！

伯苓公的唯一经济来源就是工资。抗战前，只拿南开中学工资，不拿南大工资；抗战时只拿西南联大工资，不拿重庆南开中学工资；抗战胜利后只拿南开大学工资，不拿别处工资。他退休后，没有了工资收

人，全靠3个儿子赡养。不幸去世后，房无一间，地无一亩，也没有一分钱存款。

他两袖清风而去，只留下口袋中的7.60元零花钱和两张戏院的戏票。

三、与周恩来的师生情谊

周恩来于1913年考入南开中学。从他入学的那一天起，就显示出了他出众的才华。在大家的印象中，周恩来不仅品学兼优，而且是个很活跃的社会活动家。

刚入学时，周恩来生活上有些困难。伯苓公听说后，就免去了他的各项费用，还给他一些能在业余时间做的抄抄写写的工作。每周末，伯苓公都请周恩来到家中吃饭，畅谈国家大事与社会问题。而王夫人每次不是熬小鱼就是炖牛肉，用好一点的伙食招待他。40年后，周恩来还对傅作义先生谈起过这件事：“当年我在南开中学读书时，经常吃师母做的贴饽饽、熬小鱼、炖牛肉。”伯苓公与周恩来的师生关系从那时起就非常密切。

1938年抗战期间，伯苓公曾担任第一届国民参议会副议长。一时间，重庆南开中学津南村3号就成了当时的一个社会活动中心。

那时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代表长驻重庆。他常来我家作客。津南村3号门外，有一片空地，桃树、柳树环抱成半圆形，犹如天然屏风。夏季，伯苓公常在这块空地上，摆一个小茶桌，沏上一壶茶，放几把椅子，专门接待来往的各方人士。周恩来是来得最勤快的一个，他利用一切机会进行统战工作，伯苓公是他争取的第一个对象。师生二人常常争得面红耳赤，我想下周末周恩来一定不会再来了，没想到到了周末，周恩来依然照来不误。师生二人又谈笑风生，好像从来没有争吵过一样。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与伯苓公有多年交情的傅作义先生担心伯苓公在南方的安全，就去找周恩来商量，能否给伯苓公一个妥善的安置，并把伯苓公坚决不同意随蒋介石去台湾的事情前后讲述了一遍。周恩来很高兴，托四川用军用飞机将伯苓公夫妇接到北京。

1951年2月伯苓公病重，大哥希陆曾给周恩来打电话，告诉他伯苓公病危一事。没想到2月23日夜2—3点钟时，周恩来乘火车专车抵津，立即就给家中挂电话，问伯苓公病情，大哥回电话说：“伯苓公下午已经去世了”。周恩来马上说：“明早9点，我亲自去吊唁。”

24日上午9点，大理道胡同及大街口人山人海，都是为吊唁而来。人们闻知周恩来将亲来吊唁，全在注目等候。



晚年的张伯苓与夫人

9点多钟，黄敬市长陪同周恩来一起来了。一到家就直接上了二楼伯苓公卧室，向伯苓公遗体告别，周恩来深深行了三鞠躬礼。此时，我们家属一直陪在旁边谢礼。周恩来用惋惜的口吻说：“我没有想到校长这么快就去世了，我的意思是先让校长看看我们新中国、新社会的制度，再请老校长出来工作。”

伯苓公去世后没有几年，新中国就出现了建国初的荒年，市场上供应奇缺。当时王夫人患半身不遂病卧在床，急需补充营养。周恩来闻讯后，从他们私人存款中取出500元，派邓大姐来天津，亲自交给统战部，让统战部派专人到天津大沽路菜市场，为我婆婆王夫人开了一个户头，每月供应油、肉、蛋、鱼等营养品。统战部派人将红卡本送到我家中，说：“这是周总理和邓大姐为了照顾师母，特别供应的。你们只管去取食物，每月由我们（统战部）去结帐。”

当时供应紧张，这些食品犹如雪中送炭。我们一家人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我们过去只知道他们师生情谊深厚，没想到老校长已经去世八、九年了，周恩来心中还惦记着他的师母及其家人。

可惜王夫人只吃了3个月便去世了。随后统战部去菜市场结帐，余下的钱又派人送到家中，说是总理吩咐过的，余下的钱要给王夫人做丧葬费用。

四、拒绝随蒋介石去台湾

1948年春，我们夫妇带着元良随公婆从南海路5

号搬到南门外大街居住（这所房子是一位宁先生捐给南开大学的，伯苓公自己没有房产）。

伯苓公住的是向阳的房间，外面有一个宽大的长廊，我们一家人常在阳台上乘凉或晒太阳。记得当时是在6月底，我正在走廊上看晚报，见到晚报上登着“张伯苓将入主考试院院长”。我马上将报纸送到伯苓公手中，他看后哈哈大笑说：“这真是无稽之谈。”我们也一笑置之，总以为是小报记者无中生有，不足为奇。

次日，我们一家人正在吃午饭，忽然听到院内有汽车声，只见原国民党市长杜建时匆匆来到，说：“你们吃饭，我有急事找校长，马上就走。”他坐下后就开门见山地说：“今天接到委座急电，请校长出山任考试院院长，请校长表态。”伯苓公爽朗地大笑说：“你是我的学生，深知我的为人，我一生志愿办教育，我不能答应，请婉言谢绝。”杜建时见校长态度坚决，也没有再说什么，忙忙回去复命去了。

第三天中午12点左右，只见杜建时又充当说客，伯苓公坚决不允，我看到杜建时垂头丧气地回去了。第四天中午，杜建时又在中午12点左右来我家了。记得当时我正在收拾桌面上的碗筷等，看见他们师生二人坐在沙发上，杜建时在侃侃而谈，只见伯苓公一拍沙发扶手说：“蒋先生是爱国的，我也是爱国的，既然国家需要我出来，我就跑跑龙套吧！”当时我与锡补都惊呆了，坚持了这么多天，怎能一下子就答应了呢？可是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杜建时马上站起来，给校长行了一个军礼，欢天喜地地回去复命了。

杜建时离开的第二天，各大报纸头版头条都刊登了张伯苓就任考试院院长的消息。从此，家中登门拜访的客人就络绎不绝。也有劝阻伯苓公不要南下当官的，像黄钰生先生、陈学荣女士来家时，言词都很恳切。伯苓公沉吟不语，但此事大局已定，追悔也是无济于事，许多各界人士贺电如雪片纷纷而至，而其中令人最惊讶的是张群先生来的电，除了祝词以外，并说：“受委座之托，特派专机来津迎接伯苓公赴任。”

伯苓公走时很不愉快，对王夫人说：“谁也不许去，我去也是暂时的，很快就回来！”他走时，只带了贴身秘书邹性初和工友王树林，被张群先生急匆匆地接走了。

伯苓公去南京3个月后，匆匆返回天津。11月赴重庆，与喻传鉴先生长谈以后，决定辞去考试院院长一职，并递交辞呈给南京，等待批准。这时接到王恩东由香港来函：“飞飞让校长在重庆别动。”（飞飞：周恩来的化名）。这个口信使伯苓公决定留在大陆，不准去湾。

这时天津已被围困，南京派一架军用飞机到天津，

将我们一家老小12口人，王夫人、二嫂磊泽与我等接走，先到青岛，一周后飞到南京。在南京机场见到蒋经国，他代表蒋介石来接王夫人。蒋经国中等身材，1.74米左右，身着绸面皮袍，头戴黑羊羔皮帽，脖子上围着一围巾，右手提着皮袍下摆，露出白茸茸的羊毛，身后跟着两个便衣。蒋经国满面笑容问候王夫人，王夫人表示感谢。当晚我们全家人住在南京的考试院宿舍，第二天飞往重庆。赶到重庆南开中学，伯苓公满怀喜悦出来迎接王夫人及全家人。

1949年，解放战争已逼近重庆，局势非常紧张。有天下午2点钟左右，我们还在午睡未起。蒋经国突然来了，要见校长。我轻声叫醒伯苓公，他立即出来见蒋经国，蒋经国是来劝伯苓公立即动身去台湾的。伯苓公说：“我家中人很多，不方便。”蒋经国说：“我们已经考虑到了，预先准备了两架飞机，一架供您二老乘坐，机中备有两个折叠床；另一架可供您儿妇与孩子们坐。去台湾我们安排住处，去美国我们通知彭春先生安排住处。”伯苓公听后婉言谢绝，蒋经国便躬身告退。伯苓公送至客厅门口。

伯苓公夫妇都不想去台湾，我和二嫂考虑到丈夫、孩子，也不同意去台湾。

过了没几天，记得大概是11月21日，下午3点左右，蒋介石突然来访。他虽身着军装，但没有了往日的气派与神采，门口没有前呼后拥的军队，只有两辆小汽车。蒋介石满面笑容进入客厅，来意很明显：因重庆局势紧张，请伯苓公立即起程去台湾。伯苓公说：“您太爱我了。”别的话却支支吾吾地说不出来。

当时空气很紧张，王夫人立即出来见蒋介石，以坚决而严肃的口吻说：“蒋先生，他老了，身体也不好，他离不开南开学校和学生们的，也离不开3个儿子，他们都在北京、天津，他不能去台湾，更不能去美国。”蒋介石当时被王夫人噎住了，沉吟了一会儿，只会说：“啊……，嗯……。”慢慢起身告别。大概蒋介石极少受此顶撞，但对方是王夫人，又非寻常女流之辈，他不能发作，忍气而出，脸上还得露出假笑。伯苓公送到门口时，两人并立在台阶上，沉默无言，眺望远方。沉默了约1分钟，蒋下台阶走向汽车，可能一时气糊涂了，没有低头上车，只听“咚”的一声，一头碰在车门上，伯苓公忙上前扶住，问“怎么了”，蒋介石忙说：“没事，没事。”这才低头上车，悻悻而去。

王夫人不畏权势，敢说敢当，当机立断，打断了蒋介石接伯苓公去台湾的念头，伯苓公也去了一块心病，留在了祖国大陆。

（责任编辑 吴 思）

来自教会的

红军医院院长傅连璋

● 宋力 姚江

1937年初春,一位访问延安的法国记者,在采访中得知傅连璋同志曾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时,感到十分惊讶:一位英国教会精心教育与培养出来的“上帝之子”,居然会走上一条革命的道路。

童年受洗

傅连璋,字日新,1894年中秋节那天出生于福建汀州(今长汀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在家中,傅连璋排行十一,他前面的十个哥哥姐姐,因死亡、丢失、送人,仅存留了五个,但即使这样,家中生活仍是日见艰难,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

傅连璋生活的时代正是清政府统治最黑暗最腐败的时期,英法等列强用鸦片和大炮轰开了清政府闭关锁国的大门,他们在中国各地到处划租界、办工厂、设教堂。傅连璋的偏僻家乡也未能幸免,当时英国人就在汀州城北的山脚下修起了一座尖塔高耸的基督教堂,教堂还办了一所教会医院——福音医院,并附设了一所亚盛顿医科学学校。由于当时加入基督教会可以得到救济和庇护,再加上教会所宣讲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教义对深受封建专制迫害之苦的广大下层人民有一定的吸引力,因此许多穷苦人加入了基督教。傅连璋的父母就是一对虔诚的基督教徒。在他们的影响下,傅连璋出生不久,就按基督教的方式接受了洗礼,成了一名基督徒,对此,傅连璋后来曾开玩笑说:“我尚在襁褓之中,就是一个基督教徒了。”

汀州名医

傅连璋从小就聪明好学,虽然家里很穷,但朴实的

父母仍想方设法,紧衣缩食供他上学。由于教会的关系并受其影响,傅连璋上的是新式小学,课堂上先生们讲授的各种闻所未闻的科学知识使他大开眼界,懂得了许多事情,也第一次认识了世界。傅连璋从小就对医学感兴趣,他曾回忆说,当他第一次听老师讲到“细菌”这个字眼,并且得知就是它引起人们生病而不是所谓鬼神作祟时,他惊异得好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般。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幼小的心灵里第一次树立了消灭细菌治好病人的愿望。使傅连璋坚定学医信念的是他父亲。作为一个贫困的搬运工,傅老汉总想多干活、干重活,好多挣几个钱填饱一家人肚子,因而常常扭了腰、伤了胳膊,有好几次甚至很厉害,但是由于没有钱请医生,傅老汉只能硬挺着。父亲受病痛折磨的痛苦给傅连璋以很大的刺激:“我长大了一定要当医生!”

一个穷孩子想成为一名医生,这谈何容易。但谁也不会想到一个偶然的会,踢球的爱好使傅连璋结识了一位名叫希布莱尔的教会医生,在他的帮助下,傅连璋顺利地读完了小学、中学,并考取了亚盛顿医科学学校,实现了他童年的理想。傅连璋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1916年以优异的成绩从医校毕业,并立即就被聘为汀州八个县的旅行医生。他每日东奔西走,备尝辛苦,经过几年的实践学习,傅连璋的医术不断提高,连外国医生也不得不夸他是个好大夫。1918年经过严格考试,他被推举为汀州红十字协会的主任医师,1920年又担任了亚盛顿医校教员,并兼任汀州福音医院医生以及省立七中、汀洲女子师范学校的校医。这时的傅连璋已从一个穷小子变成汀州享有盛誉的名医了。希布莱尔对此非常得意,常常在汀州的豪绅名流面前以傅连璋来炫耀自己:“喏,这就是我的大弟子,是我在东方的山区传播西方文明活生生的收获。”

然而傅连璋并未按照他导师的愿望,永远作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虽然英国教会在他最初的思想意识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但是外籍医生的傲慢残暴,瞧不起中国人,尤其是对穷苦老百姓动辄申斥谩骂,不管死活的态度举止,使傅连璋越来越难以忍受。治病、治病,祖国大病缠身怎么治呢?

最初的觉醒

1925年席卷全国的五卅运动掀起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一次大革命的高潮。汀州城各阶层群众纷纷起来参加反帝爱国运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示威,大街小巷都是示威的人群,到处响起“打倒帝国主义”、“为死难同胞报仇”的怒吼声,汀州的外国人慑于反帝浪潮,惶惶不可终日。正在苦闷中徘徊的傅连璋,好像在黑暗中发现了一丝光明,他明白了:你不斗争,强盗就要杀死你。在革命浪潮的激荡下,他毅然参加了汀州声援“五卅惨案”筹备会,并组织群众罢市、罢课、示威游行。“我们再也不能像猪羊一样任人宰割了!”他穿着长衫,手拿传单,边撒边走,发表演说。回到家里,他又积极动员亲戚朋友都来参加这场斗争。“好样的”,看着他意气风发,洒脱慷慨的样子,人们由衷赞叹道,“和外国人学技术却如此爱国,难得,难得!”连一些平时认为他是“洋奴”的人,此时也不得不刮目相看。在如火如荼的群众革命风暴前,昔日气焰嚣张,无法无天的外国人吓得魂飞魄散,慌忙逃离汀州,五卅运动后,他们仍心有余悸,再也不敢回来了,在这场斗争中表现出色的傅连璋被各界人士推举为福音医院院长。

1925年底,傅连璋在连城遇见了邓子恢,当时邓子恢正在闽西创建共产党组织。两人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机,傅连璋以前读过邓子恢创办的《岩声报》,那是一份令人振奋的报纸,言辞犀利、针砭时弊,创办这份报纸的人一定不简单,傅连璋在潜意识里感觉到国家的振兴就是要靠他们这样的人。他向邓子恢讲述了自己的职业、信仰和苦闷,希望找到一条改造中国的出路。对于傅连璋的爱国表现,邓子恢是信任的,他向他讲述了鲁迅弃医从文的故事,指出“治病首先要治国,国不治则病难除”,因此在中国,“医学救国”是行不通的。他热情地鼓励傅连璋克服宗教信仰的束缚,从一个人道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完全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来。邓子恢的一席话,使傅连璋豁然醒悟,“对,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

他们治愈了我的心

1926年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参加下,北伐战争势



傅连璋将军

如破竹,节节胜利,傅连璋抑制不住内心的激情,兴奋地说:“啊,这下子有希望了!”但是年底,形势突变,各地不断传来革命运动惨遭镇压的消息,1927年4月中旬,又传来了“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的消息,傅连璋感到窒息,对祖国的前途深为担忧。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沉寂的中国又振奋起来,久久压抑在傅连璋心头的乌云中,透出了一线光明。他等待着、谛听着,他想知道这支起义部队的情况和去向,8月中旬,起义部队挥师南下,不久抵达汀州,汀州党组织找到傅连璋,要求福音医院能接纳治疗起义军伤病员,傅连璋立刻应允。于是300多名伤病员送到了医院,傅连璋亲自参与了对红军伤病员的医疗,在与他们的接触中,深受影响、启迪和鼓舞。当时任起义军20军第3师政治部主任的徐特立同志也是他的伤病员之一,经过傅连璋的精心治疗,病情迅速好转,徐老待人和蔼可亲,两人时常一块聊天,话题离不开中国革命、社会和国家的前途等问题。那时,徐老已经51岁了,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傅连璋觉得很惊奇,因为自己才33岁,但有时竟感到青年时代已经过去了。徐老却十分乐观,满怀信心的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岁正是做事业的时候,我起码还能工作三四十年呢!”徐老的话对傅连璋触动很大,他曾回忆道:“当我站在这位年已半百但还刚刚踏上了他的新的征途的共产党员面前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这种想法太可笑了,同时也有一种新的强烈的愿望,在我心中产生。”后来伤员们随起义军离开汀州城时,傅连璋深有感慨地说:“我当医

生治疗了他们的病，他们却治愈了我的心，一个真正中国人的心！”

起义军在汀州停留期间，傅连璋还见到了周恩来同志，两人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周恩来在赞颂傅连璋“是一个追求真理、关心国家命运的人”的同时，也直截了当地道出傅连璋的不足：“恐怕英国人对你的资助、上帝的教义，限制了你的思想。”周恩来祝愿他“追随真理，走出狭小的天地”。这些诚恳的话语，使傅连璋深受教育。

“苏区第一模范”

1929年9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入闽后，汀州成了游击区，敌来我往，斗争十分复杂，在这险恶的斗争环境中，傅连璋为党作了不少秘密工作，受到了锻炼和考验。1931年汀州成为中央苏区的一部分，福音医院成了中央苏区最大的一所医院，1932年秋，毛泽东率领红军攻打漳州凯旋而归，由于长期操劳忙碌、身体虚弱，他在福音医院老古井休养所疗养了四个月。傅连璋除悉心治疗外，每天下午5点都邀请毛泽东到疗养所附近的北山散步，尽量帮助毛泽东解除疲劳。毛泽东非常关心傅连璋的思想进步，启发他要不断提高无产阶级觉悟。这对于傅连璋世界观的转变，起了很大作用。他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说：“这四个月与其说是我护理了毛主席，还不如说是毛主席在政治思想上护理了我……我相信自己终有那么一天，能站在党旗下，向党交出一颗心，把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献给共产主义事业，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在毛主席的倡导下，1933年初，福音医院搬到红都瑞金，摘掉了基督医院的帽子，改名为中央红色医院，傅连璋被任命为院长。傅连璋全家也搬往瑞金，他把整个医院和自己的全部家产都捐献给了党。当时他还把自己多年的积蓄四千多块银元全部兑换成苏维埃币，以支援革命，这是笔数目不小的银元，受到中央银行行长毛泽民同志的重视，因为当时苏维埃币只能在苏区通用，白区购物必须支付银元，而苏区货物比较缺乏。毛泽民劝傅连璋少兑换一些以备不时之需，傅连璋坚决地说：不必了，我下了决心了，破釜沉舟，决不再回江东，我的一切都交给革命了！”傅连璋的行动获得了广大苏区人民的称赞，当时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为表彰他将医院和全部家产献给革命，专门发了一篇题为《红匾送给捐助巨产的傅院长》的文章，称赞他是“苏区第一个模范”。在这期间，傅向党提出过入党的申请，但由于种种因素，尤其是左倾错误的横行，这个问题被搁置起来了，尽管如此，人们对傅院长仍充满了敬意，虽然他还不是一个党员，但医院里很多党支部活动，都吸收他参加，

党中央召开的一些党内报告会，也邀请他去听。

毛泽东建议他入党

1935年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的领导，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革命根据地形势日益恶化。傅连璋尽管此时已被误打为“AB团”分子，也曾一度产生过苦闷、困惑，但革命的信念一直没有动摇过。1934年9月，毛泽东在于都病倒，连续数天高烧不退，情况十分危急，傅连璋昼夜兼程，前往诊治，3天后，毛泽东完全恢复了健康。毛泽东的及时病愈，使他得以参加长征并能够及时亲手拨正中国革命的航向。后来人们都说傅连璋在关键时刻为党立了一大功。

1934年10月，长征开始了，傅连璋不顾身体虚弱，义无反顾地随红军总医院参加了行动。二万五千里漫漫征途，充满了艰险，傅连璋却时时感到党和同志们的关怀。有一次，傅连璋走在一条狭窄的高山路上，一不小心连人带马掉进了河里，几位战士见了不顾个人安危，一边呼救，一边滑下三四丈高的沙堤，跳进河里把他救了上来，但是由于水太急，马和行李被水冲走了，没有马还可以步行，但是没有了行李，这么冷的天，夜里没有盖的，怎么办呢？正当傅连璋一筹莫展的时候，毛主席派一名警卫员来看望他，并送来毛主席自己用的被子，这样毛主席只剩下一条毯子御寒了，蔡畅同志也送来了一匹骡子。这一切使傅连璋十分感动。过雪山的时候，傅连璋曾几度昏迷，战士们见状，轮流背起他走下山。后来傅连璋曾回忆说：“在雪山上，是党和同志们救了我，我将永世不忘！”

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毛主席见到了傅连璋，高兴得连声道：“哎呀，傅医生，你还活着，活着！”是的，傅连璋奇迹般地活下来，并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原来不少同志担心傅连璋身体虚弱，难以爬过雪山、草地，甚至有人传说他牺牲在草地上了，但他毕竟经受了考验。

到达延安后，傅连璋担任了中央总卫生处处长兼陕甘宁边区医院院长，经过长征的考验，他更成熟了。1938年5月的一个下午，他照例为毛主席进行巡诊，毛主席和他直接谈起了入党的问题，十分严肃和关切地说：“傅医生，我看你可以入党了！基督教徒成为共产党员，这很有教育意义，很有说服力……你的历史我可以证明，你去找陈云同志谈一谈，同志们会帮助你的。”听到这些话，傅连璋一时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立即跑到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同志的住处，向陈云提出了入党的要求。在陈云的帮助下，傅连璋参加了党的干部训练班学习，并于9月7日正式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责任编辑 吴 思）

张学良在夏威夷谈往事

● 张天华

夏威夷——一颗镶嵌在太平洋中部的明珠。一望无涯的大海，独特的冲浪，和煦的阳光，清新的空气，如洗如雪的沙滩，大自然赋予无限风光和宜人的气候。

在夏威夷著名的威基基海滩，每天上午都会出现一位坐着轮椅散步的中国老人，来自全世界的游客很少注意他。偶尔有认识他的中国游客冲着他叫张大帅，他也不以为忤。只有看到孩子时，他会拿出预先备妥的糖果把手伸向小朋友，脸上也露出童稚般的笑容。

没有人知道，这位“世纪老人”曾在60多年前叱咤风云，几乎改写了中国历史。也没有人知道，他就是因为发动“西安事变”而被软禁了近60年，已经97岁高龄的张学良将军，在山明水秀、风景明媚的环境里，正享受含饴弄孙、生命中迟来的自由。

张学良，字汉卿，号毅庵，1901年生，是东北军阀张作霖的儿子。张作霖虽然是行武出身，却对张学良的教育非常重视，举凡国学、英文、武艺都打下了良好基础。张学良原本想做一名医生，但是张作霖却要他从军，好继承他的功业。

19岁的张学良，戎马生涯的第一仗，是讨伐吉林、黑龙江的土匪，初战告捷。

23岁的张学良，已率领大军打过两次直奉战争，赫赫有名的大军阀吴佩孚、西北军的冯玉祥都曾是他的手下败将。

国恨家仇

1928年6月3日张作霖离开北京返回沈阳，6月4日凌晨途经皇姑屯站附近，被日本军队埋下的炸弹炸死，史称“皇姑屯事件”。

张作霖被炸死后，张学良由北京化装匆匆赶回东北，对日本的杀父之仇不动声色，对外封锁张作霖死亡的消息，快速接管一切大权，让日本人找不到机会出兵。

1928年7月3日，28岁的张学良被推举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并决定与国民政府合作。同年12月29日，东北及热河突然易帜将原先悬挂的五色旗帜，改换成青

天白日旗。他把30万兵力纳入国民革命军的体系中。

中原大战中，张学良应国民政府之请派兵10万进行武装调停，取得胜利。30岁的张学良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副总司令。

“剿共”不得民心

东北沦陷，热河失守，国内指责张学良的声音高涨。1933年3月，张学良辞去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副总司令。之后在上海治疗鸦片中毒，然后远赴欧洲。在欧洲停留10个月后，于1934年回国，被任命为西北“剿共”总司令部副司令。他带领着东北军在西北同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作战。东北军深受思乡之苦，又饱受无法与日军决一死战夺回家园之恨，不安的心情，深深震动了张学良，也就埋下了“西安事变”的引信。

“九·一八事变”之后，全国抗日情绪高涨，蒋介石却提出“攘外必须先安内”政策，加强“剿共”。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忏悔录中说，东北军指责他忘了杀父仇人，不顾抗日大业。共产党提出的“八一宣言”呼吁一致抗日、停止内战，获得了极大的回响。

张学良：“‘剿共’这个事情我并不乐意，我那时跟蒋先生说，并不是蒋先生讲话的‘长他人志气’。我不是那样。我是说一个是得老百姓拥护，一个是不得老百姓拥护，这是很大关系。”

记者：“为什么那时候，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多少年，他们就已经在得老百姓拥护呢？”

张学良：“你问到这个问题，我心里很难过的答复，我们不得民心。我们呐，不得民心！这很要紧的，所以我从事那个战争痛苦得很，我们不得民心。”

“中国人里第一个佩服的人是周恩来”

“剿共”的东北军节节败退，两位师长阵亡，军心更加动荡。张学良发觉事态严重，于是1936年4月与周

恩来会面,确定双方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想法。

记者:“是不是可以谈一下你跟周恩来之间的关系,周恩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张学良:“我们很好。不过,我跟周恩来没太深的交情。但是谈可以说是谈得很合,一针见血。我认为毛泽东的成功,可以说是周恩来的成功。我在中国的人里,佩服的几个人,佩服周恩来是第一个,我是非常佩服他。周恩来这个人我始终佩服他,他给我下了八个字‘爱国英雄,千古功臣’。他这个人是爱国的,不是为自己地位,自己的利益。他在共产党内地位很高,你看历史上开会、坐位子,他都是坐第三、第四、第五那样的位子。所以周恩来这个人我很佩服。”自从张学良与周恩来见面后,张学良开始积极说服蒋介石,但是都失望了。

幽居半世纪

许多人都以为,“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南京是同机而行,其实张学良是搭乘后一架飞机。张学良到南京五天后,军法会判决他10年徒刑。但蒋介石随即又特赦了他。决定由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从此张学良在政治舞台上消失。张学良一生最想和日本作战,可是当中国同日本打了8年战争时,他却缺席了。

36岁的壮年张学良自1936年12月开始了囚犯幽居生活,先后在浙江、安徽、江西、贵州、湖南等地被软禁。国民党当局逃台时,张学良被移往台湾新竹,后来在北投定居,其间他曾多次透过渠道表达意思,但是都未能如愿。他曾写了一首诗给来看他的朋友:“总府远来意义深,山居何敢动真宾。不堪酒贱酬知己,惟有清茗对此心。”



1989年张学良在台湾家门口

记者:“在被拘禁的半个世纪时间里,你是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度过的呢?”

张学良:“我自个儿问我自个儿,上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我一乐也,我是个基督徒,我那时候就是忍耐、等待,忍耐、等待。”

记者:“你回顾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你觉得哪一段日子最开心,最高兴的?”

张学良:“这个我说不出来,我总是开心、高兴。我不是说笑,我这个人乐观主义。我常常说,明天要把我枪毙了,今天晚上照样睡大觉。”

迟来的自由

张学良首次在公开场合出现是1990年6月1日,由已故台湾“总统府资政”张群发起,有近200位国民党要员和东北故旧在台北市圆山大饭店,公开为他庆祝90岁生日,九层生日蛋糕旁边,竖放着“千古功臣”大匾,李登辉也托李元簇送“寿”字屏致贺。这标志着张学良逾半个世纪的幽居生活正式结束。当时,台湾还有民间团体上书李登辉,希望能还给张学良“真正的自由”。李登辉没有正式回应,反倒是张学良主动发布公开信,强调自己这几年的生活“已经完全自由”。

就在张学良过完90大寿之后,他的好友张群等一个个去世,张学良幽居大半辈子,此刻却感到真正的寂寞和苍凉。他告诉赵四小姐,他想去美国看看孩子。他们夫妇商量了半天却不知道能否成行。张学良把自己的心事告诉了邱进益,邱答应转达。

1991年春节前夕,李登辉夫妇邀请张学良夫妇在官邸会餐,邱进益也做陪,席间张学良提起去美国看孩子的念头,李登辉连声说好,好。并表示,张学良将军能出去散散心,是好事。此后不久,于3月10日,张学良将军和夫人赵一荻即启程赴美探亲。张学良首次赴美访问引起各方注目,在美国度过91岁生日,于6月底返回台湾。

夕照夏威夷海滩

1993年12月15日,张学良将军卖掉在台北市北投的房子,拍卖部分古董收藏二度赴美。原本计划前往加州与独子团聚,不料因为探视弟弟张学森在路过檀香山时,而临时起意决定定居在四季如春的威基基海滩旁的“希尔顿夏威夷村”。张学良所住的大楼名为“礁岩塔”。大楼位于檀香山市市区的金成居宅区,大楼旁边就是一片蓝色的汪洋大海,景色十分美丽,楼前有一个巧夺天工的人工淡水湖。大楼只能承租不能购买,租

金不低,居民大多为略有资产积蓄,退休后颐养天年的老人。97岁高龄的张学良与夫人赵一获移居夏威夷已4年多,在当地人的眼里,他是一位安静的中国老人,邻居和大楼管理人员都称他为“张先生”,而对张学良的过去一无所知。大楼管理人员透露,“已有人交待过,张先生是个特别人物,我们不能随便跟外人讲他的情况。”1996年6月,张学良的寿宴就在希尔顿饭店举行,前往祝寿的至亲好友、东北同乡、当地华侨共200多人参加,海峡两岸都有代表祝贺,场面热闹非凡。

张学良将军夫妇在夏威夷,精神怡然自得,生活很恬静,心情开朗。他除了视力和听力稍有减退,平日除了一些小病痛外尚无任何大病。可以在夫人赵一获陪同下,随意坐着轮椅散步享受阳光、海滩和清新的空气。然后返回寓所,夫妻二人一起念经,也可以在每周四约朋友打牌。还可以作礼拜,唱京戏或与朋友聊天,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张学良将军一生另一个传奇就是他与赵四小姐赵一获的姻缘,赵四小姐17岁就投奔张学良,比张学良小11岁,直到53岁时才正式与张学良举行婚礼。她照顾张学良的生活,带领他信奉基督教,是张学良一生中最重要的女性。赵四小姐与张学良生了一个儿子张闾琳,而张学良与元配于凤至育有三子一女。于凤至已于1990年在美国病逝。年青时期的张学良,风流倜傥,韵事不断,赵四小姐未曾离去,张学良被幽禁,赵四小姐亦随同坐监,转眼60多年。

宗教是张学良夫妇的精神寄托和生活重心。每个星期天固定前往夏威夷的檀香山中华基督教会中文堂做礼拜。该教堂有百余年历史,孙中山先生早年曾在此创立中兴会。在中文会堂右前方有张学良夫妇固定的位子,他和夫人衣着朴素,精神专注,同教友们一起唱诗歌,祷告及谈话。张学良听力不佳,但对牧师所念经文及唱诗般的歌声却很有感觉,不时流露出小孩子般的动作,一会儿摘下黑色的小单帽,摸一摸头,一会儿又戴上,双手又下意识地轻轻按一按。张学良很随和,对趋前问好的教友态度也很和善,不论熟知与否,都和善答礼,大家不去问他过去的事情,谈的都是宗教信仰。牧师说,张将军和夫人非常虔诚,不管将军的人生如何大起大落,他的心中没有恨,只有爱。

除上教堂作礼拜,打牌也是张学良将军的主要活动,吴先生是张学良将军的亲信、部属和司机,他常陪将军打麻将,以让老人家有机会可以用用脑,动动手,运动一下神经与肌肉。吴太太知道张将军喜爱面食,她常常炒一些盒粉带给老人家,作为打牌之后的晚餐。

疼爱张学良将军的侄女琳达来看他,推着轮椅漫步海滩,逗弄着老人家,要他讲有关怕太太的笑话,老人家赤子心一发,高兴地念着自己改编的童谣:“不要吵、不

要闹,小彼得要睡大觉。”他自称小彼得,夫人赵四小姐也说他是5岁的小彼得。

思乡苦,回乡难

张学良将军非常适应夏威夷的环境、气候,生活得舒适、悠闲。但是,张学良将军思乡心切,他因“西安事变”遭幽居软禁长达半个世纪后,虽已耄耋之年,仍沦落异域他乡,内心也有些许寂寞与无奈。张学良将军颇为怀念故国山河与东北父老,也多次表示希望有一天在身体状况许可的情况下,以老兵的身份回东北与乡亲叙旧,祖国大陆的亲朋好友及东北的父老乡亲也非常希望张学良回东北老家聚会。但是张学良始终没有答应。据张学良的东北同乡、台湾前“立法院院长”梁肃戎透露,有一次外界报道张学良有意赴祖国大陆,台湾当局便透过渠道希望他最好不回去,张学良的大陆行因此作罢。梁肃戎称,张学良对台湾当局“多年来对他的嘘寒问暖”始终有一种“感念心情”,他“不能做面子上过不去的事情。”

有心长留夏威夷

1993年底张学良夫妇移居夏威夷,并向美国移民局提出申请,1995年美国移民局正式核发绿卡给张学良夫妇。他不会回大陆,也不再去台湾。据透露,张学良已在夏威夷欧胡岛的私人墓地觅得落叶长久安息地(与已故船王包玉刚毗邻),据说张学良将军还亲自设计妥陵寝造型和拟妥碑文。

“毅荻书斋”藏历史

张学良将军很少谈及过去的传奇历史,他认为自己谈自己的历史是“丑表功”。因此,一直坚持“淡泊人生,毁誉由人”的平常心。但张学良将军不知什么原因,还是很高兴地为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做了口述历史,定于2002年公开。同时将他珍藏的1936年以来的档案赠送给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哥大图书馆特意兴建了以张学良将军夫妇字号命名的“毅荻书斋”,以庋藏张学良所赠的档案和口述历史资料。

张学良将军不谈功过,不论是非。不论是千古功臣,还是叛逆罪人。任凭潮起潮退,坐看日出日落,前尘往事让人评说。但是,富于传奇色彩的“二十世纪见证人”张学良将军,在中国近代史上永远有他浓重的一笔。

(责任编辑 吴 思)

“两航” 产权引发的 国际争端

● 王 德

新中国成立不久，“两航”飞机产权的归属问题就成为引人注目的焦点。新中国、台湾国民党当局、美国和英国都卷入这一场争斗之中。

“两航”指的是国民政府时期民航业的两大公司：中国航空公司（简称“中航”）和中央航空公司（简称“央航”）。这两家航空公司是民国时期航空业的两大支柱。1948年，随着人民解放军展开的摧枯拉朽的军事攻势，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已成定局。国民党当局命令“两航”公司总部及主要资产撤至香港等地，以便将来全部撤至台湾，“两航”公司撤至香港时共拥有C-46、C-47、DC-3、DC-4和CV-240型等飞机共90余架，空地勤人员6780人，另外还有一批航空器材。

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早就决心要建立新中国的航空事业。1949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就表示要建立空军和民航，当年召开的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把“有计划，有步骤地建造各种交通工具和创办民用航空”写进了具有新中国临时宪法

作用的《共同纲领》之中。但是，新中国建立后百废待兴，国家不可能拿出更多的钱来办民航。争取“两航”起义，获得其财产和宝贵的技术人才，对于从无到有发展新中国民航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早在1949年6月，中共中央就发出指示，中共香港地下组织集中力量争取“两航”起义。不久，中共上海市委和军管会也主动请缨，做争取“两航”起义的工作，并推荐吕明和查镇湖（又名查夷平）一起去香港完成这项重大任务。吕明，原国民党空军中的地下共产党员，曾在美国接受过飞行训练，与“中航”总经理刘敬宜是故交，另外他在“两航”飞行员中有许多好友。查镇湖，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曾任“央航”副总经理。由他们去做工作，具有极为有利的条件，成功的把握较大，于是中央军委批准了他们的请求。1949年8月，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和中共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在北京中南海宴请吕明和查镇湖，周恩来作了具体的指示，组织“两航”集体起义，把两航基地拖在香港，拒迁台

湾。他叮嘱道：争取人才是最主要的，有了人就可以办起新中国的航空事业，一定要把中国航空精华带回来。

两航起义

吕明和查镇湖于8月底抵达香港后，迅速与中共香港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吕明秘密会见了在“两航”工作的“中航”香港办事处处长何凤元，“中航”空勤报务员、共产党员陈元斌，“中航”气象员、共产党员陈耀寰等人，向他们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决定由他们共同组织领导起义工作。中央香港地下组织的勇士们在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下，斗智斗勇，卓有成效地开展了紧张危险的争取工作。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举行了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惊天动地的声音，使得每一个有爱心的炎黄子孙心潮澎湃，向往新中国乃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两航”中的爱国志士们更坚定了起义的信心。1949年10月10日，离香港咫

尺之遥的广州宣告解放，起义条件完全成熟了。11月9日，震惊中外的“两航”起义开始了，总共12架飞机从香港飞回大陆。其中，吕明和查镇湖陪同“两航”总经理刘敬宜和陈卓林乘坐由潘国定机长驾驶的长机CV-240型XT-610号飞机，由香港直飞北京。

刘敬宜，中国航空事业的一代天骄。1942至1945年他出任中国驻美航空代表团团长兼驻美大使馆航空事务参赞。1944年4月，他参加了在芝加哥举行的第一届国际民航组织会议，被推选为技术标准与措施委员会第五小组委员会主席。1947年5月，精明强干，富有爱国精神的刘敬宜接任了“中航”总经理的职务，他上任后，强化中方对公司的领导权，任命富有进取精神的中方人员，争取同美国人员“同工同酬”制度，改变了“中航”长期以来美国飞行员享有特权的局面。这使他在“中航”享有崇高的威望。

陈卓林以卓越的经营管理能力著称于中国航空界。1943年，德国在中国建立的“欧亚”航空公司改组为“中央航空运输公司”。由于“欧亚”公司停在香港的飞机几乎全被日军炸毁，实际上可供使用的仅两架飞机，公司入不敷出。员工甚至靠卖配给汽油度日，实际上处于破产的境地，陈卓林上任后，决心振兴“中航”，“要建立一个真正由中国人自己办的航空公司”。他延揽人才，把“中航”的著名华裔、华侨机长陈文宽、陈文惠以及洪启明纳至麾下，予以重用，使这些在“中航”长期受美国人欺压，忧郁苦闷的杰出人才分别升任为“中航”机航主任、副主任和总飞机师，给予他们自由发挥才能的天地。1945年和1947年，他又出手惊人，两次筹巨款购买飞机，经过短短6年时间，到1949年，“中航”就拥有了42架飞机。就运力

来说，已与“中航”并驾齐驱了

同时归来的11架飞机（3架C-46型，8架C-47型飞机）由机长陈达礼带队，从香港直飞天津。两航总经理联名致电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和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声明两航回到祖国的怀抱。11月12日，毛主席致电刘、陈二位总经理及“两航”全体员工，表示欢迎和慰问，高度评价了他们的起义壮举。同日周总理也致函勉励全体员工“坚持爱国立场，努力进步，为建设新中国的航空事业而奋斗”，并宣布“两航”受中央人民政府管辖，任命刘敬宜为“中航”总经理，陈卓林为“中航”总经理。1949年11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欢迎两航空公司起义》。

“两航”公司案始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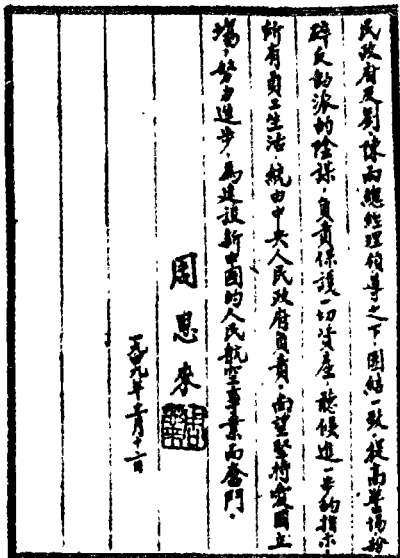
“两航”起义后，除起义北飞的12架飞机外在香港尚有70余架飞机。“两航”起义人员正组织力量向新中国境内抢运设备、飞机零件等。惊闻“两航”起义的消息，台湾国民党当局立即向港英当局提出了管制“两航”财产的要求，同时他们也知道：自己恐怕不是人民政权的手。于是心生一计，让美国来插手此事。1949年12月，台湾国民党当局把“两航”公司的飞机和财产“出售”给了美国人陈纳德。随后陈纳德又把飞机转手给他本人控制的在美国临时注册的“民用航空公司”，这下正迎合了美国政府敌视新中国的态度。美国政府立即作出反应，要求英国政府采取措施，勿让中共得到这批飞机。一场围绕“两航”飞机归属的大争夺开始了。

新中国为争取和保卫国家财产进行了积极坚决的斗争。1949年11月12日，周恩来总理在致起义员工的信中，宣布“两航”公司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财产。12

月3日，周总理又发表声明：“两航”公司留在香港的资产，决不容许任何人以任何手段移动或损坏，中国政府的此项产权应受到香港的尊重，如非法侵犯、移动或损坏，香港政府必须负完全责任。陈纳德听到中国政府的严正声明后，唯恐得不到这批庞大的财产，在有美国政府撑腰的情况下，竟然以中国的国家财产作为标的提出诉讼，香港法院也竟然宣布“管制”“两航”资产3个月，由它来对财产归属问题进行裁决。陈纳德知道，依据国际法和国际惯例进行裁决，自己非败诉不可。1950年1月4日，陈纳德派“民用航空公司”驻香港代表面晤港督，要求港督对香港地方法院施加影响，作出有利于美国“民用航空公司”的裁决。1950年2月30日，香港地方法院判决“两航”公司飞机的产权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国民党当局“出售”无效。美国民用航空公司苦心营造的计划落空，他们不甘心失败，不服从判决，提出上诉。美国政府公然挥动其强权政治的大棒，美国国务院官员通知英国驻华华盛顿大使，威胁说，如果香港将“两航”飞机交给北京，美国将中止根据“马歇尔计划”对英国的援助。同时美国驻伦敦的外交代表多次约见英国外交部官员，施加压力。

英国政府此时的立场是：根据英国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享有支配这些飞机的权利，具体裁决由香港法院作出。英国政府通过其代办胡阶森向中国方面表述了这一立场，台湾国民党当局心虚，指使其特务加紧对“两航”财产进行破坏的活动。4月2日，由于香港方面安全工作出现重大疏漏，7架两航飞机被炸坏，4月4日，周恩来总理发表声明。指责港英当局阻挠“两航”飞机回归祖国，要求立即放行剩余飞机，并对中国损失负完全责任。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用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用



周恩来总理祝贺“两航”起义原函影印件

面对新中国的严正要求和美国撤销经援的巨大压力，经过再三权衡，英国内阁会议决定接受英国检察总长的建议，将飞机扣留香港。1950年5月10日，英国枢密院颁布枢密院令，否决香港地方法院关于“两航”飞机产权的判决。宣布在对飞机产权作出终审裁决前，将飞机扣留香港。中国对英国政府不守信用，出尔反尔，视改变国家政策如儿戏的卑劣行径表示极度的震惊和愤怒，5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向英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5月2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责英国政府在“两航”飞机问题上两面派的作法。

遗憾的是，英国政府追随美国的决心已定，不仅不对“两航”飞机问题做出积极的反应，枢密院反而于1952年7月28日将“央航”的40架飞机及其他财产判给陈纳德的美国民用航空公司。是夜，港英当局出动大批武装人员突袭存放“两航”飞机及其物资的启德机场和庇利船厂、新亚药厂的两家仓库，殴打、逮捕和拘禁中国守护这些飞机的全部员工，劫夺所有的71架飞机和全部资产。同年8月2

日，章汉夫副外长发表声明，谴责英国的横暴行为，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英国政府追随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敌视态度的重大表现。”特向英国政府方面提出严重抗议，并要求归还所劫财产。英国政府不为所动，中国方面采取了坚决的回击措施。同年8月15日，上海市军管会宣布征用英资上海英联船厂和马勒机器厂的全部财产。同年10月8日，曾从法律上确认“两航”飞机归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香港地方法院又将“中航”所属的31架飞机及资产也判给陈纳德的美国民用航空公司，中国政府再次提出严重抗议，再次得不到答复后，上海市军管会在11月20日宣布征用英资上海电车公司、上海自来水公司、上海煤气公司和隆茂洋行。同时隆茂洋行在天津、武汉的全部资产也被征用。至此“两航”飞机大争夺全面结束。

在历时三年的“两航”飞机归属的争夺之中，新中国方面得到了起义北飞的12架飞机，一些从香港抢运回来的航空器材和修理设备。同时一批最为宝贵的航空人才回到了人民的怀抱，这批人才立即

修复了国民党遗留在大陆上的17架坏飞机，显示了他们的重大作用。这29架飞机就构成了新中国初期民航业飞行工具的主体。“两航”斗争的结果使新中国获得了发展民航业的必要基础。当然由于美国对新中国政权的敌视和英国政府的背信弃义，新中国民航事业还是遭到了重大的损失。

(责任编辑 吴思)

更正

本刊第3期第3页右栏引用唐朝诗人杜牧的《阿房宫赋》有误，其中“族秦者，秦也，非六国也”，应为“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第15页右栏，“1927年7月，北伐战争正式拉开序幕”，应为“1926年7月，北伐战争正式拉开序幕”。第16页右栏，“汪清卫”，应为“汪精卫”。第19页中栏，“1932年的‘二七’大罢工”，应为“1923年的‘二七’大罢工”。第四期第26页左栏，“公元1985年9月9日”，应为“公元1958年9月9日”。特此更正，谨向读者致歉。

本刊编辑部

张子善被处决前的悔恨

● 范玉昆

第一次见到张子善,是在冀中专署召开的教师座谈会上。由于刚解放,大部分是新区,国民党长期的反动宣传,在教师当中存在着各种糊涂观念及对共产党的模糊认识。张子善当时是十地委书记,针对这种情况作了讲话,宣传党的教育和知识分子政策。谈的很深入,很贴切,对一些思想情况摸得很透。

那时张子善衣着很朴素,披着旧军大衣,光着头,穿一双大头棉鞋,一边在台上来回走着,一边讲,没有稿,讲的很自然、舒畅。休息间隙,他还和大家亲切交谈。他吸的烟很一般,有时还用纸卷两根。影响很好。

不久,我调到十专署做文书工作。张子善一见面就问:“小鬼,为什么你留着头?”我说:“为了保护脑子。”他摘了帽子,“你看,我和同志们都光着头,没留发,难道都不知保护脑子。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何必羞羞答答的,将来进城有条件,也许都留起头发,可现在你却脱离我们这些光头群众。”说得我怪不好意思。那时他依然朴实近人。工作抓得紧,还经常配合中心工作,发表一些指导性的文章。帮助麦收、打扫街道他都带头干,干得还很出色。

不久,十区与九区合并为天津专区,从永清县搬到杨柳青镇,张子善任专员。开始,张子善变化不大,还抓工作,为了便于深入了解新划入县镇的基本情况,他让我绘制了许多图表,他还经常发表一些文章。

过了一段,张子善开始和刘青山(天津地委书记)往天津跑。张的小姨子在天津,随后,张与天津市五

毒俱全的张××女资本家勾结在一起,有些不该去的地方,换了装也钻进去,服饰也随之讲究起来,原先的军大衣换成了水獭领子礼服呢皮大衣,吸的烟再不是卷的了,而是市场很难买到的高级香烟,吃的也不是规定的灶别,而是特灶。专署大院也很少去(他和刘青山住在地委),有事李克才同志还得上地委找他。党小组会也不怎么参加,他所关心和追逐的就是“机关生产”和享乐。

作风也变得非常霸道,听不进意见。在一次会议上,教育科长李玉田,不同意随便占用教育经费,张子善无名火起:“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不愿开会你出去!”建设科长曹子平为了工作,与他持不同意见,也遭同样的“礼遇”。而对迎合吹捧,为其大开方便之门的则倍加重用。他网罗亲信、排斥异己,扩大个人权力,实际上地委党组为张子善左右。甚至有的无耻之徒,高喊“张子善万岁”。

1950年秋,我调到省农林厅。1951年夏,我在北戴河疗养,路过西餐厅,见到张子善、刘青山、朱康(地委委员,公安处长)及他们的家属,他们正在用餐,张打招呼,我进去了,一看都是穿着人时,丝绸包身,个个精神十足,我只和张及其爱人赵玉秀熟,我无意识地半开玩笑地说:“总土了,该洋也得洋,不然也对不起这张总吃小米、玉米面的嘴,享受享受吧,也不过分嘛。”同年11月,在保定车站交通旅馆(当时是最好的)又遇见了张子善,我在一楼筹备展览,他开党代会住在二楼,虽然他穿着很得体,但精神显得疲倦,脸

色也不好,跟前几个月在北戴河相见时判若两人。按说,他应该精神好,因他刚由专员升地委书记。我说:“老张,保定马家鸡铺的卤煮鸡可有名,你不是爱吃名特产吗?”他摇摇头说,特别累,什么也不想吃。因为忙,就没再聊下去。以后两天,再没见到他,后来才知道在这次党代会上张子善被拘留、逮捕入狱。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审理张子善案子的省法院院长却是原十专署专员宋志毅——原专员审原地委书记。

入狱之初,张子善还自恃有功,觉得不会是死罪,可是随着审查的深入,感到罪恶严重,幻想破灭了。

在公审宣判前夕,宋志毅以双重身份——过去的战友、同志和今天的审判官,见了她。

此时,张有所悟,其言亦善:过去大家的批评、抵制,甚至揭发,都是为了挽救我和维护党纪国法,这样做是对的,像李克才等。与之相反,是极为错误的,是极为有害的。我一生坐过两次监狱,过去是坐敌人的,搞学潮,在监狱作过绝食斗争,是为革命,是光荣的。现在坐自己的监狱,是犯了罪,给党和国家造成了极恶劣影响,是可耻的,现在吃不下饭,可不是绝食,是负罪感。唯一的希望是“以我为戒”,把我当成一个敲钟的棒,用我来敲敲吧。

张子善被枪决在保定市东关外荒土坡上——也就是我现在的离休单位河北省植保所院墙外。

(责任编辑 赵友慈)

《红岩》作者罗广斌

“文革”中死因之争

● 郑光路

富家少爷投身革命 被捕后拒绝出狱

罗广斌是四川忠县人。1924年出生。他父亲罗宇涵历任县政府科长、县参议员、川大法学院训育主任等职。其异母兄罗广文，先后历任国民党18军军长、15兵团司令等职，临近解放时起义，站到了共产党一边。罗广斌的母亲罗蕴山（又叫牟蕴山），为其父侧室夫人，颇有文化修养，曾历任四川高等法院书记官、事务主任等，还曾在太来乡创办罗氏私立小学，自任校长十余年。罗广斌深得其父母的宠爱，是膝下的“幺儿”。可见，罗广斌出生在有文化、声望、权势的大家族。他文革中对红卫兵很坦诚地说：“参加革命前，过了二十一年的公子哥儿生活……”

但是，这位有着优越家庭背景的富家少爷，毅然背叛了阶级出身，在1945年经马识途（中共地下党四川负责人之一）介绍，加入“民青社”，1948年加入共产党。

罗广斌是怎样被国民党特务逮捕的呢？据徐远举（军统西南区区长、特务头子，《红岩》书中徐鹏飞的原型）供认，原来早在1948年的4月（罗广斌刚刚入党），国民党特务就掌握着罗广斌这个线索，知道他是罗广文的兄弟，在秀山某中学活动，徐远举在解放后的供词说：“罗广斌是官僚地主资本家出身，是少爷，闹革命是赶时髦……”

所以，特务就想通过他抓上级，以他为饵，定下一个“诱捕”计划，目的在“中共重庆及川东组织遭到

破坏后，继续破坏川西组织”。

逮捕罗广斌，当时风雨飘摇的国民党当局也有顾虑，因为其兄罗广文手握重兵。当局投鼠忌器，怕罗广文倾向共产党。

徐远举解放后供认：“罗广文系国民党头目，为陈诚嫡系，他的部队当时驻在重庆及川北地区，诚恐他兄弟的被捕影响他的情绪，同时观察罗广文之意志，因此，我根据叛徒的材料，找罗广文作了一次秘密谈话。谈话地点系重庆城内老街慈居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办公室里。谈话之时，我把罗广斌的情况告诉了罗广文。罗广文说，他兄弟是同父异母所生，因他家庭的溺爱，非常调皮，到处乱跑，他家庭对他管教不了，据说有那种情况（按：指罗参加地下活动），他现已回到家里，住在成都少城附近某街他家中，你可派人去找来管教管教。他家里非常感激，并把成都他的家庭地址开给了我，我根据以上材料派侦讯科的股长左志良前往逮捕。”

罗广斌由成都转押重庆，先关押在渣滓洞监狱，后又关押在白公馆监狱。在自传中，罗广斌回忆：“刚进牢，只有一个感觉，就是‘度日如年’，‘完了’。在混乱中，只还记得老马的一句话：不管直接、间接，影响别人被捕，都算犯罪行为！我当时并没有为了人民革命事业，牺牲自己的绝对明确的意志，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不影响任何朋友。一直到送出渣滓洞，我还存有可以释放的侥幸心理。”

“徐远举对我的要求很简单，组织已经破坏了，也不用我参加工作，只单纯要求我停止‘政治生活’，写悔过书出去。他给罗广文的信上说‘令弟年幼无知，



罗广斌

误入歧途，若稍知悔悟，即行优先予以自新机会’，‘稍知’二字旁边的圈是他在底稿上注明的，所以冉益智说‘你只要稍微表示一下态度’，还说‘人都是动摇的、矛盾的，你不要过分坚持，免得以后玉石俱焚’。江竹筠同志说：‘毒刑、镣铐是太小的考验！’我很了解她的坚定和说这话的意思，我知道，‘自己受的是太小太小的考验，比之于千百个革命烈士所受过的，那是太微不足道了’（在狱中给女室同志们慰问的回信）。我没有受刑，但是不是要求自己能通过毒刑的考验呢？我以为答复是肯定的。最后，徐远举用老虎凳威胁，终之，下令给我带镣。带镣以后，难友们发起的慰问，收到了许多东西，尤其是诗，其中只记得何雪松的一首题目是《我们的海燕》，很惭愧，也很兴奋。我知道，自己的不屈服，对渣滓洞的难友们是一个某种程度的‘示范作用’，尤其是以我这样的出身来说。但反过来，朋友们的鼓励是不是多少还有打气，还有‘要稳住呀’的成分在呢？我相信，这也是有的，考虑之下，我写了一首‘我的自白书’作为对难友们的一个答复，也明白地表示了自己的态度：

‘望着脚下沉重的铁镣，我没有什么需要自白，就

拿起皮鞭吧，举起你们尖锐的刺刀吧！我知道，你们饶不了我，正如我饶不了你们一样，毒刑、拷打、枪毙、活埋，你们要怎么干，就怎么干吧！……’”

罗广斌被捕后，关在重庆中美合作所。他在狱中，并不像徐远举等特务估计那样：“是少爷小姐，没有坚定立场。”罗广斌没有叛变之举。

罗广斌的难友刘德彬、杨益言的证明说：1949年7月，罗广斌的地主老子曾和特务一起与罗广斌谈判恢复自由问题，因罗拒绝保证“出狱后不再参加共产党的活动”，拒绝出狱。

临近解放前不久，罗广斌才和少数幸存者，从被称为“人间地狱”的中美合作所越狱逃走。

《红岩》的写作得到省市领导的支持，“文革”中因此受牵连

解放后，罗广斌的家庭出身（所谓政治成份），成了严重“污点”。他从中美合作所幸存下来，成为有关部门一桩“疑案”，多次“组织审查”。新执政的共产党，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非常重视“阶级出身”（这在文革中达到顶点，“老子反动儿混蛋，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血统论猖狂一时，不知害死了多少无辜者）。

所以，罗广斌虽然曾为新中国的建立冒险坐牢，差点丢命，但解放后并未安排要职，反而“内部政治审查”有无叛变问题。

《红岩》的写作始于1956年，参加写作的有罗广斌和曾同坐牢的难友杨益言、刘德彬。此书初名《铜墙铁壁的世界》，后改名《红岩》。

这本书的写作，是在重庆市委及省级有关部门的领导下进行的，如当时的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市委组织部负责人肖泽宽等。

写作过程中，曾得到四川著名老作家沙汀和中共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马识途等热情指导。

此书的完成，还同当时的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朱语今、《红岩》一书责任编辑张羽的努力分不开。

对以上几点有必要花些笔墨。因为通过下面的叙述，就可了解罗广斌死于文革中的“前因”。任白戈、肖泽宽等在文革中成了“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马识途、沙汀则成了四川头几号“大黑帮”。罗广斌与这些人关系密切，自然难逃株连。

1958年11月，原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朱语今来重庆约稿。朱是肖泽宽的老熟人、老朋友，谈好组织罗广斌等人写《红岩》的事。

于是，朱语今一走，肖泽宽把重庆市公安局“罗广斌问题专案组”的人员和材料都调到市委组织部来，

很快对罗广斌的政治历史作出“没有问题”的结论。同时，调出重庆地下党活动的档案资料，批准假期，请来沙汀作老师，把罗广斌等人送到美协重庆分会、南泉公园安静环境搞“创作”。

据张羽说，中国青年出版社先后有七个人参加这项工作，曾三去重庆。

罗广斌在1966年写的“交待材料”中，谈到《红岩》写作过程：

“《红岩》的写作，是在1956年我们向市委书记处书面报告，并经批准后才开始的。组织上给了几个月时间，先让我们写了些材料。1958年，团中央、市委再次提出，要我们把它写成小说，因为我们当时都是组织部口管干部，所以市委以后主要是通过肖泽宽管这件事。”

“肖泽宽给我们传达了任白戈的指示，规定小说主题”，“肖告诉我们，根据沙汀的意见，叫我们到北京‘扩大眼界’”。“肖对我们说，你们到成都去找沙汀，市委委托他帮你们看一看。”

四川著名老作家沙汀，在写作技术方面给予许多指导。他在1961年8月花了九天时间，不辞辛苦地分章节进行润饰。

当时任中共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的马识途，对《红岩》的写作也出了不少力。《中国青年》1962年11期上，发表马识途的《且说红岩》，写道：“第一，我和《红岩》的作者比较熟悉，在他们写作的过程中，我曾经参加过几次讨论；第二，这书中人物所取的模特儿中有一些是我的同志和战友……”还说：“我是十分喜爱这本书的；甚至说，有偏爱，我从这本书开始酝酿直到修改定稿，出版，始终寄以关切之情。”马识途把罗广斌比作“母亲”，把自己比作“最关心这个孩子出世的”、“站在一旁傻笑”的“父亲”，说：“我的确对这个孩子的妈妈在孕育和临盆的过程中所经历的辛苦，有几分理解……这种辛苦，作母亲的是不愿说的，旁人还没有说过，因此也值得我说说。”

《红岩》一书，1962年出版后，很受中共中央宣传部重视，发行量极大。书中宣传了共产党人的坚贞不屈，在中美合作所监牢里的种种斗争，其政治性、文艺性、趣味性都很强。小说出版后，迅速被改编成电影、戏剧、舞蹈、歌曲等各种文艺样式，在中国大地广为传播。书中的正面人物江姐、许云峰、成岗等，反面人物徐鹏飞、毛人凤、猫头鹰等人，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可以说：《红岩》是新中国建立后，一部影响面最大、政治意义最强的小说。

《红岩》初稿发行时叫《烈火中永生》，作者有三位：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但刘德彬因为被有关部门认为有“历史问题”和是“漏网右派”，《红岩》



出书后，刘的名字便无影无踪了。

罗广斌曾为此向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反映。周扬指示：要“组织上对他们有个全面估计”。以后重庆市委就把刘德彬调到文联，让刘与罗、杨一起继续参加对《红岩》的修改、改编及其他创作活动。（文革结束后多年，刘德彬就自己未署名一事，仍多方上诉）。

《红岩》是建国后影响面最大、政治意义很强的小说，“文革”中却被批判为大毒草

1966年5月后，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毛泽东发动下，轰轰烈烈展开。毛泽东曾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四川在解放后创作出来的小说，在“文革”中无不受到批判。

《红岩》这本小说写得非常“革命化”，但仍在“文革”开始受批判，被指控为“是在原西南局、省、市委内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直接指导下，并得到旧中宣部大力支持，由叛徒罗广斌等一手炮制出来，以吹捧刘少奇的‘白区工作经验’为目的的大毒草”。

《红岩》受批判，除了是因为马识途、沙汀、任白戈、肖泽宽等“走资派”、“老黑帮”直接领导、帮助下写成，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被认为美化了刘少奇。美化刘少奇的“白区工作路线”，构成了《红岩》一大罪状。

批判仅至于此，罗广斌不一定死于文革，因为当时“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受批判者太多太多，罗广斌也许就算不了引人注目的人物了。但不幸，罗广斌后来不仅引人注目，而且成了重庆地区两大派系激烈斗争的焦点——他的惨死似乎就很难幸免了。

罗广斌参加了 “革命造反组织”

罗广斌是《红岩》作者，名声很大，文革初期受到批判，但许多人仍认为《红岩》是革命小说，是一本好书。这种情况下，有的红卫兵组织就来动员罗广斌参加其中。

于是罗广斌参加了重庆的“8.15派”组织，并且在其中担任一定职务。即然已经“造反”，卷入政治斗争漩涡，就只好拼命向前了。

1966年8月后诞生的“重大8.15战斗团”，是文革中重庆势力最为庞大的红卫兵组织，后来同许多工人、农民造反组织联合，夺了重庆市大权，建立“革联会”。

2月1日，罗广斌宣布退出“8.15派”，建立“联络站”，一些未分配到权力的组织反对“革联会”的“单方面夺权”，后来联合成立起“砸派”，成为堪与“8.15派”抗衡的重庆地区另一个大型派性山头。

1967年4月21日，“砸派”的“西师8.31”在北碚与“8.15派”大打出手，两大派对抗白热化。

重庆武斗，全国出名。两大派动用各种现代化武器，包括当时最先进的双管高射炮等援助越南的尖端武器。打毁一百多幢楼房，打沉无数江轮，死伤人数多得无法准确统计。

罗广斌从“8.15派”中分化杀了出来，参加创建“联络站”（重庆“砸派”前身之一）。后来“砸派”和“8.15派”成为生死冤家，为夺权打得你死我活，“8.15派”当然对罗广斌恨之入骨。

罗广斌被强行抓走关押

罗广斌受过良好教育，感情丰富，政治上也很敏感。自己从被批判的角色，变成不再挨整的“革命造反战士”，在风云变幻、正反人物常急剧变化的时代背景中，他惴惴不安，常有隐忧，深感前途险恶莫测。

“搞得好，我这次是大英雄；搞得不好，对不起，我是个大右派！”这是罗广斌在1966年底最初起来“造反”时，对文联干部所讲的话。

正因为如此，罗广斌深知“8.15派”对他虎视眈眈。当时两派之间搞绑架、暗杀是家常便饭。罗广斌不得已，活动时常用当年搞地下工作的形式。

罗广斌反对“8.15派”掌权的市“革联会”，引起许多人的仇视，攻击“罗广斌幕后操纵一些组织，制造分裂，破坏山城革命造反派大联合”。

很多造反组织起来“揭发”他，追究他的“历史”问题。

罗广斌及其亲密战友们，似乎感到孤立。同是《红岩》一书作者的杨益言、刘德彬，八方求援，找不到组织（包括罗广斌参加创建的“联络站”在内）声援他。有的发表声明：“我们和罗广斌没有关系。”有的检查上了当：“我们被罗广斌牵着鼻子走了。”连关系最好的某些人也只是说：“罗广斌的问题我们要调查，他可能是最红的，也可能是最黑的。”

罗广斌的处境非常危险，不敢再回家，东躲西藏。1967年2月3日，躲进文联一干部屋子里；4日，又躲进另一家，还请别人把门锁起来；5日，罗广斌取出存款，计划逃跑。

但是已来不及了。重庆“8.15派”，1月24日夺权建立了市“革联会”，势力正旺。他们对罗广斌胆敢“太岁头上动土”大为愤怒，决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2月5日，重庆建工学院“8.18”、西南农学院“8.26”、北航“红旗”和哈军工等组织杀进文联来了。罗广斌连忙把自己锁在一间小屋里，一声不吭，刘德彬等出面撒谎：“罗广斌出去了。”但从房门的锁眼里，“革命小将”看到里面躲得有人，于是踢开了门，把罗广斌抓走了。

杨益言、刘德彬不能在重庆救罗，只好搜集大量材料，先后跑到北京为罗广斌告状喊冤。

罗广斌之死

红卫兵把罗广斌强行抓走后，2月5日下午，罗被送到建工学院建筑物理教研室二楼看管，6日晚上转到242部队的八一楼三楼，由建院“8.18”和西农“8.26”红卫兵看管，先让他写“认罪材料”。

由于“一月夺权风暴”被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罗广斌反对重庆“革联会”，成为弥天大罪。罗广斌虽尽量镇静，但内心极度不安和惶恐可以理解。他不能预测这些无法无天的“小闯将”如何处置他。

2月8日，喇叭里广播了《罗广斌该抓》的广播

稿，这个广播稿“揭露”罗广斌是叛徒，提到好几个特务是如何供认“有意识释放罗广斌”的情节。

广播稿还说：“罗广斌这个大叛徒，是肖泽宽（重庆黑市委组织部长，三反分子）包庇下来的，文化大革命开展后，肖泽宽、李止舟、廖伯康被揪出，罗广斌一直惴惴不安，不知道他问题会在那一天被揭出。他之所以打着“造反”旗号跳出来，完全是挺而走险，孤注一掷……想利用他十七年编造出的‘越狱’情节和《红岩》的影响，企图在文化大革命中大捞一把，欺骗群众，进而把重庆市的党、政、财、文大权篡夺在手，为肖、李、廖翻案，伺机销毁自己叛徒身份的罪证。谁知山城革命群众识破了这个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把他看管起来，幻梦破灭了……”

这篇广播稿，对罗广斌打击太大。他深知动荡年头，是非难以说清。

罗广斌再也支持不住了，他勉强写他狱中生活和怎样出狱的交待，写写停停，一支烟接一支烟地抽，极端烦躁。几次想和看管的红卫兵交谈，但没有人理他，他只好闷着头抽烟。直到9日晚上，12点钟以后，罗广斌倒在床上，整夜翻来复去，睡不安宁。

第二天，1967年2月10日，罗广斌死了，死时年仅43岁。

他是怎么死的呢？事后关押者是这样讲的：

10日上午8时半左右，他在三楼卫生间小便和洗脸，一个姓张的同学（建院“8.18”红卫兵）在厕所外守候他。罗广斌把他的大衣、围巾、帽子，脱下来挂在厕所壁上，把钢笔、手表放在大衣袋里，然后爬上窗台。姓张的同学在门外守了约一两分钟，不见罗广斌出来，转身进门。一看，罗广斌已在窗台上弓身欲跳了。张急忙喊了声：“你要做啥子？”罗广斌假惺惺地吼了一句：“共产党万岁！”冲着三楼下的一块石阶跳下去，脑袋砸在石梯坎上，当即头破血流，脑浆四溅……

罗广斌是“自杀”的吗？

罗广斌是被“谋杀” 还是“自杀”？

罗广斌的夫人胡蜀兴，始终认为罗非“自杀”。她说，广斌被造反派抓走后，她一直不知道下落，在广斌死的前一天，有人送来一张广斌亲笔写的条子。条子上说，他一切还好，要她带钱和粮票去。看样子他是准备和造反派长期斗争下去的，哪里有一点自杀的迹象呢？……他在自必死的监狱里，还总是那么乐观和活跃，现在不过是造反派抓了他，他凭什么要自

杀？

事发后，胡蜀兴、杨益言、刘德彬等跑到北京告状，得到不少人支持，并在首都开追悼会。张羽（中国青年出版社《红岩》责任编辑）也以知情者身份，很悲痛地在会上发言。他讲得声泪俱下、慷慨激昂，令听者动容。

当时，围绕罗广斌是“自杀”还是“谋杀”的争论轰轰烈烈流传全国，成为国内影响重大的事件。谋杀论者认为，罗广斌在看管期间两次带出条子向家里要东西，这证明“罗广斌是准备和‘敌人’长期坚持斗争，丝毫没有死的念头。”

自杀论者认为，这两张条子说明了罗广斌被看管期间，一直是对他采取革命的人道主义待遇，既未刑讯逼供，又未开会斗争，生活上还对他作了照顾，三餐给他送去，晚上盖两条被子，时间自己安排。他想抽好烟，穿便鞋，就叫他写纸条给胡蜀兴送去，还派人去取这些东西。

话说得气壮如牛，当时又是一派掌权，故罗死于“自杀”似乎铁案如山。而胡蜀兴、杨益言等人鸣冤呐喊也就显得势单力薄了。

罗广斌之死成为两大派 斗争焦点——国民党为什么不杀罗

一位知名作家惨死了，但故事远没有结束。

罗广斌之死，成为当时重庆帮派组织之间的斗争焦点。“8.15派”竭力把已死的罗广斌搞臭，罗列种种罪状，证明其“死有应得”。而反对“8.15派”独掌市“革联会”大权的组织，则说“8.15派”残害革命干部，罗死得冤枉。

罗广斌亲属、战友及许多认为《红岩》是一本好书的人，自然也为罗之死奔走呼号。

围绕罗广斌历史上是不是“叛徒”这一核心问题，双方观点尖锐对立。只要证明罗并非“叛徒”，则“8.15派”权势将受到很大影响。双方围绕以下几个问题争论不休：

罗广斌在狱中是否享受特殊待遇？

对这个问题，徐远举（军统西南区区长、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红岩》中徐鹏飞原型）回答：“都一样，不特殊”。可是，另一个特务头子沈醉却说：“罗广斌先生从未受过拷打，一直是享受特殊的优厚待遇的。”

罗广斌文革前陪同内宾、外宾，参观渣滓洞作介绍时，曾说：

“渣滓洞楼一室，是特务的感训优待室。”罗广斌关在楼一室。

罗广斌后从渣滓洞转到白公馆。罗广斌解放后说：“渣滓洞犯人是士兵待遇，白公馆是尉官待遇。白公馆比渣滓洞更方便，书籍也很多，医药卫生条件也好些。白公馆逢年过节摆酒席，渣滓洞是没有的”。“白公馆里可以下围棋、象棋、吟诗、喝酒……”

罗广斌在狱中花了很多时间造飞机模型、制造地球仪打发时间。罗广斌也不曾受刑。

以上这些，都成为“叛徒”罪状之一。其实，稍有头脑的人都知道：任何朝代对犯人都有软硬两手。罗广斌家庭背景独特，狱中即使受“优待”，一点也不奇怪。以此定罪实属武断。

另一个重要问题：罗广斌是怎样出狱的？

1949年冬，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彻底灭亡的前夕，蒋介石亲自下令，把关在“中美合作所”的共产党员和其他人员全部杀害，于是就发生了凶残的“11.27”大屠杀。

原省主席王陵基供称：“1948年8月下旬，蒋介石和特务头子毛人凤来四川。有一天，四川‘特种会报’秘书长徐中齐（军统特务）向我汇报，说他接到毛人凤的电话要他去重庆开会。徐由重庆开会回到成都向我汇报，这次会上蒋介石叫他们把四川‘特种会报’所决定囚禁的共产党和民主人士，造全名册送去，我即嘱徐照办。”“那次把名册送去后，蒋介石指示全部枪决。”

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供称：“1949年9月间，蒋介石叫毛人凤把西南地区捕得的共产党员四十多名杀于电台岚垭。临解放前，更叫保密局把白公馆、渣滓洞两个看守所及新世界看守所三批人士一起杀掉。在执行这次大屠杀前，蒋介石指示毛人凤一个原则：在这个时候，对被捕的中共党员、民主人士和嫌疑犯都要杀掉，连原来保释出来的共产党员都要一样杀掉”。

事后统计：1949年“11.27大屠杀”中，渣滓洞杀死180人；白色公馆杀死27人。而此前于11月14日在电台岚垭刑场杀死江竹筠等30人；11月28日在大坪刑场杀死陈然等10人；11月29日在新世界临时拘留所杀死32人……

“8.15派”坚持认为：在这样一场有计划的疯狂屠杀中，参加共产党活动被捕，却又被特务头目从“活棺材”里释放出来，所以罗是“叛徒”。

但“北京地院东方红公社罗案调查组”却反对把罗广斌打成“叛徒”，因罗之释放事出有因。

第一、他们审讯徐远举为什么要释放罗广斌？徐回答：“第一是反动的人情关系，也可以说是官官相卫，若是我们不垮，我们以后还要一起共事，杀了他

（罗广文）兄弟不合人情，也不好交待，怕影响罗广文的反共情绪，怕刺激他起义……”

第二、徐远举的命令下面不一定执行了，理由是徐“下令释放的还有地下党员李承林、韩子重”，但这两个人都被杀了。

徐远举供认：“我和毛人凤的作法不同。（按：毛人凤的作法是用杀人来稳定西南局面），我是‘人质’的办法，主张用叛徒来瓦解共产党的组织，这样做政治影响比屠杀强。可以欺骗人民，作用比屠杀大得多。屠杀是下策，屠杀容易引起西南人民的反感（因为很多共产党员是西南子弟）。我原想控制这些人，只要军事形势稍有好转，我仍可以希望从这些‘人质’身上得到线索去破获中共地下党。”“对于罗广斌我想作为‘人质’，作为‘材料’，作为特务机关对军阀罗广文的控制手段。”

再看看沈醉的供认：“1949年，毛人凤还在我家里对我说过，他决定把刘国定这些叛徒留下来：第一，可以增加共产党的麻烦，使公安人员对这些人去花功夫，而对我们潜伏下来的人就放松了；第二，使共产党去杀他们，使他们的亲戚朋友对共产党不满；第三，把他们留下来，有机会可以利用他们，为我们做工作，如若不给我们工作，即可以压他，使共产党怀疑他们，这样，他们就可以怀念我们……他还说，委员长听了我的意见后连说三个好。”

由上述原国民党大特务的供词可以发现，释放罗是他们的政治斗争手段，以此说罗是“叛徒”，难以叫人心服。

有关“越狱突围”的争论

国民党不杀罗广斌，那是怎样放罗广斌的？“北地专案组”重点调查了这个问题。

徐远举供称：“罗广斌系1949年11月27日在中美所进行大屠杀，行刑之前我命令刽子手匪二处二科科长雷天元予以释放的。”“当天晚上唯恐靠不住，在重庆城内二处办公室与雷天元通了一个电话，问他屠杀情况，特别问他罗广斌放了没有？他说已经放了。当时有二处副处长杨元森和罗广文的第十五兵团部第二处处长林茂林在我身旁，他们都听见的，我即将这个情况叫告罗广文放心”。

为了调查罗文斌是怎样出狱的，两大派都花费大量力气，调查原国民党特务和相关人士，并查阅各种历史报章资料。

当时从白公馆牢房突围活下来的有罗广斌等19人，从渣滓洞突围活下来的有刘德彬等15人。解放军打到重庆，在磁器口、红岩村等地设立多处“脱险同

志联络站”。1949年11月27日白公馆大屠杀后，罗广斌等35位脱险者到联络站报到留名。

幸存者当时向各界披露了逃生经历。两大派红卫兵初步查了一下，有文字记载的就有七八种之多。

例一：特务杨钦典交出钥匙，用脚在楼上踏三下作为信号，我们采取突然行动，打开狱墙旁边小门，19人一道冲了出去。（这也是《红岩战报》和北地专案组的说法。）

例二：一位有良心的公役，把电话线切断，使白公馆和城里电话联络中断，留守在白公馆的特务首脑杨进兴及其僚属，以为人民解放军已进入市区，便仓惶逃去。留下十九人分五组夺门逃跑（罗文斌对《商务日报》记者谈话）。

“8.15派”声称：

“有几个共同点可以肯定下来的：第一、他们都是国民党准备放的人；第二、他们逃出‘活棺材’都是由于特务的协助……”于是，罗广斌等人难逃“叛徒”嫌疑。

其实，未列入杀掉名单而幸存者，有各种复杂的背景（见前面特务供词）岂能以此定“叛徒”罪？

解放后中共对罗广斌几次政治审查，“出狱问题”终有结论。

第一次审查，即刚解放时罗广斌到“脱险同志联络处”之后，肖泽宽提名他当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委员时，当时依什么为根据呢？据肖泽宽文革中说：上靠罗广斌自己写的材料和冉益志、骆安靖写的旁证。“当时的审查工作是比较粗糙的。”

第二次审查，从刚解放不久到1955年“肃清反革命分子”（肃反运动）后。解放初期中共重庆临时负责人陈锡联调离重庆时曾指出：罗广斌出狱可疑，应该审。到1955年肃反运动中，从组织部派了两个干部提审徐远举，徐供认“罗广斌是罗广文要他管教的，对罗广斌没有认真”。还讲：“我知道他是共产党员，就没有叫他写自白书。”并承认罗广斌的出狱是他放的。但并未发现罗广斌的“叛徒”实证。所以，这段期间罗虽被“内控审查”，但还是经常给少年作报告，编烈士遗诗，筹办中美合作所美蒋罪行展览和写回忆录、写小说等。

第三次审查，是中共有关方面很重视《红岩》的写作，必须尽快对罗的“历史问题”下明确结论。1959年，市委组织部长肖泽宽领导《红岩》的写作，故亲自任罗广斌问题专案组组长。专案组看了罗的大堆材料，在“宁左勿右”的时代，从十四个方面提出了疑问，并批驳了原组织部的审干结论，认为罗有问题。肖看后找负责专案的公安局副局长谈话，说罗广

斌在狱中表现“没有什么”、“没有出卖组织”。修改后的报告再交上去。某副局长说：“这一次，李唐彬（前重庆市委书记）看过报告说，出狱问题仍然是个问题。一句话，尽管罗广斌不曾叛变，但由于自己独特家庭背景而幸存下来，就有重要“历史问题”。这在当时被认为天经地义。

《红岩》出版之后，罗广斌声誉鹊起，成了有名作家。重庆有关方面，也感到在罗的“历史问题”中留个“尾巴”不妥，于是写了一份关于罗广斌情况的报告。罗广斌的出狱问题最终有了“结论”，即敌特有意释放，而罗等人是乘机逃脱。“结论”说：

“敌特既然是采取由他们自己去逃命的方式释放，并没有正面的说释放他们。而被释放的人自认为是乘机‘越狱逃跑’，这是可能的。但是罗广斌同志在交待这一问题时，有虚拟情节，夸大个人作用的情况。”

这结论应当说是比较正确客观的。

如果几年后不搞文革运动，罗广斌没有“思想包袱”，会干更多有益的事。但毛泽东发动了“文革”，连刘少奇这位堂堂国家主席都成了臭名昭卓的“大叛徒”，更何况罗广斌！

更不幸的是，罗又积极投入运动，参加筹建与“8.15派”作对的“联络站”，其结局难免悲哀了。

1976年，“四川帮”垮台，全国各地平反冤狱。不知何故，罗广斌问题未得结论。胡蜀兴和其他朋友不平，联名申诉，最终正式为罗平了反。

有关方面大概感到要否定“自杀”证据也不太足（文革混乱和事过境迁，许多问题确实难以理清），平反时含糊下了个“被迫害致死”的结论。

但马识途、胡蜀兴等，仍不相信“自杀”之说。马识途说：

只要找到执行抓捕他和看守他的几个人，总可以叫他们交待的，这样，罗广斌致死的全部过程就可以弄清楚，这一下不是就真象大白了吗？然而似乎没有这么作，或者作了没有得结果。

于是，罗广斌之死成了“千古之谜”。

但我以为：罗广斌死于给全中国老百姓带来灾难的“文革”运动中，他即使死于自杀，丝毫不能减轻某些导致其死的人的良心谴责，不能减轻我们对“文革”动乱的深深憎恶。

《红岩》热情讴歌共产党人为建立新中国洒热血舍性命的斗争精神。新中国诞生了，而刘少奇、贺龙、陶铸……到老舍、傅雷、罗广斌……许许多多共产党人却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这些，将给后人留下无穷尽的思考。

（责任编辑 吴 思）

从对垒到团聚

——忆逝于台湾的二舅罗文浩

● 何 标

1995年12月16日清晨，在台湾屏东市公车站候车室，我正准备提起旅行箱，登上开往高雄美浓的汽车。没想到二舅还是从家里步行数里赶来为我送行。我立刻趋前招呼，感谢他同舅妈在过去三、四天中对我的盛情接待，再次互道珍重后告别。汽车启动时，我从车窗望去，见他用手杖支撑着身躯向我挥手。谁知这竟然成了与舅舅永诀前的最后一瞥。

四个月后，二舅在台北病逝，消息传来我猛然一惊，不禁百感交集。半个世纪以来，发生在我们甥舅间的桩桩往事，一齐涌上心头。

“大兵舅舅”

二舅罗文浩，1911年出生于湖北省黄陂县罗家岗一个大家族中。他的祖父生有四子，他的伯父就是我的外公，他父亲排行第二，出身于山东讲武堂。曾在江西任武职。他与我母亲同为第三代，在家谱中属“文”字辈，我母亲叫罗文淑，比他大四岁。他在同辈的大排行中列第二位，仅次于我母亲。当年我母亲从湖北到北京时，还是他陪行的。可见他同我家关系的密切。

二舅成年后继承父业，考入黄埔军校第八期，毕业后曾任排、

连、营长，参加过抗日战争。1943年至1946年，在重庆“陆军大学”特七期学习。抗战前，他常来北京西单我家寓所，那时他还是个初级军官，穿一身灰布军服，戴布军帽，扎武装带，打绑腿，满脸晒得黝黑。我和弟弟都叫他“大兵舅舅”。

抗战爆发后，我们全家滞留于沦陷后的北平，二舅随军转战西南地区，从此同他失去联系。

分道扬镳

抗战末期，我离开日本占领下的北平，投奔晋察冀边区参加八路军。不久，又被派回敌占区，打入日伪“绥靖军清河军校”，从事瓦解敌伪军工作。1945年日本投降后，伪军校被国民党第十一战区“接收”，移驻保定，改编为“河北省保安部训练所”。1946年初，二舅从重庆来北平，任“河北省保安处”副处长兼“保安干部训练所”教育长，后又任“北平警备司令部”参谋处长。我们甥舅俩虽再度重逢，但这时彼此的思想信仰和政治立场，已是貌合神离分道扬镳了。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夺取胜利果实，消灭解放区，正准备发动大规模内战。二舅做为从重庆“飞

来”的黄埔系中、高级军官，仕途正春风得意。他从母亲处得知我上学时读过进步书刊，一度离家出走，回来后又突然报考伪军校，就对我的政治身份发生怀疑。1946年5月，他把我从保定叫到北平，在西单教育部街“河北省保安处”办公室，他军装整齐、满面严肃地坐在一张大办公桌后，背面上挂了一幅军用地图。简单的开场白之后，他开门见山地同我对话：

问：听说你曾离家出走，到哪里去了？

答：日伪学校的书我读不下去了，就和同学到井径煤矿做事（实际是到晋察冀边区参军）。

问：那你为什么要报考伪清河军校？

答：我从小受您影响，喜欢当兵打仗。

他见我如此回答，就沉下脸来说：“那好，我可以送你到重庆去进机械化军事学院。”接着就对我训起话来，说青年人现在有四大问题：思想问题、升学问题、职业问题、婚姻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思想问题。对他讲的那些我根本无心去听，暗中盘算：我的政治面目已经受怀疑；最近的“保安干部训练所”在我们的地下工作者的煽动下，闹得人心涣散，不少人都开了小差。二舅这位刚上任的“教育

长”，必定要严加整肃，看来我是呆不下去了。

二舅训完话，见我没有什么反映，就叫我回保定去了。

兵戎相对

回到保定后，我向解放区来的秘密联络员说明了自己的处境，提出原打入伪军校的意图，因日本投降和军校性质改变，已无法贯彻；由于政治面目遭到怀疑，也难以再坚持下去。联络员同意我相机撤出，回到解放区去。于是我就通过母亲，以准备考大学为藉口，请二舅带我离开保定。于是在1946年8月10日，由二舅带我由保定坐火车回到了北平。从此我就同二舅分手，各自走上兵戎相对的战场。

回到北平不久，我经昌平城郊进入解放区，到达张家口，找到所属的部队。以后随军转战华北战场，参加了1947年10月的清风店战役和解放石家庄战役。二舅在1948年石家庄解放后，离开保定，被调到国民党军华东前线，任“徐州剿总参谋处长”和“副参谋长”。这时，人民解放战争已进入战略决战阶段。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打响，仅65天就全歼了国民党的精锐部队，解放了长江以北地区。二舅未等战役结束，就以“国防部少将部员”名义跑到上海。

1949年8月，我奉命南下，也调到解放后的上海。紧接着参加了解放舟山和沿海岛屿的作战，那时二舅已随国民党军撤往台湾。

二舅去台后曾任“陆总第三处处长”、“预备师师长”、“台北警备区司令”及“革命实践学院中将副教育长”等职。据说他是蒋介石黄埔系的人，同另有自己派系的蒋经国关系不睦。

从1946年8月二舅在“保安处”那次对我的“训话”到1949年8月我被调到上海，仅只过去三

年整，中国大陆就发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二舅根本不可能想到的；胜利来得如此之快，也是出乎我意料的。

鸿雁传书

日月如梭，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二舅以中将军阶从国民党军退役，不久我也在北京离职休养。彼此隔海而居，音信杳然。1990年底，听说二舅夫妇要到美国旅行，于是就写了封信，通过在美亲人转交给他。信文如下：

浩舅台鉴：

记得1946年夏，与您同乘火车自保定返平后，一别四十五年矣！那时您方值卅五英年，我仅弱冠，算来不久您将届八十华诞，我也要花甲迈向古稀。白驹过隙，物转星移，而童年在家门送别“大兵舅舅”景象记忆犹新；保定之困曾蒙庇助，常不胜铭感。

前读您家族记事手书，得知身边存有寿石公（原名寿石工，浙江绍兴人，著名金石篆刻家——笔者注）刊刻之石印两方，偶出把玩，北望云天，低徊不已！忆旧深情溢

于字里行间。寿石公早于1950年病逝，夫人宋君方女士为名国画家，是我母亲至友，1987年初曾作画贺我母80寿辰，旋即西归；寿公高徒，我今异姓文，亦于同年病故，留有赠我母百寿字一幅。手书中提及的罗氏在世诸亲人，想均已通音息，毋需赘述。睽违甚久，先行奉函致候，敬祈安康并祝合家欢乐。

甥正上 庚午岁末

听说二舅看到这封信后非常高兴，立即提笔给我写了回信请人代发。遗憾的是这封回信我却未曾收到。

屏东相会

1995年11月底，我应台北“中国文哲研究所”之邀，赴台参加为纪念家父逝世40周年而举办的“张我军学术研讨会”。二舅闻讯后，兴致勃勃地拟从屏东赶赴台北，后经医生劝告而作罢。在电话中，欢迎我于研讨会结束即赴屏东相聚。在分别半个世纪之后，我们甥舅终于再度见面。八五高龄的二舅，头脑清晰，精神抖擞，行动正



在台湾相逢留影的舅甥二人

常。女儿已出嫁，二老养了只小狗，以聊慰孤寂。他住在屏东市“眷区”一座日式小花园房里，已年久失修显得十分陈旧，房间既狭小又杂乱，出乎我的意料。

二舅夫妇对我的到来，做了细心安排。到达次日，就租车带我沿一号公路南下，去台岛南端的垦丁森林游乐区，饱览猫鼻头、鹅銮鼻和佳乐水等名胜风光。返程时，特意到恒春万銮海湾饭店品尝当地著名的煮猪肘及野菜。第二天，由表妹驾车来接，沿三号公路北上，到高雄县旗山镇花旗动物园和三桃山森林公园参观。中午在美浓镇富有特色的“真好味”饭店用餐，然后乘车到甲仙镇北16公里左右的“锡安山”游览。接连两整天的“下海上山”，对于高龄老人是不堪重负的。第三天，我坚持要自己游

广告

览市区，请二老休息。晚上，在二舅家最后欢聚，二舅兴致很好，说准备治好病就出国旅游，要赴美为我母的九十大寿祝贺。

对于这次的相聚，二舅在给我二弟的手书中写道：

正甥（笔者原名张光正）南来，欢聚三日，近半世纪之别能消阻隔，诒获中华文化光辉照射之益，也予舅甥得畅谈数十年之积愆。

先父张我军是20年代台湾新文学运动之先驱，曾率先把大陆“五四”运动新文化、新思想介绍到日本割据下的台湾，并坚持主张“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支流”。二舅手书中提到“诒获中华文化光辉照射之益”，就是指此而言。

接着，他又写道：

世局多变，此间乱象已见，幸舅人生漫步距旅行终点渐近，世事已早淡出，无求之下，曾语光正：‘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只求保持相当之健康，愉悦之心情，淹没于不息的时间中。

年来，由于台主政者之过，祸延两岸关系迭荡低迷，岛内乱象丛生；二舅一生又宦海沉浮，在垂暮之年，只力求自保，亦理所当然。因此，往昔对我之政治歧见，即所谓“积愆”，自然已趋消蚀淡化。然而，半个世纪以来跨越两岸，与我的舅甥亲情，却历经寒暑，始终如一。

我遥望南天，抚今追昔，忆述于上，以寄哀思，并衷心祝罗文浩二舅在天之灵安息！

（责任编辑 洛松）

治癫名医——王文生

在太原火车站背后，有一家规模不大，名声却不小的医院——太原癫痫病医院。这所医院的创建者，就是名闻三晋的癫痫病名医——王文生。1993年6月22日，山西省卫生厅、省科委、太原市卫生局邀请天津中医学院及省内著名专家，对王文生研制的科研成果“愈痫再春丹”Ⅰ号和Ⅱ号进行了鉴定。鉴定书上这样写道：“本研究提出癫痫病的初发期以豁痰开窍、化痰熄风、养血止痉、清肝泻火为主；后期以醒脑平肝、镇静安神、补益心脾、滋补肝肾为主要治则，达到同类病科研先进水平。”几年来，王文生用中药配制的“愈痫再春丹”先后治愈了数万名病人。

癫痫病俗称抽风病，被称为世界四大顽症之一。中医提供的治疗方法很多，但效果都不太理想，所以不少患者只好服用西药，不仅副作用大，且疗效甚微。为了攻克癫痫病，王文生决心研制出一种疗效既佳，又无副作用的中成药来。他开始翻阅《内经》、《金匱药略》等古籍，着重研读其中论述病症的部分。他认为：虽然病症的临床表现甚为复杂，但其病因不外乎风、火、痰、虚四方面。病势初期往往以痰邪、肝风为主，病情发作后期才表现出正气亏损、肝肾阴虚，所以病症的实质仍为心血亏损，脾肾虚弱导致正气不足而致。

在炮制成药的过程中，王文生用新法炮制，甚至冒着中毒的危险，亲自品药，确认药性。寒来暑往，王文生经过一次次试验之后，终于研制成了癫痫良药——愈痫再春丹。据几年来临床观察，此药疗效十分显著，为此《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各大报刊都报道过他的医疗事迹。目前，愈痫再春丹已在省内、国内、国际上荣获多次药品评比大奖、金奖，并已喜获国家专利，该药将投入大批量生产，造福更多的癫痫病患者。（为方便外地患者就诊，该院可邮购科研成果“愈痫再春丹”，星期天、节假日照常应诊，欢迎各地联办分院。）

太原癫痫病医院地址：太原市双塔北路63号（太原火车站背后）邮编：030013

电话：(0351) 4372527 9003088（手机）

北京分院地址：北京市复兴门外永定路东街3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专科专病治疗中心

电话：010—68224642 联系人李培英

本刊启事

为了方便读者，凡延误订阅或在当地邮局订阅不便者，可直接向本刊发行部邮购，每期定价4.80元。补购或预订季度、半年、全年均可。

本刊现仅有1997年合订本（精装每套54元，简装每套49元）及少量1996年合订本（精装每套52元，简装每套49元）。创刊至1995年历年合订本早已告罄，欲补单刊者，请来函说明所缺期号，若有存书当即寄去。以上均免收邮费。

另，本刊自1994年—1997年每年出学术增刊——《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一册，1至4期均有存书，每册包括邮费9元。

本刊地址：北京东城区雍和宫大街戏楼胡同1号

邮政编码：100007

电话：6407.2425 或 6403.1144 转 2004

明末党社与清朝文字狱

——明清超集权主义的流变及历史影响

李一蠡

明朝晚季,出现了大量主要由在野的士子们包括退职归家的士大夫组成的文人社团。他们宰牲而盟,砥砺期许,用着讲学论道和以文会友的名义,聚会流连,纵情谈论,而却越来越多的离开谈文论诗,居然大胆地指摘时政得失,评品在朝官吏,提出自己的思想政治主张,争取社会特别是知识社会的支持,颇带有一些在野政党色彩。当然,他们的组织松散,完全不具近现代政党形式。但言辞之大胆激烈,论点之新颖显明,对社会舆论影响之大,乃至对朝廷内部和广大官僚阶层政治斗争卷入之深,足称历史空前。一时这类学院、文社、诗社之多达到前所未有的,就中最有代表性的社团是东林书院和复社(东林“党”之名,是东林人士在朝廷中的对立面魏忠贤一派所加予的,因为一沾“党”字,便成罪名)。

东林书院在无锡、始建于宋。明万历时吏部郎中顾宪成以直言敢谏被革职赋闲,便重修院舍,与同样原因被削籍回乡的左都御史高攀龙等在此讲学。书院有一副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语句里生动标明着讲学人心迹和办学宗旨。学院很

快名声远播,吸引了大量学子特别是年轻生员。东林人士遭镇压时,被正式列入“东林党人榜”黑名单的有309人,而阮大铖“东林点将录”则择主要人物列为108将。有“小东林”之称的复社则成立于崇祯初年,是若干文人社团的联盟。原来,自嘉靖以后,“白下(南京别名)青溪(浙江别名)间文人结社风行”(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崇祯时大江南北文社已不下数十。江苏太仓庶吉士张薄倡议文社大联合,吴应箕、黄宗羲、顾炎武、陈子龙、方以智等积极响应,以“兴复古学”为号召举行社盟,取名复社,(和欧洲文艺复兴以标榜复兴古典文化而开始其运动何其相似!)入社人数共达2025人。在苏州虎丘举行集会时,轻舟画舫相连,观者如堵,颇具声势。而与东晋时著名文人的兰亭集会不大相同的是,兰亭是为“修楔”(采兰歌咏求吉驱邪),而虎丘之会则是以评论国是为主题,政治色彩极浓。复社的活动一直延续到清初,其中不少人的思想言论对后世影响很大。对于明末中国封建士子群这种活动,著名明清史家谢国桢先生称之为“党社运动”,这名称新颖而贴切。

为什么明末会出现这种在封建

社会中非比寻常的集会结社思想活跃的风气?

对超高度集中的皇权的反动

从政治上看,这是对业已腐朽没落、弊病丛生、有悖历史潮流的超高度集中的皇权的一次反动。

中国封建社会历来实行以帝王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明太祖朱元璋得天下后,从帝业得失角度总结前代经验教训,认为前代王朝之所以到头来都不免失位亡国,未能做到“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史记》秦始皇语),主要原因在于帝权集中得还不够。他指摘前朝之“大弊”在于“人君不能躬览庶政,故大臣得以专权自恣。”(《明太祖实录》)他夙兴夜寐,反复思虑,觉得要朱王朝的基业永远保持在他的子孙手中,必须把过去的政治结构作一定变更,即削弱重臣之权,进一步高度集权于皇帝。立国伊始,他本来也依前朝惯例,设立了丞相和作为行政中枢的中书省,但由于有着君与相之间名分职权的传统规约,朱元璋觉得那一套碍手掣肘,并孕育着皇权旁落的危险。于是他在立国一个时期后,断

然废除了自秦汉以来一直存在的丞相一职和魏晋以来所设立的中书省，由皇帝亲自统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使君权相权统于一身，另设六科以稽查六部政事。把大学士由三品降为五品，成为仅具秘书职能而无实权的写作班子，称内阁。又废大都督府，分设五军都督府，各军不相统属，直接由皇帝指挥。总之，小权分散而相牵制，大权独揽而无制约，是朱元璋“革政”之要旨。他分封他的诸多儿孙为藩王，分别屏镇监视一方。他还专设前所未有的特务机关锦衣卫，授予侦察缉捕刑狱等特权，由他的亲信掌握，是臣民谈之色变的御用恐怖组织（他的后代们又陆续加设东西二厂，属同类机构）。如所周知，这一把权力向皇帝超高度集中的过程，是通过对一长串开国文武功臣的公开杀戮、暗杀或逼之自杀的残酷手段来实现的，曾与朱元璋共同浴血战斗、功勋卓著的重臣，立国后大多未得善终。明初做过丞相的四个人李善长、徐达、汪广洋、胡惟庸都被杀或被迫自杀。光是以“植党”罪遭追究的右丞相胡惟庸“党案”，和以“谋反”罪论死的大将军蓝玉“党案”，两案就株连处死官员五万多人，朝野一片风声鹤唳。

“植党”，在世界近现代政治司空见惯，中国百年来也出现了政党。但在尚无政党政治的中国古代，是指朝野一些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者有意无意形成的小团体。这本是政治斗争特别是历朝统治阶层内部斗争中无可避免的现象，但又恰恰是封建帝王所深忌而绝不允许的，当然更为一心要掌握亘古最大独裁权的朱元璋所不容。朱元璋还不许民间特别是在学的生员议论朝政，明朝从国子监到每个府州县学都有一块“卧碑”，上面刻着若干禁例，其中重要一条就是“军国政事不许建言”。洪武9年，山西平遥有个叫叶伯巨的县学训导（管生员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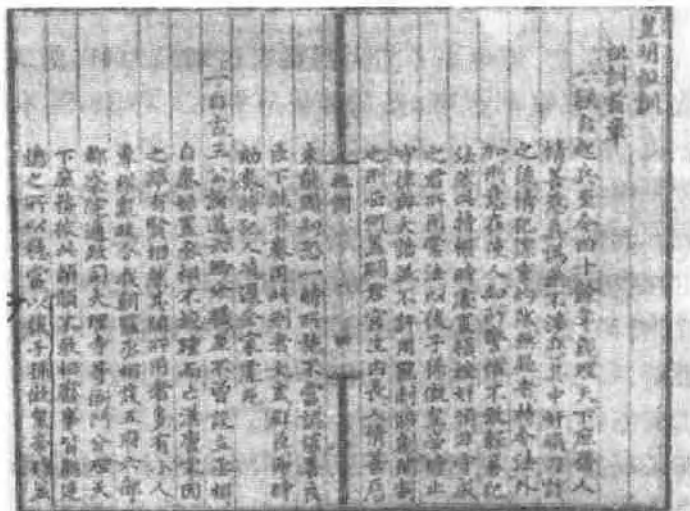
教育的副职小官）偏偏敢“冒炮”，竟给朱元璋上书，指出“当今之事太过者三：分封太多，用刑太繁，求治太急。”朱元璋览书大怒，降谕道：“速速来，吾手射之！”这个微不足道的小官被逮来之后，皇帝倒是没亲手射死他，而是关进牢中不问不放，致令活活“瘐死”。更绝的是，朱元璋连他亲姐姐的儿子、一向忠心耿耿的外甥兼养子李文忠劝他“少诛杀”的进谏也不能稍容。李文忠12岁丧母，由朱元璋抚养并随他改姓朱，是征南逐北的开国名将，为人好学，爱跟文人交往，时任大都督兼国子监事。朱元璋认为李的进谏是受了文人影响，便先把与李接近过的文人统统杀掉，又派医生给李治病把李毒死，然后杀掉医生。多疑嗜杀是朱元璋的顽症，恰恰又是他最怕指摘心病，是即使最亲近的人也“老虎屁股戳不得”的。

朱元璋还唯恐他的一套家法传之不永，除了颁布严于历代的《大明律》外，还补充以《大诰》、《皇明祖训》。所谓《大诰》，即凡他的话、批示及处理过的案例，皆成律外之法，一切官民人等，户户要有一本，以便诵读。《祖训》则是对后代君臣的交代，除刊印外，还铸在铁牌上，立在皇宫门口。其中废丞相一事是这样写的：“以后子孙做皇帝时，一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皇明祖训，首章》）

历史偏偏令至今睡在明孝陵中的朱元璋大失所望：他以如此的手段削臣权、禁言路，维持超高度君主独裁，却意外地使得他的后代很出了几个堪称糊涂懦弱懈惰腐败之最的皇帝。这些“之最”的首要表现是：本来朱元璋在宫门铁牌上谆谆告诫子孙：“内臣不得干预政事”，乃至为了不让宦官有干政的本领还规定不许他们读书，而有明一代宦官干政乱政的事偏偏比哪个朝代都多，都严重。说来也不奇怪，皇帝也

是凡人，并无三头六臂，要亲自管规定中的那么多的事哪儿管得过来？朱元璋作为开国皇帝，受过苦难，为万世子孙他可以自甘日夜操劳；他也确实在非凡的干劲之下做出了大量如惩贪之类业绩，足堪史书称道。但硬要生于宫苑、凭血统得享至尊之位的子孙们也效法他，岂不难为了那帮金枝玉叶？于是，到永乐帝朱棣（他还不算是个糊涂皇帝）就开始违背《祖训》，让太监率军巡边，开了明朝太监可掌军权之先河。到朱棣儿子、宣德皇帝朱瞻基即位，又违例让一些年轻太监在内书房读书，而且从中挑选秉笔太监，替皇帝批行大部分文书。从而又衍生明朝一种独特办事制度，叫“票拟”，即内阁学士替皇帝拟好文稿，写在票签上送入宫内，再由秉笔太监按皇上意旨用红笔批复。从此皇上省却繁劳，而内官与外廷开始交结，埋下了宦官干政乱政的种子。盖集权过多，必力有不逮，从身边人中寻找作为行使权力中介的“联络员”就成为必须，宦官之类弄权也就无可避免。所以有史家说，明亡之因，首在阉竖祸国，而阉竖之祸实源于不许内臣干政的朱元璋自身！这话深含讽刺，却又一语中的。

明朝弄权乱政的宦官名单可开列一长串，就中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被称为明朝四大权阉。他们多是内结后妃，外结权臣，把持特务机关，党羽遍天下，制造了无数冤狱血案的元凶祸首。王振竟把明太祖立在南京皇宫门口、镌有宦官不得干预政事等话语的《祖训》铁牌摘除（当然这至少得到了皇帝默许甚或授意）。宦官干政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到刘瑾、魏忠贤，竟受宠到朝中“大小事得以自专”，权力超过百官，简直取代了皇上。魏忠贤还被特赐“顾命元臣”金印，以太监身份而被群呼“九千岁”，地方官为取媚他，争相为他“立生祠”（为活人立祠堂颂德祈福）。一时顺昌逆亡，被迫害致



死者不可胜计，千古阍祸莫此为甚！

宦官擅了政，于是有了无所事事只爱击球走马秘密出宫冶游的皇帝(正德)；有了笃信道士敬事奇醜而“仁静”但求长生的皇帝(嘉靖)；有了25年享乐深宫不临朝不见群臣的皇帝(万历)。这是由皇权过度集中而生的惰力，是由主子向其亲信手里转移权力而畸变了的专制政治。士大夫们为纠正政风，保持中国官僚政治传统，起而斗争。东林、复社便是与这种畸型皇权政治斗争最力的文人团体。

对抑商政策的反动

从经济上看，这是对束缚新生生产力的抑末贱商政策的反动。

明朝立国，变本加厉地实行重本抑末政策，规定商贱于农，商人及其子弟不得参加科举进入仕途，甚至不许穿着丝绸及使用金银器皿(农家只要有一人兼营商业也援用这项规定)。朱元璋视富商为他这个变了质的农民政权的威胁，江南大富商沈万三曾资助朱元璋建南京城，未能讨好，反因露富致祸被杀并籍没家产。明建朝不久就迁江南富户14万到凤阳，其后又两次迁天下富户到南京附近，以削其势力，便于控制。他这一手是从秦始皇那里学来的。秦统一六国后，就曾“徙天下豪富十二万户于咸阳”，使之“富离其基，人夺其势。”(见《史记》)有论者认为明初大举迁徙富户有抑制地方豪强、打击封建势力的意义，恐怕有点溢美。朱元璋得国后就分封皇室勋戚大臣内监以“官田”(又叫庄田)，亲王千顷，勋戚以下百顷，树立了一大批新的封建剥削者。他迁天下富户之举不过是王朝继替后经济政治权力的必然再分配。而当时被打击的富户中，江南富户占80%以上。江南自然条件得天独厚，魏晋以后人民逐渐由中原向东南转移，到隋唐，江南不但成为中国粮仓，民

间工商业也得到了发展。这种“地缘经济现象”是不以人意为转移的。到明初，长江三角洲已是农工商各业首善之区，不少士绅即兼经商。朱元璋打击江南富户，实含有抑商成份。同时，明朝还实行禁海、禁榷，商民不许出海贸易，不许经营盐、铁、酒、茶、棉、帛等生活必需品和铜、锡、硝、硫磺等可用于军事的物品，实行官方垄断。还规定商人经商要持有官府验发的商引，无商引以流民治罪。

尽管如此抑商，但14世纪前后，中国农业文明的发展已达盛期，产品有剩余自然要进入流通，民间

工商业是抑也抑不住的。正是在重重禁錮之下才显现了民间工商业内在生命力之顽强。特别是在东南沿海和长江、运河沿岸，一系列新市镇雨后春笋般悄然出现。据有绸都之称的苏南盛泽镇镇志记载，明初盛泽只不过是个五六十户的小村，到明末已成为一个以批发丝绸为主的五、六万人口的大镇，四方丝商麇集，誉称“衣被天下”。那时，江南以这样速度和规模出现的市镇埠头相望。不少史家认为，从十四五世纪起，几乎与西欧同步，中国以长江中下游为中心的广大地域，已进入“资本主义萌芽期”或“胚胎期”。

但与这新的萌芽、胚胎氤氲化育同时,朱明朝廷却病势沉沉。皇家及其越来越大的官僚机构糜费日甚一日,天灾人祸频仍,到正德、嘉靖时,国库已屡屡告空。衰落中的王朝为龟缩自保,还不得不重修事实证明起不了多大防御作用的长城。囊空费乏,变本加厉榨吸民膏是唯一应急之方。于是加派各种名堂的“镇守太监”,举凡扩大皇庄,提督江南织造和两淮盐政,以及矿监、税使、采办、监军……重任肥差都由宦官出任。有如放蜂一般四出的太监们一旨在手,除为主子完成使命外,还借机自肥,勒索不遗余力。江南更是重点目标,苛捐杂税高于全国数倍。万历时人谢肇淛称之为“兽尽于山鱼穷于泽”的“弥天之网”(《五杂俎》)。词曲作家王磐,曾有一首借咏喇叭来讽刺那些靠服事谄媚主子而高踞人上鱼肉百姓的宦官们的小曲《朝天子》,活画出以吹喇叭、抬轿子荣升之辈的嘴脸和恶行——

喇叭,喇叭,
身儿小,腔儿大;
官船来往乱如麻,
全仗你抬声价。
军听了军愁,
民听了民怕,
那里去辨甚么真共假?
眼见得吹翻了这家,
吹伤了那家,
只吹得水尽鹅飞罢!

(路工编《明代歌曲选》)

东林复社人士抨击了这种杀鸡取卵的经济政策,为民间商业生存发展之权鼓呼,黄宗羲更直接针对重本抑末的国策,公开提出“工商皆本”的观点。

捱到天启末、崇祯初,作为全国收入主要支撑点的江南经济开始陷入停滞,“纷纭攘夺,百方剥扰,匠艺为之失业,商货为之不通,民生憔悴……”“借名加派,非分要求,织造之家,十空其九。”(陈子龙《明经世文

编》)江南市民抗捐抗税的斗争此伏彼起,继苏州机户群起杀死织造宦官之后,景德镇瓷工万人又杀死矿监,史称“江南民变”,这是中国市民阶层首次登台斗争。这一斗争,与农民暴动、满族启衅、宫廷内斗等一起,终于酿成明末最严重的全面危机。

那么便不难明白,为什么明末党社运动主要集中在民间工商业辐辏之地的江南;东林书院在无锡,复社则多次聚会于南京、苏州等地。也就不难明白,当朝廷派厂卫人员到苏州逮捕东林人士周顺昌时,市民万人上街,为保护周而与官兵格斗,打死校尉一人。市民五人牺牲,群众隆重葬之于虎丘,称之“五义士”;杨涟被捕时,都城民众拥道焚香呼喊,为他壮行;黄尊宪被捕时,市民们凿沉锦衣卫的官船,企图把黄夺回。这生动表现了初生的市民阶层与党社的关系。

对官方意识形态 程朱理学的反动

从思想文化上看,党社运动又是对当时统治层意识形态程朱理学的反动。

明太祖朱元璋没读过多少书,但很聪明,是中国历史上有数的大权谋家之一。他认识到,大讲“存天理灭人欲”、维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纲常的程朱理学,是实行皇权统治的有力思想武器,应加以提倡维护。故仿元朝旧制定科举法,严格规定应试文必须以四书的文句出题,释义必须以朱熹《四书集注》为准。然而由于《孟子》中有民贵君轻这类话,朱元璋甚恼,说:“这老头要是活到今天,非严办不可!”于是命删《孟子》中85处这类文字,并颁行这本被肢解的《孟子节文》。(转引自吴晗《朱元璋传》,近读红旗出版社《毛泽东评点古今人物》,内说,毛读《朱元璋传》后,曾找吴晗

谈:“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应该肯定的,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并要吴学学历史唯物主义。但朱做皇帝后连民贵君轻这类话都大为反感了,他还有资格代表农民吗?!)更直接的思想灌输则是规定学子们必须学习以朱元璋言语批文所制的《大诰》,并以此出试题。通过对应试范文的提倡,形成一种统一文章规范——八股文。书坊争相刊刻这类样板文,叫时文,供学子们熟读模仿。从明初到清末五百多年,实行的就是这种“应试教育”!明太祖还诏告天下向朝廷举荐贤才,标准是“贤良方正孝悌力田”;而如果敢有“囊中士夫不为君用”,则视为对抗朝廷,要论死并籍没家产。(见《大诰》)他还兴起几场文字狱,并两次以流血手段镇压为反抗严酷的国子监监规而闹起的学潮(见《吴晗《朱元璋的统治术》)。对知识阶层,他很会用恩威并施的两手策略。

这种思想文化专制的结果却是,除制造了众多昏庸的君王和作威作福的宦官,制造了众多唯唯诺诺、瞒上欺下的臣僚外,还制造了众多“终日袖手谈心性”而碌碌无为的书蠹式文人。而这一切,又制造了一个弊象丛生的腐败社会。这不能不促使人们特别是知识阶层进行内省和反思。到明朝后期,突破这种僵化的文化专制体制,就成为了一种必然的历史要求。

万历以后,有三桩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有必要在这里稍作铺垫:

一是王守仁(王阳明)对程朱理学的批判。王提出“致良知”,认为人人都可有良知,而“良知便是你自家的准则,便是你的明师”。“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依此良知,忍耐做去,不管人非笑,不管人毁谤,不管人荣辱……我只是这致良知的主宰”(《王文成全书》)。这就否定了朱熹的“未有天地之先”就有“理”,这“天理”“张之为三纲,纪之为五常”,三纲五常即

天理,圣人之言即天理(《朱子语类》)之说,而强调了人是良知的主体。尽管王守仁的认识中有唯心色彩,王学中毕竟朦胧地包含了张扬人性、尊重个人的人文主义成份。后来王学分化,一些学者包括东林、复社不少人士进一步发展了王学的积极方面。

一是万历时张居正改革的失败。这场改革总的来说对发展生产、减少财政亏空、整顿吏治、巩固政权有利,但因“利于编氓(老百姓)而不利士大夫”(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语),而不断遭到非议和攻击。特别是张居正位高权重时曾荐引了一批官吏,张死后被对立面指为“党附”。这两字是最让皇帝疑忌警惕的。于是张居正被夺谥抄家,改革被废止。人们一度寄予的“中兴”希望从而幻灭。

再一是李贽事件。李贽出身世代商人之家,曾任南京国子监博士和中级官吏,晚年著书讲学。他接受王守仁影响,但比王走得更远,他推崇张居正,为张“身后之辱”鸣不平。他反对“依仿陈言,规迹往事,不敢出半步”的传统世风,提倡事功求利,公然为理学家所贬斥的“私利”申辩,认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公开说:“我爱钱,我爱富贵。”他质疑贱商政策:“商贾亦何鄙之有?”而嘲笑程朱欺世盗名,空谈无补,“不可以治天下国家”。他曾三次访问第一个来华传教的西人利玛窦,从之较详尽地了解了外部世界的宽广博大,和自有其优长之处的当时西方文明,而深深慨叹所谓“天朝中国乃天下之中”的一贯自大是“所见者小也”!(以上俱见《焚书》)这些思想言论,使他在各地奔走讲学中“所至倾动”,却为统治阶层所难容。不少权贵交相弹劾他“背弃孔孟,非毁程朱”,“狂诞悖戾,惑世诬民”。他终于被万历皇帝亲自下谕逮捕入狱。然而,除了著书讲学、坚持独立思考之外,找不出他



黄宗羲像

什么真正罪名,却又虑及影响,决不能释放。就在有司刺着心眼给他设罪时,这位76岁老人竟不甘受辱,在狱中寂然自裁。

这些等等,激起了义愤,引发深思。思想禁锢与反禁锢,维持现状与改变现实,成了社会关注和思想斗争的焦点。党社运动的兴起,言路的被冲开,就在这样背景下出现了。老一代(东林人士等)以血铺路,新一代(复社人士等)继之奋起。他们一扫弥漫甚久早已过时的思想迷雾,倡导经世致用挽救社会的新鲜理论。复社活动时期,正值崇祯初年,内患外乱交加,魏忠贤阉党倒台,皇帝有心收拢人心,于是暂时出现了稍宽松的空间。但是复社人士的成熟则是在南明时期。黄宗羲(东林被害“六君子”之一黄尊素长子)首先呼出惊世骇俗之语:“天下为主,君为客”,一个人应该是“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他甚至勇敢地揭示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一语道破当时社会朽败的根源在于帝制。“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他设想了一个无君因而也就没有为维护君主而设立的一整套架在人民身上的寄生性机构的社会,人民该可何等自由地为自己谋利益。他针对孔孟程朱所宣扬的人治

思想,指出“论者谓有治人无治法,吾以谓有治法而后有治人”。因此他说应区分“天下之法”和“一家之法”,指后者是“非法之法”,强调旧法必须变革。他说:“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而主张“是非决于学校”(以上见《明夷待访录》)。那时他还设计不出议会政治,只要求学校师生即知识层有议决国是之权。这是对东林、复社议政活动的肯定,并期望它光大之,成为国家制度。这想法虽略显天真,但与现代议会民主却已有些相似。须知当时——17世纪只有英国刚有近现代议会,整个欧洲大陆仍在君主专制的黑光之下!复社另一位中坚顾炎武,则提出“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是易姓改朝,亡天下是社会沉沦生民涂炭,所以“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鲜明地道出人民是天下主人,应该“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他的政治设计是“许庶人之议”——保障人民言论自由,和“存清议于乡里”——在基层设言论机构。(见《日知录》)这与儒家民本思想已大相径庭,而含有近代自由民主理念。而作为复社一个支系的匡社成员王夫之,则认为皇位“可禅、可继、可革”,主张建立“以法相裁,以义相制,以廉相帅,自天子始而天下咸受裁焉”(《读通鉴论》)的法治制度。这已是一种人人都受法律制约、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近似现代君主立宪制的具体设计了。王夫之的这一法治国家构想,比西欧早期“资产阶级代言人”(马克思语)——英国人洛克最初提出的相类似(但更缜密)的构想大约早20年。

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被称为明末三大思想家。固然,无论在理论深度、世界影响和历史作用方面,他们都不能与大体同时期的欧洲文艺复兴诸巨匠相比。然而,西欧没有我们行之两千多年而不变(!)的抑末贱商国策,因而自中世纪开始,

西欧(特别是英国)就由封建社会内部自然诞生了一个逐日成型的市场经济体系,和一个逐日壮大的市民阶级。这是西欧中世纪以后不断产生思想巨匠的重要社会基础。但中国明末的思想家们却遭受了完全不同的历史命运:他们的著作是在极端恶劣的动乱环境下,或遁世隐居或颠沛天涯写作的;是在明清鼎革、政权分立的时空夹缝中,才得以面对土壁茅牖直抒胸臆而不致和李贽同一下场的。他们的著作被冷落沉埋二百多年,直到清末民初,当维新与共和呼声高扬之际,作为时代的需要,才被重新发掘出来,给以应得地位。明末思想家的客观局限在此,难能可贵也在此。而他们的思想被冷落沉埋二百多年,到清末中西差距也拉开了二百多年。

清朝对明末进步思潮的全面反动

清朝立国,建立了媲美汉唐而仅次于成吉思汗的赫赫武功,为现今中国版图和中华民族的统一作出了不朽贡献。清朝前期几位皇帝,尤其是康熙,也能励精图治,有相当好的政绩。因此,康雍乾三朝往往被称为清之“盛世”。

然而,综观清朝帝王对人民特别是对占人口90%的汉族人民的统治术,却不能不说是集历朝帝王严酷手段之大成,并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因为,除了一般封建帝王的特权思想之外,这些满族帝王还残存着从白山黑水时代留传下来的农奴主(甚至奴隶主)的特权思想,和(征服者民族对被征服民族的)民族特权思想。无疑,后者比前者更原始、更野蛮。这种原始和野蛮表现在:占领北京次日,多尔衮就第一次颁布剃发令,强迫汉人剃发,改穿满人服装,“倘有故违,即行诛戮”。因汉人抵触很大,不久暂收回剃发令。进京第九天,为把满汉人

分开,下令驱赶内城(今前三门大街以北)居民迁往外城(南城),以内城屯兵,“限期既迫,妇孺惊惶,扶老携幼,无可栖止,惨不忍言”(《清朝掌故汇编》)。进京这年年底,开始在北方大量圈地,拨给入关的满人,并强迫失去土地的汉族农民“投充”,“投充”者满语叫“包衣”,即奴隶。这是以满族传统的农奴制代替汉族自耕农制、租佃制的一种倒退。若“包衣”不甘奴役而逃跑,便依“逃入法”治罪,第一次被捕回鞭一百,第二次斩。(在英国这时也进行着另一种圈地,即圈农田作牧场,以收羊毛,发展纺织业,英国资本主义工业就是由纺织业开始的。两种圈地大异其旨。)圈地到康熙24年才停止,而剃发令则于清军攻下南京后再次严申,以“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相威逼。正是发式服装的强迫改变,使汉人痛感祖宗传统和民族尊严的丧失,激起顽强抵抗,清人残酷镇压,从而有江阴、昆山、嘉定等血腥至极的“屠城”,嘉定竟三进三屠!

清朝几乎完全继承了明朝“家法”,认为适用于本朝。但对于明末文人那种挥斥公卿议论朝政的学风,特别是聚盟结社的风气,则认为不但“宋明之亡……实肇于此”(《清世祖实录》),也绝对是本朝的致命威胁。因而清朝比历朝更严禁结社,甚至不准汉族传统习俗之一的异姓结拜。还曾“禁天下书院”,以杜绝东林遗风。同时大树儒学尤其是朱熹的崇高地位,并借纂修《四库全书》之机,查禁销毁“悖逆违碍”之书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数目几乎与《四库》收书相等。

但这还不够,为了杀一杀汉族文人的“狂悖”风气,又大兴文字狱。清代文字狱之多,株连之广,堪称空前绝后。光是牵涉几十人乃至千百人的大案,就在百桩以上。而许多大案罪名之奇特,推定之牵强,刑罚之残酷,也是千古所仅见。如:著名文人庄廷琨、孙奇逢、戴名世、方孝

标、陆生楠、彭加屏等,都是以私修或私藏史书(尤其是南明史),书中有沿用明朝年号或讽今嘲世等问题而获罪;吕留良、屈大钧、钱名世、徐述夔、胡中藻等都是以诗文中“犯上”或“影射”之嫌获罪(如怀才不遇的徐述夔《一柱楼诗集》某首诗中有句云:“明朝期振翻,一举去清都”,被认为语涉复明反清,诗人虽死,仍发棺碎尸,为免诗句流传,查禁该书运动席卷全国,折腾了数十年);江西主考官嗣庭则是因用《诗经》中的句子“维民所止”四字作试题获罪,“维、止”两字被认为是“雍正”去头,诅咒皇上;举人汪景祺有一首诗首句是“皇帝挥毫不值钱”,是说有些皇帝不该到处题字,题字太多太滥就不值钱了,这本来也有劝上节制之意,不料惹恼雍正,因而贾祸;另一举人王锡侯编了本辞书《字贯》,先说《康熙字典》如何好,却又说该字典收字太多,不便查用,结果也以“大逆不道”遭了杀身之祸;甚至一些江湖术士、疯癫呆傻者的胡言乱语也被打成文狱。这些罹祸者除遭凌迟、杖死、斩首之外,还往往殃及亲友乡族。如庄廷琨案就被杀七十人,入狱者二千余人!

这些事,大都发生在“康雍乾盛世”,堪称盛世之衰歌。盛世终了,文字狱倒是少了,中衰也就开始了。可见如此那般厉害的集权,那般周密酷烈的文化专制,虽一时出现了万马齐喑局面,文化学术纷纷远离政治,以文字训诂考据注疏之类为主了,皇上和监察大员们心里似乎也踏实了,但并未因而挽住整个国家的颓势。乃至外国炮舰一来,国难继之发生,以后是人人想起来都不能忘怀的诸多国耻……

明末,中国第一次面临历史的十字路口,但我们错过了那个第一次选择。

(责任编辑 致中)

明初才子解缙无辜被杀

● 李立泉

明初的解缙，才思敏捷，政治见解卓越，但一生仕途坎坷，最后因触怒皇帝，无罪被杀。从他的不幸遭遇，我们可以窥见明初专制主义统治的黑暗和对人才的摧残。

解缙（1369—1415），字大绅，江西吉水人，六七岁便显露才华，人们称为神童。据民间传说，他家里很穷，有人故意奚落他，问他父母是干什么的。他应声答道：“严父肩挑日月，慈母手转乾坤。”其实他父亲是一位挑水卖苦力的，因起早贪晚，清晨的太阳、晚间的月亮映照在他父亲挑的桶里，叫做“肩挑日月”；母亲织布，手转织轮，被说成为“手转乾坤”。关于这类脍炙人口的传说，几百年来在民间广泛流传，足以反映人们对这位才子的喜爱和赞许。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解缙19岁，他一举考中进士，授庶吉士，在翰林院供职。明朝翰林院是一个储备人才的地方，在这里任职的大都是些年轻才子，他们侍从皇帝、协助皇帝升迁最快。解缙因才华出众，常在朱元璋左右而受到重视。一天，朱元璋对解缙说：“朕与你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当知无不言”。解缙利用这个机会立即上了万言书。他说当今政令太繁，刑罚太重，开国至今二十载，“无从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生杀任情，罚重赏少。“尝闻陛下震怒，锄株剪蔓，诛其奸逆矣，未闻褒一大善，赏延于世，复及其乡，始终如一者也”。

在吏治上，他说，“进人不择贤愚，授职不量轻重”。“出于吏部者无贤否之分，入于刑部者无枉直之判”；“台纲不肃，吏治不明”，“御史纠弹，皆承密旨”；“以刑名轻重为能事，以问囚多寡为功劳”。这种做法不足以激励清廉，弘扬正气。

解缙主张要治理国家，使之国泰民安，只有励行文治，正风俗，兴学校，省冗官，宽刑罚，轻徭薄赋，依法治国等等。并针对当时贫富不均、役繁税重的情况，主张“行授田均田之法，兼行常平义仓之举”。

解缙这次上书，实际反映了他全部的政治主张，对明太祖朱元璋晚年随心所欲，以权术取下，实行严刑峻法的政治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朱元璋后期猜忌功臣，大肆杀戮，通过胡蓝党案（胡惟庸和蓝玉两个案件）杀人达四万五千多人。这种疯狂的大屠杀，使当时的士人不寒而栗。而解缙毫不回避，一身正气，对此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足以表现解缙对国事的高度关心和坚持正义的精神。有些地方他甚至一针见血地揭了朱元璋的老底：“陛下天资至高，合于道微，神怪妄诞，臣知陛下洞属之矣。”就是说朱元璋有些作法纯粹是玩弄权术，愚弄百姓。朱元璋看了上书很生气，但又无可奈何，只是因为言在先，叫人知无不言，不好发作。

解缙又代郎中王国用上书，为

被冤杀的李善长白冤。李善长，安徽定远人，早年参加朱元璋的起义军，为其运筹帷幄，调和诸将矛盾，立下不少功劳。开国后，官至右丞相，位列第一，比之为汉代萧何。他77岁那年，朱元璋借故把他杀了，加给他的罪名是，帮助左丞相胡惟庸谋反，并托天有星变，得杀大臣应灾。对于这些莫须有的罪名，解缙逐条加以驳斥，说得入情入理，问得朱元璋无话可说，只好不作追究，倘若他人，朱元璋发起怒来，会立刻叫武士将他粉身碎骨。

朱元璋虽然对解缙宽容，但他毕竟发现解缙政治观点与自己不一致，解缙的思想继承了中国文化中民主性的精华，而朱元璋热衷的是高度专制统治，两人思想有格格不入之处。朱元璋称解缙为“冗散自恣”，决定罢黜不用。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解缙的父亲来京觐见，朱元璋对他说：“你带你儿子回去，再读十年书，大器晚成，那时大用未迟。”朱元璋虽然不高兴解缙，但毕竟没有杀他。因此史书说：“俾十年进学，爱之深矣”。解缙回到家乡，闭门不出，专心著述，修改《元安》，删定《礼经》，学术上多有成就。

1399年朱元璋死，解缙似乎敏感到一代暴虐政治即将结束，认为大展宏图的时机来到。他不顾封建礼教的谴责，丢下死而未葬的母亲和九十岁的老父，日夜兼程赶赴南京，希望能报效国家，一展平生

抱负。但这一举动却遭到弹劾，被贬为河州卫吏。解缙只好上书，倾吐自己的忠君爱国之心，又由于礼部尚书董伦的推荐，才被任命为翰林侍读。

惠帝即位，风云突变。朱元璋时代大封诸子为藩王，造成藩王势大，中央和地方势力的斗争终于一触即发。1399年，燕王朱棣在北平以“清君侧”为辞，发动了“靖难之役”。经过三年战争，1402年，朱棣率军渡过长江，一举攻克南京，夺取了帝位，改元永乐，是为明成祖。朱棣完全继承了朱元璋的衣钵，继续建立起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仍废丞相、建立内阁。解缙被任命为翰林侍读，与黄淮、杨士奇、胡广、金幼孜、杨荣、胡俨等人，同在文渊阁任职，参预机务。此为明代内阁之始，解缙等七八人为内阁第一任成员。明初，朱元璋为了加强自己的独裁统治，1380年杀左丞相胡惟庸，废除了从秦汉以来实行的丞相制度。皇帝以下设六部尚书，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朱元璋把一切大权抓在自己的手中。这种高度的集权统治成为明代的一大弊端。惠帝即位，感到丞相制由来已久，废除不便，仍恢复丞相制。朱棣登基后却打着维护祖制的招牌，又废丞相，但他要日理万机，毕竟没有三头六臂，于是设立内阁，挑选一批文人来充当自己的助手。解缙抱经世之才，成了挑选的对象。

解缙在内阁八年，曾担任过《明太祖实录》总裁，书成后受到成祖的赏赐。在政治上解缙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多所建树。明成祖为立皇太子之事颇费踌躇。长子高炽“笃好经史，有人君之度”。文武大臣多主张立高炽为太子。次子高煦善骑射，勇武颇类成祖，靖难之役中，跟随朱棣征战，多立战功，他觊觎皇位，尝以李世民居。武臣以淇国公丘福为首，主张

立高煦为太子，明成祖为之动心。但封建社会立储系国家根本所在，关系甚大，尤其是废嫡立宠，事关国家安危。解缙没有考虑自己的得失，旗帜鲜明，力主以长子高炽为太子。当成祖征求他的意见时，他无所顾忌地说：“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但成祖并不动心。明成祖曾要诸臣应制虎彪图，图中画一老虎领众彪（小老虎）作父子相亲状。解缙当场挥毫写了“虎为百兽尊，谁敢触其怒，唯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顾”。明成祖很感动，于是才下决心立高炽为太子，使高煦觊觎皇位的阴谋没有得逞。后来，历史证明，次子高煦性格凶悍，行为骄恣跋扈，屡犯违法不悛，终于得了个谋反就诛的下场。当时如果高煦被立为皇储，对明朝的巩固和社会安定肯定是不利的。仁宗嗣位，在位时间虽然不长，但明王朝从此逐渐扭转了刑繁役重的局面，对当时的人民多少有些好处。

解缙在政治上另一个卓越的见解，是反对明成祖对安南的战争。朱元璋认为安南“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命。”将它与日本、朝鲜及东南亚一些国家均列为不征之国。永乐初年，安南内乱，明成祖在一班武臣的怂恿下，决定派兵远征安南，以显示天朝的威风。当时解缙作为亲近大臣，力排众议，反对这场战争，结果引起成祖的不快，于是“恩礼渐衰”，解缙由此得祸。明朝对安南的战争，前后持续了二十余年，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对国力消耗极大，给当时的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痛苦。《明史》的作者《解缙传》后赞许说：“始缙言汉王及安南事得祸。后高煦以叛诛。安南数反，置吏未久，复弃去。悉如缙言。”历史证明，解缙对内政外交的高明见解，表明他是一位具有远大眼光的政治家。

封建的黑暗政治是不容许有自

己的优秀人物存在的。解缙反对立高煦为太子，高煦怀恨在心，常在成祖面前潜毁解缙，说他泄露朝中机密。不久解缙坐“廷试读卷不公”，贬为广西布政司参议，后又改坐交趾，督饷化州（今广东化县）。永乐八年（1410），明成祖亲征蒙古，解缙入京（南京）奏事，谒见太子。高煦在成祖面前拨弄是非，说他“私觐太子”，“无人臣礼”，以此激怒成祖。这次解缙入京途经广东，观览粤赣山川形势，上疏主张开凿赣江，以沟通江西与广东的交通，解决民运艰难。当时成祖在锐意经营北方，兴建北京，远征蒙古。或许认为解缙有意与自己唱对台戏，于是节外生枝，抓住这件事，大兴诏狱，将解缙下狱。此案受牵连的大臣达十余人。所谓诏狱，就是秉承皇帝旨意兴起的要案，不受一般法律的约束。解缙在狱中受尽酷刑，“考掠备至”，与他一起入狱的官吏多人死于狱中，解缙却居然顽强地活下来。永乐十三年，锦衣卫头领纪纲，呈上在押犯人的名册，明成祖发现解缙仍在狱中，竟说：“缙犹在耶？”杀人魔王纪纲心领神会，当晚就指使人将解缙用酒灌醉，把他活活地埋在雪中，一代才子解缙，就这样惨死在暴君酷吏的手中，时年47岁。

解缙之死，民间为他编造了许多神奇的传说，反映了人们对这位胸无城府的才子的同情。他的死虽属千古奇冤，但在封建专制登峰造极的明代，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因解缙聪明绝顶，无所顾忌，史称他“才高，任事直前，表里洞达……无顾忌，廷臣多害其能。”这种正直爽快的性格，与封建专制统治是格格不入的。封建统治者需要的只是奴才，而不是人才。臣子的言论行动对专制统治的淫威稍有触犯，就会招来杀身之祸。解缙之死，就是一个例子。

（责任编辑 赵友慈）

曾国藩 教子之道

● 伍泽华

清朝咸丰年间,出了一位有名的大官僚曾国藩。百多年来,人们在政治上给予他截然不同的评价,但在家庭教育方面,人们一致认为他是一位教育有方的家长。

曾国藩有两个儿子,他们在科举仕途上并没有大露头面,但在实际工作中,都显露了出众的才华和胆略。长子纪泽,诗文书画样样精通,还自学了英语,成为一名出色的外交官。在处理西北边疆危机中,曾纪泽凭着“啮雪咽旃,期于不屈”的斗志和“酌情据理”的谈判艺术,舌战强敌,从沙皇贪婪的大口中夺回伊犁城,取得晚清外交史上唯一的一次胜利。曾国藩的次子纪鸿,聪颖过人,很喜爱自然科学,尤其在数学方面有很深造诣,不幸中年去世而未能竟其业。不仅儿子个个成才,曾国藩的孙子辈还出了曾广这样的名诗人,曾孙辈又出了曾宝荪、曾约农这样的教育家和学者。

一家四代人才辈出,原因就在于曾国藩教育有方,“爱子以其道”。

(一)不求子孙做官发财,只求读书明理

在封建时代,出人头地的一条捷径就是做官。当时的官僚子弟,都想借父辈权势挤入官场,把科举考试看作敲门砖,趋之若鹜。曾国藩却例外,他说:“凡人皆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这是立身根本,也是他对子女的最大期望。曾国藩不准子侄们从军、做官,要他们各自选一个专业方向,努力攻读。这样,曾纪泽兄弟从小就阅读了大量中外经典著作,并学习外语和自然科学,养成实干精神。他们对科举考试不热心,曾国藩也不勉强,尊重他们的个人意愿。如此明智,当时是很难得的。

(二)绝奢侈懒惰之心,培养勤、俭、谦、劳精神

曾国藩位列三公,拜相封侯,他的子女可算得上“正牌高干子弟”,但他从不为子女谋求特权。他认为,与其给子女留一份富足的财产,不如给他们良好的习惯。

“一日之计在于晨”,曾国藩不准子女们睡懒觉,要他们每天坚持学习,从不间断。而且读书、写作、赋诗和书法四样并重,不能偏废,这是勤;不准子女积钱买田,衣服不能穿得过于华丽,夜饭不荤,这是俭;不准斥骂仆佣、轻慢邻居,要敬老爱幼,女儿出嫁后要尊敬公婆,不要倚仗父辈权势颐指气使,这是谦;在家里男的要扫地、除草、拾粪、种菜,女的要学习烹饪、纺纱和织布,每年为曾国藩做一双布鞋,看谁做得好,这是劳。曾国藩要求子女少坐轿,多走路,既保持谦俭之风,又能体察民情。他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子弟们轻金钱、重学问,虽然生活在荣华富贵之中,仍然能够保持寒士家风,常保家运,否则,“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

(三)言传身教,循循善诱

对于子女,无论在读书还是做人方面,曾国藩的要求都非常严格,决不放纵。但他不是一味督责,而是从自身做起,凡要子弟们做到的,他必先做到,为他们树立榜样。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办公,平时一有空就读书练字。他的饮食起居都很节俭,所有衣物不值百金,晚饭也不吃荤菜,一般是吃蔬菜和稀饭。曾国藩还经常向儿女们总结自己一生的成败得失,说他生平有三耻:不懂天文算学,做事往往有始无终,没有系统学习名家书法,一生感到遗憾,希望他们雪父之耻。在封建社会,父亲能向儿女说出自己的不足,是很少见的。

曾国藩能够根据自身体会,以讨论研究的态度指导子女,切实中肯,收效也就十分显著。他根据纪泽、纪鸿等人的各自特点,分别为他们制定学习计划,开列书单,规定每个阶段的任务,循序渐进地学习。纪泽年轻时有些浮躁,他隔几天就写信提醒,要他注意改进,更踏实、更稳重一点。纪鸿天份很高,从小就机敏过人,深得父亲喜爱,但他不够用功,曾国藩就耐心告诉他:不花苦功,才情再好也难成才。年轻人好胜,样样都想精通。曾国藩又写信劝导他,说人生有限,时间宝贵,“凡言兼众长者,皆其一无所长也”。曾国藩长年在在外,无法直接督促子弟,他就写信,也要子女给他写信,越详细越好。他不管多忙,都要抽空阅读孩子们的信,考察他们是否长进。冬去春来,鸿雁无数次地往返,纪泽、纪鸿也渐渐长大,终成一代英才,青史留名。

(责任编辑 吴 思)

黄胄赠我三幅画

● 刘大为

黄胄同志给我画过一幅中堂，是他经常画的题材：新疆妇女和一个女孩骑着毛驴，从“巴扎”归来，一位维族老汉在后面赶毛驴；天上两只春燕剪柳，人和景物都异常潇洒，后有一首小诗。题款写的是：“大为同窗存念……”许多同志看过此画都问：“你和黄胄同学？”我说：“是的。”“是在美院吗？”我笑了：“不是，我是画盲，还能上美院？”“噢，那一定是华北联大，黄胄在美术系，你在文学系。”我说：“我和黄胄是在莲大同学，可不是成仿吾任校长的那个联大，我们是莲花池的莲大同学。”

1956年，整个文艺界开展“反胡风”的学习，当时，军队领导把全军搞专业文艺创作干部集中，在如今是西客站的莲花池一个军队农场学习。夏天炎热，学习紧张，由学习文件转入肃反斗争；大伙议论，真是“火热的斗争，火热的天”。就在这么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逆境之下，黄胄依然泼墨挥毫素描写生。我们住处在村边，有一口水井，井旁一棵垂杨柳上，经常拴着一头小毛驴。黄胄抓紧一切时间，画这条小毛驴，先用铅笔速写其动态，继而又用毛笔五彩墨色点染，质感颇强。黄胄苦学速写的精神，令我们想到古人王冕儿时池塘岸边描绘荷花

的专注。而莲花池荷花虽少，但芦苇睡莲的景色也颇能入画，可是，黄胄却迷恋着小毛驴，还搜集老乡关于说驴的谚语，和我们一起编写过关于小毛驴的歌谣：

驴！驴！
农家好伙计。
远看一张皮，
近看有四蹄；
粉嘴双白眼，
个小小力气。
驮粮送伤员，
登山如平地。
人类好朋友，
抗战有功绩。

多年以后，在莲花池参加过“整风”学习的同志们再相会，都戏称是“莲大”同学，而黄胄笔下的毛驴和徐悲鸿的奔马、李可染的孺子牛、吴作人“前贤未见”的熊猫，被当代的中国画界赞称丹青四绝。再忆50年代他在莲花池畔和王冕一样写生的情景，会感到黄胄的毛驴和王冕的荷花一样，都散发着苦寒后的清香。

黄胄和毛驴似有奇缘，史无前例的“文革”中，黄胄被“专政”罚苦役，赶着小驴车送豆腐，他又有了进一步观察毛驴的机会。他把速写本放在豆腐屋下，无人之时，还是画。一次，他把小驴车拴在前门箭楼西树林里，他去吃饭，回来一看，驴车不见了，他吓出一身冷汗，沿着马路，向西追去，追到宣武门时，正看

到警察截住那辆小驴车，他跑上前去，警察把缰绳交给黄胄，说：“你这个老干部，丢了这辆小驴车，你还打算解放不？”语气严厉又透着关切。小毛驴却异常亲切地向黄胄晃着长耳朵，啾啾直叫。警察的严厉，小毛驴的亲昵，使黄胄感动得两眼发热。

在毁灭文化的“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制造过丹青狱“黑画”展，把一大批的著名画家的作品，污蔑为毒草黑画，黄胄的画当然也在劫难逃。我和肖向云同志在一本新加坡出版的挂历上看到黄胄的一幅《哈萨克猎人图》，笔触粗犷豪放，构图非常精采：一位神采飞扬的哈萨克猎人，骑在一匹奔马之上，这已经构成威武的了，可是，这猎人的曲臂上，还站立着已经张开翅膀、意欲飞去的雄鹰，使画面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效果。我和肖向云联合起来，请黄胄同志为我们画这幅《哈萨克猎人图》。那时，还在黑云翻滚的“文革”之时，黄胄说：“那幅画是‘大毒草’，黑画展中的主要作品，你们敢要？”肖向云说：“我专门收藏黑画！承蒙画家们支持，已经获得‘黑画’展上的许多墨宝，没有你这张代表作还行？”黄胄听罢，慨然允，当即展纸研墨，画了一个下午，《哈萨克猎人》再生了，黄胄问我们这个哈萨克猎人如何？我们端祥了许久，肖向云说：



黄胄在炎黄艺术馆前

“当然好，可是，这位哈萨克猎人的神情，不如原来那张哈萨克猎人强悍，有点文质彬彬的……”黄胄听后笑道：“说对了，我怕把猎人画得太粗犷了，你们挂不出去，如果被‘旗手’、文痞、画霸之类的评论家看到了，会说我把兄弟民族画得像流氓无产者，于是，我武戏文唱，把这位猎人画成一位大队支部书记的样子，你们注意到没有？这位猎人还是一位复员军人呢，不信，你看他腰上系的那条皮带。”这时，我们才注意到猎人腰中系着一条带着五星铜扣环的解放军的皮带，与猎人身后马背上已经猎取的野狐等猎物形成的非常有趣的连系，也反映出画家大处着眼，细节细致，真实生动，独具匠心的非凡表现力。

然后，黄胄又在画面上添写了两只飞翔的天鹅，一面画，一面笑着说：“我的画，如果要润笔费的话，要千元一尺，增加一只天鹅另收五百，两只又是一千。”从他说一只天鹅五百元的玩笑中，我却体会到，这两只免费的天鹅，为这张精美的作品，营造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典型环境，由于有了天鹅，使人感到这位哈萨克猎人的坐骑正奔驰在新疆大草原上的一个美丽的湖边。观画者异口同声地说，最后这两只天鹅，称得上是精采之笔。

三

1975年，一位青年画家，非常敬仰黄胄，前往拜访求教，临别时把黄胄在会客单上的签名特意保存下来，珍重万分，拿给我看。我受到感动，把黄胄为我绘制的一张延边歌舞的册页，送给了这位青年画家。过后，我把这件事讲给黄胄听了，他笑笑说：“你这也算宝剑赠勇士吧，你送给这位爱画人一张小画，我再为你画一张大的。”于是，他拿了一张四尺宣纸，铺在画案之上，对我说：“我还给你画延边歌舞。”他画的潇洒淋漓，人物造型极为生动，画面上鲜族少女，跨着长鼓，舞姿婀娜，击鼓的手势异常美妙，似乎令观者听到了歌声伴着鼓声……画毕，他又说：“这画放在你那儿保存得住么？不要让造反派当‘四旧’、‘毒草’给抄走哇。”我说：“有办法，你在这画上题一个标题，就叫：红太阳照边疆。”这是那年代一首朝鲜族同胞喜欢击着长鼓歌唱毛主席的歌曲。黄胄想了想，用大字写了这个标题，又在后面加了两行小字：“延边歌舞，大为命题，向云欣赏，黄胄作画。”然后又开玩笑说：“把大家都写上，出了事儿，谁也跑不了。”大家听了，笑声不止。

黄胄从来不把他创作的艺术品

当做商品，他经常这样豪放地为战友、为知音、为工农兵群众热情挥毫。

四

从这三张画的创作过程，我们看到了黄胄的刻苦，观察生活的深入，所以他的作品才能那么生动传神。有些人片面地知道，黄胄画驴是一绝，其实，黄胄最好的作品是人物，不仅仅是兄弟民族的人物，他还画了大量的工农兵。他在福建前线画过的男女民兵；他为梁斌的《红旗谱》所做的插图，春兰的绣像等等，都是黄胄艺术长廊中的珍品。

他把写生视为他的作品生命，他一生所画过的大量速写、素描，都是我们民族艺术宝库中的宝藏。他一生笔不离手，日日夜夜，随时随地他都在做画，他的画室坐满了客人，他仍旧端坐在画案前一张一张地运笔写生，整理速写，也不耽误和朋友聊天。一位颇有造诣的美术评论家说：黄胄同志的速写可以和国际上的速写大师拉斐尔比美。黄胄同志的夫人、画家郑闻慧，对我们说过一件事，黄胄带着重病还深入新疆画了大量的速写，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在乘坐的汽车上审视这些作品时，被一阵风吹跑了不少原稿。

黄胄同志对我说：70岁以后，他将开始画山水，写尽中华儿女的美好身影之后，他再描绘祖国的大好河山。可是，当他刚欲进入另一番深造的艺术天地，正待在新的丹青艺海扬帆逐浪之时，他竟然离开他热爱的祖国而去了。我们，看不到他笔下的祖国河山了。可是他苦心孤诣经营建筑的《炎黄艺术馆》的造型，不很像一座艺术之山么，而从这座山峰中流淌出来的丹青长河中，黄胄的作品像朵朵艺术浪花，永远展现在祖国大地之上。

（作者为军队作家）

（责任编辑 王 恂）

《水浒》的流传与评说

● 靳树鹏

水浒故事在南宋时已经流传,《水浒传》中不少人物和故事大都是以《宣和遗事》为蓝本。《水浒传》成书大约在十四世纪,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长篇小说。金圣叹截取前七十回(金将第一回改为楔子,其实是七十一回)本的《水浒传》,流行最广,至今已三百多年。从水浒话本之勃兴,到水浒戏剧和小说之盛演及流传,已历七个世纪。

金圣叹腰斩《水浒》,是《水浒传》出版史上最大的一桩公案,至今有毁有誉。所谓腰斩,是指他伪称得到古本,其实是把百回本中招安以后的二十多回拦腰砍去,又加以修改评点,即贯华堂本《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鲁迅称金圣叹腰斩的《水浒》是“断尾巴蜻蜓”,“单是截去《水浒》的后小半,梦想有一个‘嵇叔夜’来杀尽宋江们,也就昏庸得可以”。鲁迅认为宋江们是杀不尽的,金圣叹加写了七百余字的“卢俊义惊噩梦”,确实够昏庸了。毛泽东说:“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历史上宋江确实被招安,不写招安当然不真实。

应该说,金圣叹对《水浒传》的流传功不可没。他是明清之际的大才子,以批阅评点《离骚》、《庄子》、《史记》、《杜诗》、《水浒传》、《西厢记》而闻名天下,终以“哭庙”一案——率几千之众为民请命,而被清廷斩首,满门罹罪,留下一曲浩然悲歌。

《水浒传》是小说,不是历史,更不是政治教材。宋江,史有其人,但小说中的宋江同那个真宋江确有很大不同。其他的水浒英雄如鲁智深、武松、李逵、林冲等,不但正史无可考,连野史上也无踪迹,最早是口头文学的创造,而且是多人的创造,经说书人和文人加工,到元代又成了杂剧的题材,终于在施耐

庵、罗贯中笔下成为一部不朽的小说。究竟谁是《水浒传》的主要作者,是施耐庵还是罗贯中,史无定评。现在见到的最早的本子或题“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或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至金圣叹删改本刊行后,才专以施耐庵为作者。金圣叹认为七十回(其实是七十一回)以前是施耐庵所作,以后的文字是罗贯中所续,他斥续作为“恶札”,属狗尾续貂。这虽然是金圣叹的臆断,也是为他伪托得到古本做铺垫,但从文学鉴赏的角度看确是极有见地。《水浒传》七十回以前和以后确实工拙不同,其精华全在前七十回中,其后的回目,无论是百回本的、百十五回本的,还是百二十回本的,均幼稚粗陋,读来了无情趣,前后明显感觉不是一个人的手笔。

水浒一百零八位男女绿林英雄,再加上榜上无名的晁盖和王进,共110个人物,虽然描写得有主有次,详略不同,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出身和性格,特别是那些生动的个性和各不相同的逼上梁山的过程,都以大手笔精彩写出。其中武松、鲁智深、李逵、林冲等人的形象和故事家喻户晓,就是吴用、宋江等人也广为人知。

金圣叹加写的那七百余字“惊噩梦”,当然昏庸,但据此论断金圣叹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诋丑农民起义,也过于偏颇。如果金圣叹不深爱这些水浒英雄,他何以会投入如此大的热情和精力评点修改出版前七十回《水浒传》呢?他何以会把武松、鲁智深、李逵、林冲、吴用等封为上上人物,对之赞不绝口呢?他憎爱分明:“无恶不归朝廷,无美不归绿林。”“谁致之失教,谁致之饥寒,谁致之有才与力而不得自见?‘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成汤所云,不其然乎?”他在第一回的前批中还

写道：“一部大书，七十回，将写一百八人也，乃开书未写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者。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生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他类似的批语很多，可见他痛恨的不是“盗”，是逼民为“盗”的统治者，所谓官逼民反不得不反是也。

凡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多知道毛泽东晚年有这样的评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晁盖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你看电视剧中的宋江果然红袍加身，还一再口称小吏，多次跪在地上屁股撅得高高的叩谢皇恩，终于饮鸩而亡，面目既可憎又凄惨。

毛泽东认为：“《水浒传》要当一部政治书看。它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社会情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起来革命。当时农民起义，群雄割据，占据了好多山头，如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最后汇集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军。这支队伍来自各个山头，但是统帅得好。”毛泽东一生论《水浒》，都是充分肯定这部小说最有价值的思想是“官逼民反”，是众多英雄被“逼上梁山”的深刻的社会原因，他很少或从不指责梁山英雄。唯独他晚年论《水浒》，与以前有了很大不同，这与他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反修防修”的特殊心态有关。但毛泽东晚年所论，确实也有透辟的地方，如“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也确实有偏颇的地方，如“好就好在投降”、“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指责就苛求 800 年前的古人了。他们压根就不可能有反对皇权的观念。施耐庵死后 300 来年，黄梨洲才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非君的思想，指出君主是“天下之大害”，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石破天惊之论。在中国历史上反对个别皇帝的事倒是不少，那不过是反掉你这个皇帝由老子来做皇帝或另拥立一个皇帝。照样是“独治”而不是“众治”。

《水浒》七十一回以后各种版本中征辽、征田虎、征王庆三大段均无足论，其中最重要的故事是征方腊，也是电视剧所取，照我看这也是水浒研究中的一桩公案。

《水浒》中的宋江基本上是文学创造的人

物，其他水浒英雄更是如此。高俅也是史上无名之辈，只在笔记中有他发迹的故事，水浒中的高俅也是一个文学形象。七十一回以后宋江被招安打方腊等故事，却把文学和历史弄得混乱不堪。历史上的宋江起义是一小股，同形成大气候的方腊起义不能比。宋江是战败而降，是被招降，还是主动投表请降，史上也其说不一，总之，他是被招安了。招安以后的情况如何，实在很难查考。《宣和遗事》说“后遣宋江收方腊有功，封节度使”，这是民间传说，不可凭信。据《宋史》云，打方腊的主帅是童贯，擒方腊的是辛兴宗和韩世忠，并未提及宋江等人。其他史书倒是提及宋江参与打方腊，他不过是童贯部下的裨将而已。可见，七十一回以后和这部电视剧，都把宋江描写为打方腊之主将，是不合史实的。七十一回以后的作者，既不是文学家，也不是历史家，才写得这样不文不史。七十一回以后的鲁智深擒方腊，电视剧中的武松单臂擒方腊，就更加不伦不类。据报道，有些青年人把此剧当作历史看，那岂不是误人子弟。方腊是个真实的农民起义领袖，鲁智深和武松都是虚构的人物，怎么能让一个虚构的人物去擒住一个真的方腊呢。看来如何把《水浒》这部名著搬上荧屏和银幕，真是需要好好研究。

就个性的鲜明生动及感染力而言，宋江是小说中塑造得不十分成功的人物，可对他的争议却最多最大。有人认为宋江是农民运动领导者不朽的典型，颇有领导才能；也有人认为他是投降主义者，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毛泽东始而认为他“统帅得好”，晚年又说他“搞修正主义”。如此等等，都可聊备一说。关于宋江被招安，鲁迅说过一段颇有历史眼光又很深刻的话：“招安之说，乃是宋末到元初的思想，因为当时社会扰乱，官兵压制平民，民之和平者忍受之，不和平者便分离而为盗。盗一面与官兵抗，官兵不胜，一面则掳掠人民，民间自然又时受其骚扰；但一到外寇进来，官兵又不能抵抗的时候，人民因为仇视外族，便想用较胜于官兵的盗来抵抗他，所以盗又为当时所称道了。”

小说《水浒》是不朽的，对它的评说也将延续下去。

（责任编辑 刘家驹）

张竞生教授与 民国初年的《性史》风波

● 王心喜

民国初年出版的《性史》一书，是中国近代性学史上的“开山之作”，即使今天看来，仍不失其“前卫”的作用。在封建礼教盛行的旧中国，研究性学者的声誉可想而知。然而这次《性史》研究及其引起的风波，为我们今天从事性学教育和性科学知识的普及，提供了一个有参考价值的事例。

一本书掀起 轩然大波

1926年5月，京津地区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并逐渐波及全国。起因不过是当时出版了一本书——《性史》。

掀起这场轩然大波的是著名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竞生。当年，张竞生在北京大学讲授性学。他认为必须从科学角度了解性学原理与性行为技术，以消除性愚昧。他还认为性知识与性生活的实行，不独关乎一己，也影响整个民族和社会的生存发展。于是，他甘冒锋矢，言之于口，笔之于书，著成《性史》，成为中国近代性学教育的先驱者。

张竞生原意是效仿英国科学家、思想家霭理士的《性心理丛书》，将《性史》作为中国性学的文献。《性史》只印了1000册，而且编者再三声明

“不可重版”，不料，此书销路极好。各地不法书商纷纷盗印。在上海还出现了署名张竞生编著的所谓《性史》二集、三集以至十集；不仅如此，《性典》、《性艺》、《性史补》、《性史补外补》等冒张竞生之名的一些淫乱下流之作也纷纷出版。张竞生见状急忙延聘律师自我保护，但为时已晚。“张竞生”三字在社会上不胫而走，竟然与“脐下三寸作家”相类并列。张竞生承受莫须有的海淫之罪，百口莫辩，无奈只好取消《性史续集》的出版计划（他已编至四集）。

《性史》出版引起了轰动

1926年8月，天津市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首先在南开禁此书；没过多久，他又说服警察局在天津市查禁《性史》、《情书一束》、《女性美》、《夫妻之性生活》等“淫书”。不久，出售此类书籍的书店被查封，老板也锒铛入狱。报刊纷纷发表了不少抨击“淫书”的文章。

不过，也有一些学者文人，对于这种举动不以为然，尤其是对于南开校方的做法持否定态度，其代表人物是鼎鼎大名的周作人。他认为，《性史》一书，“它使人觉得性事实也可以公然写出，并不是如前人所想的那样污秽的东西”。有谈



张竞生（左三）1946年在金边与友人及其家人合影

者写信问他,《性史》究竟有何价值?他在复一位读者的信中写道:“我并不因为认识张竞生、章衣萍(即《情书一束》作者)诸君而想替他们辩解,我不说这些书于科学上或文学上有怎么大的价值,我也不想拿去给自家的或友人的子女读;然而我也不觉得怎么可怕,自然更没有查封之必要了。”

张竞生致力于性学研究和普及

张竞生,广东饶平人,生于农家,年轻时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革命。辛亥革命后,为寻求科学救国,放弃了高官厚禄,于1912年公费赴法国留学,九年寒窗,他先后取得了巴黎大学文学院文学士和里昂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0年回国后,先受聘于广东潮州金山中学代理校长;一年后又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之邀,赴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授,主要从事西方哲学和美学范畴中的性心理学和爱情问题的研究和教学。

张竞生在留洋之前,就读于北京京师学堂。那时,他已读过德国学者施拉茨的《世界各民族女性人体》,这是一部严肃的性教育学术专著,引起了他对研究性学的浓厚兴趣。英国霭理士有一部六册的《性心理丛书》,还附了许多个人性史资料,进行科学论证。张竞生效仿霭理士,从搜集性史入手,开拓中国性学研究,想以性科学冲击封建的性禁区。

他到北京大学后,把美学引入到性心理学的教学之中,作普及性知识的尝试。为此他编写了《美的生活》、《美的人生观》、《美的爱情》等教材,讲授给学生听。1923年冬,校方正式通知张竞生,他所编的《美的人生观》已被列为正式教材出版。该书主张“性育的真义

不在泄精,而在发泄人身内无穷的情愫;男女性交的使命不在生小孩,而在其产生了无穷尽的精神快乐;我所主张的性欲不是‘天’,也不是‘人’,乃是在‘天人’之间。我于一切美的观念都是看重灵肉并重的。”

不久,张竞生出任“北大风俗调查会”主任委员,拟出版一套“中国民俗丛书”,其中就包括性史。

张竞生认为,性要成为一门科学,要先有性史做材料。性史,就是性的材料,愈多愈好,不管它是正常的,或是变态的,都应一并搜集,就其材料整理,推论它的结果,使之成为一种科学的论据。张竞生就是抱着这一目的开始搜集中国人的性行为、性经验的材料的。

1923年初,张竞生在北京《晨报副刊》刊登一则征文启事,没想到很快就接到了许多性体验文章。这实在大出张竞生所料。这说明中国人并没有在性压抑中窒息,也说明性的话题的确一直被大众关心。张竞生从二百多篇来稿中,选出了七篇,在1926年5月编成了《性史》一书付梓。每篇文章之后,都附上张竞生针对某一性问题,诸如夫妻如何通过性生活协调双方情感问题、避孕问题、女性性高潮问题等等,所写的通俗而科学的“编后语”。

教授的尴尬与反思

张竞生编印出版《性史》后,起初颇有几分得意。他将200元大洋稿酬分寄各位作者,自己未取分文,接着又兴致勃勃地编了《性史》二、三、四续集。

但是,社会上很快出现了抨击《性史》的浪潮。《性史》被认为是“淫书”,张竞生被讥为“性博士”、“卖春教授”、“大淫虫”等。张竞

生坚定地认为,《性史》是性书而绝非是“淫书”,因为“淫书是作者个人虚构的情状,专门挑逗读者的肉欲为宗旨,是不合乎礼法及漫无节制的性描写;而《性史》乃以科学的方法,以种种实在的方面描写,以备给读者研究的材料”。不过,《性史》出版后引起的反应,很令张竞生失望和害怕。据当年《语丝》杂志披露,《性史》一出版,就在天津成了畅销书,甚至初中生也偷偷地看;若干学校贴出了禁购和禁读的布告,而其销路却因此而愈畅;一些假张竞生纷纷出书,以研究性科学之名,行“专门挑动读者肉欲”之实。

张教授困惑了。他觉得自己编辑的《性史》,“立意是正当的,但效果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今天看来,当年张竞生在措施上也有值得研究商榷之处。霭理士著作中的性史,是作为参考材料附录在后,并且限定发行范围,且只允许成年人花高价购买;而《性史》价钱不过二三毫,人人可以买。张竞生决定,已经编好的《性史》二、三、四续集不再出版,并要求第一集不得再版。

解放后,张竞生一直在广东文史馆工作,继续研究哲学。1970年6月18日,病逝家乡饶平,享年82岁。他的家乡为其修墓立碑,赞誉他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哲学家、文学家、性心理学家、教育改革家、社会学家和乡村经济发展实验家”。1988年,广东饶平召开“纪念张竞生先生诞辰100周年暨学术思想讨论会”,来自北京、广州及海外有关专家学者,一致肯定他是一位真诚爱国者,一位有远见的思想家,认为“他长期受到的误解和冷遇,这是很不公平的,应澄清某些误解,公允地还他在学术领域的真正面貌”。

(责任编辑 陈崇保)

在武安看傩戏

——傩文化活化石

● 郝玺修

河北武安市固义村的元宵节，因表演傩戏而格外红火热闹。武安傩起源于夏商时期，原先很多村都表演，就数固义村从古至今坚持演唱。今年与往年不同的是：经国家文化部批准，元宵节“98 亚洲民间戏剧、民俗艺术观摩与学术研讨会”在武安召开，观摩研讨固义村傩戏表演。

固义傩是以“捉黄鬼”和傩戏两条线索进行的，把“娱神”与“娱人”有机地结合起来。“捉黄鬼”以正月十四日上山请神为始，包括驱邪、捉鬼、审判、斩鬼等仪式。在捉鬼中斩鬼后，穿插进行大规模的戏剧、高跷、旱船、舞龙、武术、花会表演。其气势神圣庄重，惊心动魄，锣鼓喧天，热烈欢快，整个活动在礼炮声中，逐步推向高潮。

正月十四夜晚，村里的人都彻夜不眠，扮脸谱、试服装、整道具、演唱等忙碌到次日凌晨1时。尔后扮演大鬼、二鬼和跳鬼的人们，身着单衣，舞着刚劲的舞姿，在众多手执柳棒的更夫簇拥下，高声呐喊，大汗淋漓地跑大街奔小巷、驱邪赶鬼，直至清晨7时“黄鬼”被缉拿归案。“黄鬼”是邪恶的象征，洪水泛滥时的滔滔浊浪，瘟疫、痼病使人面黄肌瘦，都被认为是“黄鬼”作祟。所以扮演“黄鬼”的人从头到脚都是黄色。当“黄鬼”被押上断头台时，群情激奋，礼炮震天，“黄鬼”被剥皮抽肠，象征村民除邪恶免灾难成功。斩“黄鬼”庆胜利是整个活动的高潮。

从正月十四日到十六日晚上为赛戏和社火活动。气势更为壮观，街道、屋顶、树杈上挤满了四邻八乡的万余观众和一大批国内外专家学者，全村3000余人，进入角色的上千人，谁是啥角色都是世袭，祖辈相传，不派不选，久演不衰。骑真马、披甲戴盔、铃声急促，蹄声得得在人群中来往开道。示众队伍浩浩荡荡、直贯长街首尾。前有鸣锣开道衙役，手持旗牌、伞扇，

金瓜、钺斧、朝天镗等全套仪仗和各种面具的戏中角色，后面是衣着鲜艳的各种民间花会队伍，边走边演热闹非凡。

队伍出村，在南洛河滩上，分四个场地进行赛戏活动，蓝天作幕高山大河是舞台，奔放而跳跃的节奏，传达出生命与自然的交融和活力，展现出一幅雄浑壮阔的大行赛戏巨幅画卷。

傩戏均由锣鼓伴奏、唱词半吟半唱、声腔古朴深厚。从“捉黄鬼”到傩戏连台，整个活动浑然一体，高潮起伏，专家学者观众激动不已。中国傩戏研究会曲六乙先生说：“几十年来，我在全国各地看到不少傩艺、傩技和傩工的表演，但这次最丰富最令人激动。”

专家学者与观众评价：固义的傩戏有很深厚的历史意蕴和很高的研究价值。这一传统文化现象，能够延续几千年流传至今，是固义村民对中国文化的贡献。

傩戏是戏剧的祖先。今天固义演出典型的北方傩戏，具有黄河流域傩文化的鲜明特色。它是一块研究戏剧发展的“活化石”，打破了“长江以北无傩”的断言。

(责任编辑 吴 思)



黄鬼被捉，押向审判台

读吴晗问题的定性一文有感

● 李坛荪

读了贵刊《关于“吴晗问题”性质的高层争论》一文(1997年第5期),大有收获。作者苏双碧以确凿的史料,还江青以本来面目,很令人信服。

江青梦想当女皇,想学武则天,曾经大谈其“面首”。亏得她是个大草包,连慈禧那点儿本事也没有。否则,我们中华民族可能还要遭更大的难,受更多的罪。

可是,我觉得长期以来,我们有些人把江青估计得太高了,把她说得神乎其神,好像她真有呼风唤雨之术,翻江倒海之能。我想,过于轻信了她自己的吹嘘,可能是原因之一。

苏双碧这篇文章很长,我举有关江青的两件事为证。

一是姚文元那篇评吴晗京剧《海瑞罢官》的文章。不错,这是引发“文革”的第一炮,是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整个战略部署中十分重要的一步棋。江青把“花环”戴到自己头上,说她如何如何在北京受压,如何如何只得跑上海找人写文章,如何如何像在旧社会做秘密工作一样,吹得天花乱坠。

其实,这一切都是毛泽东的安排,那篇文章是经他看过的。以后江青也曾说,她去上海是奉命去办这件事的。苏文中说;“毛泽东是要从吴晗的《海瑞罢官》找出一个足以撼动政界的重大政治问题来……在吴晗的后边有一条‘黑线’。”不过毛泽东这个意图,当初江青是否完全心领神会,恐怕也不一定。后来毛泽东说:“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时机不到,他自己

是半个字也决不透露的,免得打草惊蛇。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以后,刘少奇主持政治局制定《二月提纲》,认为批判吴晗应是学术性质,毛泽东没有表示不同意见,也是时机不到,先要“稳住对方的阵脚”。

二是那个所谓的《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纪要》,这是用来对付前述党中央《二月提纲》的,标题前面还赫然冠有“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十三个大字。这件事江青更是大吹特吹,说她召开那个座谈会是利用解放军的力量,去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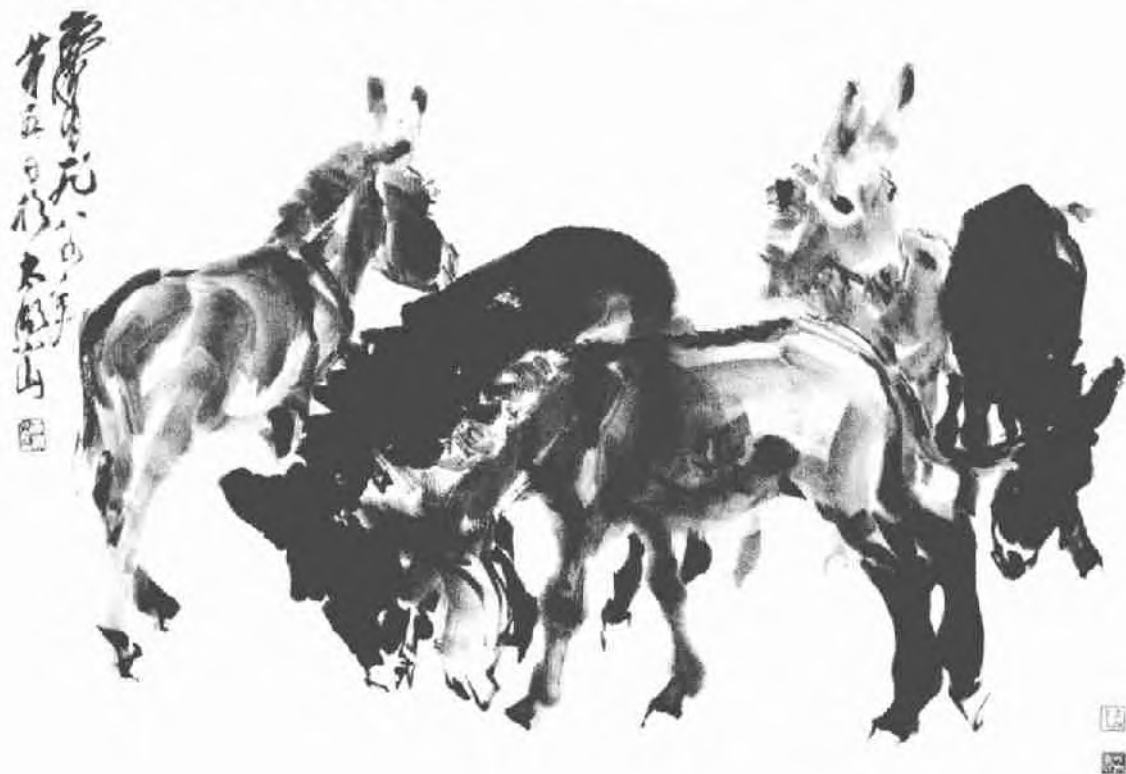
事实是,这件事也是毛泽东的安排。那个《纪要》是他本人多次修改定稿的。他并且在1966年3月17日批示:“此件用军委名义”。所以,冠在标题前面的那十三个大字,是毛的亲笔还是别人根据他的指示写上去的;以及所谓“林彪同志委托”,事先是否同林彪打过招呼,都是很有趣的问题,可惜苏文没有说清。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这是历史的事实,历来文件上和人们口头上都这样说,确实一点不假。这两件事的经过还表明,“文革”中又是他亲自指挥的,不过有个从后台逐步走向前台的过程。这两件事都是“文革”战略部署的大事,江青把自己吹嘘得很厉害,其实正如苏氏所说,她“当时也不过是一个具有特殊身分的卒子而已”。后一件尤其足以说明问题,“她是没有力量搬动林彪,更没有力量搬动军队的”。

(责任编辑 方实)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著名画家黄胄于1997年4月23日逝世。现刊出黄胄的三幅作品，以为纪念。



炎黄春秋



1983年邓小平出席庆祝马海德来华工作50周年招待会



顾准1974年摄于北京

悼念敢于为民请命的胡开明

回顾总政创作室的反右派运动

“两航”产权引发的国际争端

蔡元培在北大的辞职风波

我的公公南开创始人张伯苓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邮发代号: 82-507

定价: 4.80元